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费孝通

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的陈毅

张闻天主张利用私人资本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先天下忧的龚自珍

2001/ 2 总第107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炎黄春秋

春秋笔

2 张闻天主张利用私人资本 …… 刘雪明
10 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费孝通 …… 徐庆全 杜明明

英杰谱

16 建国初叶帅抓经济的点滴回忆 …… 王　匡 曾彦修
19 张爱萍初上国防科研路 …… 贺茂芝

陨星篇

23 大革命前后刘少奇在上海 …… 陆米强
28 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的陈毅 …… 吴跃农
32 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 刘德荣
40 盐城"二乔" …… 王光远

沉思录

42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 李　锐

人海浪

46 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 金　凤
52 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王逸群 …… 舒　云
54 戈枫为自己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 南　雁

挚友情

56 沫沙十年祭 …… 李　普

古今谈

61 谈独立思考 …… 欧远方

古镜台

63 大哉 晏子 …… 邹人煜
66 先天下忧的龚自珍 …… 靳树鹏
68 昭君"怨"吗? …… 王宏志

遗闻录

72 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 …… 骆驼刺
74 民初著名报人邵飘萍为何被杀 …… 傅国涌
77 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 刘德纯

九州景

78 茗气氤氲说茶城 …… 刘振贵 孟凡夏

编读窗

22 钱瑛与《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无关 …… 黎　白
31《炎黄春秋》的编校工作有待加强 …… 谢　宁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胡　绳
陈　沂　杜润生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欧远方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张闻天主张利用私人资本

● 刘雪明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如何正确对待私人资本主义，既是一个极端重要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实际问题。中国共产党人对此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张闻天作出了开创性的理论贡献。他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提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党的高层领导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是他最富于创见的思想之一。时值张闻天诞辰一百周年，认真回顾、仔细研究他的这一思想及政策主张，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作用和现实指导意义。

一

1930 年 10 月，毛泽东致信湘赣特委，信中指出："对于资本问题，我们认为目前无条件的没收一切工厂商店，是不对的。"他主张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应该保护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

但是，这些正确的主张并没有引起"左"倾中央的重视。1933 年 4 月 1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局书记博古发表《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一文，继续坚持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工农民主专政"无情斗争"的目标，主张对资本主义进行"系统限制"。身为中央常委兼宣传部长的张闻天，虽然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集团的重要成员，也曾一度执行过"左"的政策，但是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当"左"倾路线在实践中受挫之后，他很快醒悟过来，自觉地摒弃错误，勇敢地追求真理，于同年 5 月 1 日、10 日及 6 月 5 日连续发表《五一节与＜劳动法＞执行的检阅》、《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苏维埃政权下的阶级斗争》三篇文章，针锋相对地表明了不同的看法，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及政策主张。

第一，阐明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性。30 年代的苏区，几乎都处于国民党统治的包围之中，一方面要应付国民党强大的军事进攻，同时又要面对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如何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展苏维埃经济，保障苏区人民的生活，保证红军将士的供给，就成了党和红军必须考虑的一个首要问题。张闻天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胆地提出："要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目前不尽量利用私人资本是不可能的。"他说，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我们不但"不是可怕的"，而且"这种发展，可以增加我们苏区内的生产，流通我们的商品，而这对于苏维埃政权现在是极端重要的"。

第二，分析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原因。张闻天认为，在苏区经济结构中，虽然目前"私人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则比较不重要"，但

它完全可能有一个较大的发展，因为苏维埃政府需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充实苏区的经济。他接着进一步指出，利用私人资本主义，一是扩大苏区生产的需要。苏区由于处在国民党的包围封锁之中和革命战争的特殊环境之下，而“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因此，必须尽一切努力扩大生产，增加财富。可是苏维埃政府却恰恰“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大规模的生产”，所以，就“不能不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苏维埃的经济”。二是搞活商品流通的需要。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不但严重影响了苏区的生产，而且还造成了苏区与白区的割裂，致使苏区的大量农副产品卖不出去，同时所需的许多如洋油、食盐、布匹等“日常必需品”，又“发生极大困难”，引起苏区“打破敌人对于我们的经济封锁”。因此，“苏维埃政府要尽量利用苏区内外的商人，给他们以特别的好处去输出苏区的生产品，与输入白区的日常必需品”。

第三，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途径。在充分肯定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作用和认真分析了苏区为什么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原因后，张闻天还从中国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实际出发，提出了符合苏区特点和时代特征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措施和途径。他明确指出：“苏维埃政权在目前并不反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还容许资本主义的发展，使用许多办法来吸引与鼓励资本家的投资。”为此，张闻天进一步强调：一要切实保护资本家的合法利益。他说：“要使私人资本家投资到生产中或商业中来，那必须使他们有利可图，而不是亏本。世界上没有这样的资本家，他的投资是为了亏本。”二要实事求是地制定工人的工资待遇。针对《劳动法》及其执行中的一些过分强调工人阶级利益的错误做法，张闻天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他明确指出：《劳动法》的有些条文“必须立刻修改”，“必须同那些不顾任何情形企图完全机械的执行（劳动法）的‘左’的倾向做斗争”。只有实事求是地执行政策，才能真正维护工人阶级的权益。

在七大时的张闻天

第四，指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前景。张闻天认为，苏区“工商业的发展，苏区内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即是资本主义的部分的发展”，而且“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将随着苏区内工商业的发展，而增加它的作用与地位”。但是，他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在苏维埃政权下的部分发展，并不是可怕的。”我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决“不是为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并且，他还进而提出了确保“社会主义的前途”的措施：首先加强立法，“要经过劳动法来限制资本主义的剥削，改良工人的生活，提高工人阶级的团结力与觉悟程度，吸收工人阶级的大多数，来管理自己的国家”。其次强化监督，“对于资本家的企业，必须尽可能的实行工人监督生产，防止资本家利用他的企业进行各种反革命的活动”。再次税收征缴，通过“征收累进的工业税与商业税”，并抽取资本家的“利润的一部分来巩固苏维埃政权”。最后，“苏维埃政权采取最严厉的办法来对付资本家的投机，故意高抬物价，以及一切扰乱苏维埃经济，使千百万群众生活恶化的企图，在这斗争中以社会主义

的教育来教育广大的群众”。

20世纪30年代,在党内“左”倾错误最为盛行的时期,张闻天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竟有如此深刻的认识,充分显示出他作为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革命气概和理论勇气。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思想及政策主张,后来,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有效的执行。

二

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既是中国共产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也是张闻天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从此他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书记长达八年之久。经过千辛万苦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到达陕北延安,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适应抗日战争的新形势,中国共产党对自己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故党的政策,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而是在适当的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张闻天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有了新的发展,提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政策主张。

第一,提出了“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思想。张闻天认为,这种在革命队伍掌握经济命脉前提下的新式资本主义,就是“新民主主义”。在此,张闻天不但发展了他在中央苏区提出的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而且还丰富了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关于“新式资本主义”这个名词,后来毛泽东也用过。1944年3月,他在边区宣传工作会议上论及文化教育问题时说,我们的根本目的是要发展生产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要发展“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只是到了1948年9月,才最终确定:“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第二,指出了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旧式资本主义的区别。在40年代的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因为中国已经饱受了资本主义列强的蹂躏,正遭受着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广大民众受尽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要发展资本主义,许多党员干部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情感上都难以弄通、难以接受,而且往往容易把发展资本主义同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混为一谈。为此,张闻天站在时代的前列,紧握时代的脉搏,在充分认识时代特征和缜密分析国内外形势后明确指出:“我们所提倡的新式资本主义,与欧美的旧资本主义不同。”这种“新式资本主义”有两个根本的前提:首先在政治上,“我们有革命政权和革命政策,调节社会各阶级关系”。其次在经济上,“凡可以操纵国民生计的工商业,均握在国家手中”。在这两个根本前提下发展资本主义,张闻天认为,没有什么可怕的,不要怕资本家多、怕受剥削,更不要怕工人、农民受苦,“在新民主主义政权下,只要资本主义发展了,工人生活一定会改善”。后来刘少奇发展了张闻天的这一思想,提出了著名的“剥削有功”论。这一理论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为刘少奇的重要“罪证”,给他的政治生涯带来了严重影响。

第三,论述了新式资本主义与未来社会主义的关系。张闻天谙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他在仔细剖析了中国新式资本主义和欧美旧式资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后,进一步指出,中国社会将来一定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但目前必须是发展新式资本主义。“只有走过新式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才能走社会主义的第二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我们的理想。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是我们现时的任务,也是我们当前的具体工作。”他还特别强调:“若把理想当现实,乱来一阵,会弄糟糕的。”显然,张闻天在此是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革命不能不做两步走,第一步是新民主主义,第二步才是社会主义。而且第一步的时间是相当地长,决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成就的。”不过,张闻天把“新民主主义”完全理解为“新式资本主义”,确实也非常有新意,充分体现出他在利用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的一贯思想和大胆主张。

如果我们把张闻天在延安时期同苏区时期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和政策主张作一比较，很容易发现一个明显的特色，就是此时的张闻天非常强调、坚持生产力标准。在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后，他诚恳地指出："过去我们对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调查太少，即使有，也是很零碎的。而大部分只是关于政治方面的，由经济基础一直到上层建筑的全面调查太少了，这是过去调查研究的最大缺点，特别是生产力太少了。"只有"了解了经济基础，我们的政策就可以放在巩固的基础上"。因此，在论述40年代的中国为什么要发展新式资本主义时，张闻天首先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剥削制度进行了认真的比较，他最终得出结论："封建剥削制度是落后的"，在这一社会制度下，"农业生产力是低下的，农民生活是痛苦的，社会也是贫穷的"。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现时比较进步的"，在这种生产方式的经营下，不但"土地集中使用"，而且"合理分工"，自然"产量越高"。接着，张闻天又进一步指出，我们不要只看到这种新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富农和资本家有利，其实"对全社会更有利"。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张闻天在此还提出了一个崭新观点，他认为有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关心农民生活、体贴农民疾苦是对的，"但把改善农民生活完全放在合理分配别人的财富上，则是不对的。应主要从发展生产、增加社会财富来求民生之改善，才是比较妥当的"。如此鲜明地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根本标准，这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确属罕见。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张闻天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主动要求到东北根据地从事地方工作。东北工作时期，是张闻天"充分施展他的才华的时期，也是他一生中对自己工作感到满意和愉快的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他深入调查研究，密切结合当地情况，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又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并且臻于完善。同延安时期和苏区时期相比，张闻天在东北时期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政策主张具有如下几个显著特征：

一首创性

在东北从事地方工作后，张闻天继续他在中央苏区和延安时期的探索，一如既往地坚持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来发展根据地经济，对中国共产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理论与政策的形成和发展进一步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第一，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份系统总结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历史文献。*切实保护民族工商业，合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是张闻天的一贯主张。他刚到东北就非常注意这个问题，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1946年11月起草通过了《关于发展工商业的若干政策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从公私关系、贸易政策、物价政策、工业政策、工资政策、税收政策、建立合作社、加强领导等八个方面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作了详尽的政策规定，并明确指出："一切侵犯工商业者正当权益的行动，必须严格禁止。"在党中央《五四指示》下达仅半年时间，张闻天就对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作出了这样比较全面、系统的具体政策规定，极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党中央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总原则。就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材料，这个文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系统总结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政策的一份历史文献。

*第二，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是由包括私人资本主义在内的五种经济成分构成的学说。*关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构成问题，早在1948年9月15日，张闻天在《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中就明确提出：中国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本上是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并进而指出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方针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与鼓励

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与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在此，张闻天对私人资本主义在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构建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准确的规定，为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靠的政策依据，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对张闻天的这一理论贡献，著名学者于光远作了十分肯定的评价，他指出：“对新社会经济结构作这样的分析，是到那时为止最完全最准确的一个。”另一位经济学家薛暮桥也认为，张闻天“提出五种经济成分时间最早，而且阐述得相当完全，相当深刻”。

第三，第一次系统论述了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的思想。如何合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及时限制其消极影响，这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张闻天根据马列主义特别是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的理论，科学总结东北根据地的实践经验，明确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中最有利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一种形式”，“应该成为私人资本主义发展中的有利的方向”。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张闻天早在苏区时期就表示过希望出现“国家资本主义的企业”的愿望。到达东北从事实际工作后，他就适时地把这种经济形式纳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之中。1948年7月18日，他在东北局召开的各县组织、宣传部长联席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论述“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式”时就已经包括了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认为“这种经济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很有好处”，虽然“今天这种经济形式还不多”，但“将来是会发展的”。而刘少奇在随后的9月13日，虽然也把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纳入“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构成”，但论述时却只有“这个名词不通俗，也可以讲”，寥寥数语。显然，张闻天此时的认识要比刘少奇早得多、深刻得多。他在9月15日的《提纲》中更是对国家资本主义作了系统的论述，并首次将出租、加工、定货、代卖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四种形式明确下来，这也是张闻天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

二 系统性

根据张闻天的思想脉络，我们认为他对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探索，始于苏区时期，成于东北时期。张闻天在东北工作前后不到五年，为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撰写了大量的报告，起草了很多的决议，这无论在中央苏区还是延安时期，都无法与此相比。在这些报告和决议中，他对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系统、全面的论述。

第一，从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高度，论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地位与作用。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张闻天始终坚持的政策主张。他进入东北不久就提出要“保护与奖励私人企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后来进而强调“大量的吸收私人资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是非常重要的任务”。随着实践的发展，人民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以及新中国曙光的显现，张闻天的认识逐步深化，理论分析更趋成熟。从此，他进一步从构建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的战略高度，充分论述了私人资本主义的重要地位和积极作用。张闻天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经济基本上是由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成分所构成，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内的一个组成部分”，“正确地认识这五种经济的性质、地位、发展方向及其相互关系”，是正确决定东北乃至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发点与基础”，“只有从此出发，我们才能在经济战线上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实现无产阶级对于社会经济建设的正确领导”。

第二，坚持从东北乃至中国的实际出发，制定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方针。通过对私人资本主义在整个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分析，张闻天指出，对私人资本主义既要鼓励发展，又要适当限制。他说：“我们目前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方针，就是把必然要发展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并限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范围以

内。”凡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有利可图，因而都能生存与发展；凡属无利或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都使之无利可图，因而迫使其转业，“这就是我们对于私人资本鼓励与限制的标准，也就是联合与斗争的标准”。张闻天认为，一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即使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也罢，既然是资本主义，就必然包含有投机和操纵的本质，也就必然存在着无政府、无组织的破坏性。因此，他明确指出：“我们对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必须适当地加强国家的管制与监督。”只有这样，才能减少私人资本的破坏性，增加它的建设性，使私人资本主义向着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方向发展。特别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张闻天提出，这种斗争应该“主要地是在经济上的和平竞争，而不应该不适当地采取行政上的办法去进行”。

第三，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强调发展私人资本主义既要反右，又要防“左”。为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主张发展私人资本主义，这是个一时难以接受的问题。在党的历史上既有过成功的经验，也存在着惨痛的教训。张闻天指出，毋庸讳言，我们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问题上“曾经发生过一些‘左’右摇摆，在有些地方甚至存在着严重的‘左’倾错误”。他认为导致这一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私人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体系中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在实践中往往容易强调对私人资本主义的限制方面，而对积极扶助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却注意不够；二是党内长期存在的“左”比右好的思想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许多干部不敢放心、放手、放胆地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张闻天反复强调，要实现私人资本主义的健康发展，就必须“在党内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去克服党内在这一问题上的‘左’右摇摆”。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私人资本主义在新民主主义经济中的重要作用。

三 绩效性

虽然张闻天在苏区时期就提出了“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设想，但当时并未引起“左”倾中央领导的足够重视，也因条件不成熟而基本上没有付诸实践。他在延安时期提出的“发展新式资本主义”的主张，却直到庐山会议罢官之后才被拿出来作为批判他鼓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罪证”，而在此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与这两个时期不同的是，张闻天在东北期间对私人资本主义的认识及其政策主张，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并对东北根据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从理论上看，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正确的私人资本主义政策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948 年 9 月 15 日，张闻天将发展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整个东北新民主主义经济的设想，经东北局干部会议讨论，以报告的形式向党中央写了一份《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这个《提纲》引起了党中央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责成刘少奇先后两次对《提纲》作了详细的修改。关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部分，刘少奇增加了“决不可采取过早地限制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毛泽东经反复斟酌推敲，将刘少奇这句话改为：“决不可以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经济的办法。”后来，刘少奇又在毛泽东的修改后面再加了一句“更不可以重复清算及均分私人工厂商店的错误”。周恩来也为《提纲》写了批语，说明毛泽东“提议将这个提纲注明为中央批准的，作为党内文件印发”。随后，中共中央又电告东北局，称赞“你们发来东北经济构成及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很好”，准备“再加修改后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印成小册子在党内及工人群众中进行教育，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张闻天在这个《提纲》中提出的包括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一系列科学构想，基本上被党中央所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五种成分构成论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所采纳，全会指出：“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加上私人资本主义，加上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

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的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这是张闻天对中国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作出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第二，从实践上看，对东北根据地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东北工作期间，张闻天先后担任中共合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辽东省委书记等职，这为他利用、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的思想从理论走向实践创造了有利条件。1946 年 5 月，张闻天到达佳木斯市的时候，城市反奸清算运动正在深入开展，对于工商业问题，当时有一种观点，认为东北日伪统治 14 年，并且实行了配给制度，已经不存在民族工商业和私人资本，而只有敌伪资本，所以在反奸清算工作中侵犯了不少中小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张闻天在深入调查后明确指出，虽然东北工商业的主要部分属于封建官僚资本，但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资本。据此，他及时制定了《城市清算运动中应注意事项》等一系列决议，纠正了当时的错误，保护了民族资本，促进了私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后来，他又为农村土地改革起草了《在平分土地运动中保护工商业》的指示，并报东北局转中共中央。1948 年 1 月，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合江省这一指示，经修改后，可适用于整个东北各地。”在这一政策的影响下，合江省的工商业很快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仅 1948 年 3 月 18 日至 27 日 10 天时间，省会佳木斯市就增加 66 家工商业户，到同年 5 月，全市工商业户为 3383 户，全省工商业户达 12369 户。就在当时，张闻天调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常委兼组织部长，在这个岗位上撰写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更是成为指导整个东北包括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他在任辽东省委书记期间作出的《关于调整城市劳资关系的决定》，同样得到了中共中央东北局的肯定，东北局略加修改补充后，批转各省市参照执行。而且，他还向中共中央东北局写了《关于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的报告》，明确指出："东北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第一时期大体已经结束，现在正要进入它的发展的第二时期。”这是一篇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完美结合，颇具学术价值和实践意义的东北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纲要。张闻天不但是中国共产党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而且是发展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坚定执行者。

四

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自 1950 年起转入外交战线工作，先后任驻苏联大使和外交部常务副部长，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1959 年在庐山会议上，他因坚持实事求是原则，批评“左”倾错误而被错误地解除了领导职务，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在这个无职无权的岗位上，张闻天依然竭忠尽智，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即使是在极“左”思潮面前，他也始终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应该合理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

第一，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范畴与资本主义存有共性。1956 年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确立。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理论界长期流行一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与社会主义经济范畴完全没有共同之处。按照这个逻辑，理论上就等于将所有的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一概划为社会主义经济学根本不能涉足的禁区，在实践上则导致了完全排斥资本主义，自然也就谈不上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有益的东西。庐山会议后被罢官的张闻天不计个人得失，不顾个人安危，对这个理论上的错误进行了大胆的批评。1961 年 8 月，他在《读孙冶方同志 <论价值>》的笔记中写道："我们的经济学家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经济范畴的使用，有一种恐惧，怕在使用中犯修正主义错误”，进而明确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我想，只要说明《资本论》的范畴在社会主义起了根本的质的变化之后，这些范畴的充分运用不但无

害，而且有利。因为这些范畴虽然表现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性，但也表现一切社会化社会生产的共同性，还不说在社会主义下也还有资本主义的残余。”这些范畴“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仍然可以而且还必须利用”。张闻天最后指出：“人们由于过分强调阶段性、特殊性，因而忘记了共性、一般性，忘记了继承与发展。社会有不同的特殊阶段，但它是从低级到高级的统一运动。它们不是绝对隔离着的有着密切联系的。”这些观点既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又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第二，依然主张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经过“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反右倾”斗争，张闻天对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早在庐山会议上批评“穷过渡”、“共产风”时，张闻天就提出要保护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并且认为特别是在农村，个人所有的东西比消费品还多，这种消费品个人所有制即使“到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存在的”，我们不能把因多劳多得而生活较好的人“说他们有资本主义思想”。后来，他又明确指出，在落后的国度里建设社会主义，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的中间环节”。这是张闻天在读列宁1921年《论粮食税》一文时写的一条批注。《论粮食税》，是列宁从理论上全面论述由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一篇重要文章。60年代初的中国与当时的俄国一样，都面临着一个如何正确看待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的利弊问题。列宁指出：“军事共产主义”的重大错误就是禁止物资的“地方周转”，结果严重损害了农民群众的利益。然而，要恢复商品交换，扩大贸易周转，就又必然会带来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对此，列宁坚持生产力标准，再三强调资本主义要比小生产进步得多，认为既然小生产不可能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那么，就应该利用“作为小生产和交换的自发产物的资本主义”来“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张闻天反复阅读了列宁这篇文章，并写了30多条批注，这些批注不但体现出他对列宁思想的赞同，而且也反映了他当时关注的重点和探索的水平。

第三，明确提出完善集市贸易、发展小商小贩的政策建议。1962年4月至6月，张闻天对江苏、上海、浙江、湖南四个省市的部分城镇、农村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调查。这次调查使长期从事外交工作的张闻天，对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从而也更加坚信了自己的认识。在上报党中央的《关于集市贸易等问题的一些意见》的调研报告中，他明确提出：“应该容许和利用合作商店、夫妻店、个体手工业者以及小商小贩的合法的买卖活动。”既然“集镇上合作商店、夫妻店以及个体小商小贩的活动，在今天发展物资交流和商品流通中，还有其积极的一面”，那么就“应该加以利用并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但是，对其消极行为“必须加以管理”。张闻天还强调指出，我们不能把禁止投机倒把等同于取缔小商小贩，这种斗争“不要采取简单的行政措施，将其‘管死’，而要采取适当的经济措施，加以诱导和利用”。要通过“文明经商”来同私商进行竞赛并去赢得竞赛的胜利。他坚信：“只要我们学会了文明经商的本领，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是并不可怕的。一些资本主义成分的产生也是不可怕的。”可惜，这些建议不但没有引起重视，反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状！

历史的航船已驶向21世纪。私人资本主义已不再是“洪水猛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也载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的根本大法。历史雄辩地证明：张闻天关于利用私人资本主义的一系列思想和政策主张是正确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对他的批判和指责是不公正的、极端错误的。张闻天不计名利，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革命情操和崇高品质，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铭记！

（作者为中共江西省委党校研究所副教授）

从实求知志在富民的费孝通

● 徐庆全 杜明明

救亡报国,选择一生追求

1910年,费孝通出生在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第二年,为清王朝敲响丧钟的辛亥革命就爆发了。在这大变动的时代,费孝通的父母亲是“教育救国论”和新思想观念的唱和者。费孝通早年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在上中学时,他就成为商务印书馆办的《少年》杂志的作者,与笔墨文字开始结缘。到中学毕业时,他在文学上已崭露头角了。

费孝通中学毕业后,在选择进入哪所大学和哪个专业的问题上,他颇费了一番心思。后来费孝通升入东吴大学,却没有选择自己钟爱的文学专业,而选择了医学专业。个中原因,与当年鲁迅选择学医一样:“我当时抱着想帮助人们解决痛苦的目的,学点医学知识。”

可是两年以后,当他站在未名湖畔的时候,选择的却是另一种专业。费孝通回忆说:

一个人的思想活动主要是由时代所决定的。经过了当时的大革命,事情变得很清楚了,中国的问题不是一两个人生病的问题,而是中国人会不会亡国的问题。我是个知识分子,我是一个从知识分子家庭里生长大的青年。特别是经过了“五四”运动,希望科学救国,我们希望的是在了解中国的问题上,怎样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这个中国的社会、文化。从这里边,能不能够找到一条出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到了燕京大学,不念自然科学了,我决心要研究中国的社会,学习人文社会科学,就选择了社会学系。

在这里,费孝通遇到了吴文藻教授。

192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吴文藻,回到祖国,在燕京大学开创了中国社会学这个专业,并鲜明地提出“社会学要中国化”的主张。如何才能将“社会学中国化”?吴文藻主张从社会实际出发,总结社会学的理论,反过来再为社会的发展服务。他要求学生到实际生活中作系统的考察,用取得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分析研究,形成既符合社会实际,又能为社会发展服务的社会学理论。

根据吴文藻的主张,青年学生走出书斋,纷纷上山下乡做社会调查。这种治学方法,对费孝通的学术道路产生终生不渝的影响。他说:

我在燕京大学念了三年,自以为找到了一条路子,就是社会学要走中国化的道路。我们青年人要带头下乡去研究中国社会。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现实。北大校庆100周年的时候,我出了一本书,名字叫《从实求知录》,“从实求知”这四个字就是指从实际出发去求知识。这样的方法,开辟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研究的科学精神。

这样,我的研究方法在30年代初期已经开始形成。指导我学术思想的基本概念可以说是形成于我在燕京及其后在清华学习期间。

自此，进行实地调查，就成为费孝通一生的重要学术活动内容，即使到了近九十的高龄，仍坚持不辍。而当他肩负起承前启后的责任时，这种实地调查又成为他的学生的必修课。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卓越传灯人。

费孝通和姐姐费达生

1933 年，费孝通考取了清华大学，进入了全国惟一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系”。他希望在这个融汇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环境里学习，以利于使用人类学的方法来研究中国社会。这就是后来被称为“社会学中国学派”的缘起。

在清华，费孝通遇到了有“孤僻怪人”之称的俄国学者史禄国，他是一个世界级的人类学权威。这位令费孝通充满敬意的老师，不但给了他专业人员必备的严格训练，而且培养了他坚强的学术意志。在费孝通对数据资料进行分析时，史禄国只准他用算盘和算尺来进行。费孝通对此很不理解，曾问：为什么不能引进些比较先进而省时间的计算工具呢？这位怪人的回答是：“你得准备在最艰难的条件下，还能继续你的研究工作。”这句话给费孝通留下了终生不灭的印象。

入山进村，科学调查历尽险难

清华毕业以后我就到瑶山去做实地调查。这次到瑶山去调查是吴文藻、史禄国两位老师出的主意。他们认为要认识中国的实际很不容易，先要到一个比较不同的社会，取得一个参考体系（reference）。要真正有个理解，有个知识，就是我所说的“从实求知”的“知”。

在费孝通的简单叙述中，没有涉及当年他在瑶山所经历过的令学术界同悲的那一幕：他的妻子王同惠为这一调查，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他自己也身负重伤。

费孝通和王同惠同为吴文藻所钟爱的学生，在共同的追求中，他们走到了一起，可以看作是“天作之合”。这时，刚好广西省政府有研究“特种民族”的需要，所以他们就决定结了婚同去。

远离城市来到偏僻的瑶山，单就生活来说，就有诸多不适应之处，而地理环境的艰苦，则要求他们必须在没有路径的深山老林里穿行。一个多月来，他们坚持下来了，而且取得了丰富的资料。

1935 年 12 月 16 日，他们离开象县的古陈，前往平南县的罗运。一路上，山路曲折险峻。在路上，他们与向导失去了联系，费孝通不慎跌进了山民为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虽然奋力将压在丈夫身上的石头搬开，但受了重伤的费孝通已无法站起来。王同惠在安慰了丈夫后，决定出去找人来援救。而王同惠这一走，却与费孝通永别了。

忍受了一夜疼痛的费孝通，见不到妻子的身影，万分焦急。他拚命地爬出了陷阱，寻找妻子。在路上，遇到了村民而获救。村民们费尽全力寻找王同惠，直到七天以后，在罗运境内的河中发现了王同惠遗体。

这一悲剧震惊了学术界。费孝通的老师吴文藻悲痛地写道：

这一支从社会人类学阵线上出发的生力军，刚刚临阵，便遭天厄，怎能不使人为工作友

气，为祖国绝望？

身负重伤的费孝通，其悲愤的心情自然是难以用笔墨描述的。但他把对亡妻的悼念化作追求科学的力量。在王同惠遇难一个月后，在医院养伤的他给朋友写下一封信，信中说：

同惠不能再为中国，为学术服务了，因为她爱我，所以使我觉得只有我来担负这兼职了。我愿意用我一人的体力来做二人的工作。我要在二十年把同惠所梦想所计划的《中国社会组织的各种形式》实现在这个世界上。更希望爱她的朋友能一同努力。

为了所研究的科学，也为了爱妻的志向，伤没有痊愈的费孝通在医院就开始了《花篮瑶社会组织》一书的撰写，到他回到北平以后，全书已经写完。

对科学的无悔的追求，销弥了费孝通心中载负的巨大悲伤。从此，在“从实求知”的追求中，也伴随着长眠在遥远的瑶山的妻子的影子。

费孝通在江村养伤期间，对农民生活和生产的各个方面作了尽量详细的调查，积累了大量的资料。这些资料，成为他的博士论文的主要材料。费孝通说：

到了 1936 年夏天，清华大学把我送到英国去跟马林诺夫斯基这位老师学习人类学，叫做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就是研究人同人的关系，不同西方文化的那种人同人的关系。他们叫“土人”、“野蛮人”的各种生活制度。我跟他学了两年，就把我在江村看到的材料整理出来，写了一本叫《江村经济》。

在《江村经济》里，费孝通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观点：“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简单地说，就是农民的收入降低到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程度。中国农村真正的问题是人民的饥饿问题。”

现在看来，这个观点已经深入人心，不需再说什么了。而 30 年代，费孝通以学者的睿智，对人民实际生活情况的真实、系统的研究，提出了逐步接近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和观点。

通过调查，费孝通已经对中国的社会有很深刻的认识，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对于一个时刻把国家的利益挂怀于心的学者来说，学术研究的最终目的是：“学术就是有用的知识，有用就是对改善人民生活和推动社会进步有益，为民族生存所必须。”

正是抱着这种信念，在英国已经功成名就的费孝通，在 1938 年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那时，日本已经占领了沿海的一些城市，费孝通回到中国但已回不到自己的家乡了。他说：

这个时候几个大学已都到了昆明，北大、清华、南开等学校组成了西南联大。到了昆明后的两个星期我就下乡了。我直接去调查的村子（是）禄村（禄丰）。

调查之后，我们就在云南大学成立了一个研究工作站，办了一个叫“魁阁”的研究中心。1942 年美国请我去讲学，我没有讲学，而是写了一本书，还找到了一个帮助我的人，她是派克老师的女儿，她帮我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做 Earthbound China，这是我写的第二本英文书，后来我把中文原稿重新印出来叫做《云南三村》。

费孝通把《云南三村》一书，称之为他的“第二期的调查报告”。如果在《江村经济》中还停留在对中国社会的认识的话，在《云南三村》一书中，费孝通已经实实在在地提出了解决中国社会的出路：农村要摆脱饥饿，除了土地以外，必须建立“乡镇企业”。建立乡镇企业出发点是什么，费孝通在随后出版的两本书《乡土中国》和《乡土重建》中，进行了论述。

在费孝通出版这两本书的时候，抗日战争胜利了，建设国家更严峻的任务摆在了中国人面前。中国的工业化就要开始了，而费孝通的思考点在于，在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经济应该怎样发展？谈到这一点，费孝通说：

中国农村经济的结构很简单，是要工农相辅，不能只靠农业，只靠农业是活不了的。

中国农村经济的基础是工农相辅。这种工农相辅的中国经济碰到了外来的现代科技，因此我们旧的工业就跌下来了。因为它赶不上西方的科技，这个时候机器工业出来了，我们传统的工业吃不消了，退化了。一退化，农民的经济就失调了。原来的工农相辅的结构不行了。所以

农民就贫困,吃不上饭。

工农结合的这样一个基本结构是我讨论工业下乡的基础,也是我的认识基础。

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社会的根本精神是一个乡土社会。而农业与手工业的密切结合,则是这种社会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中华民族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只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起步。为此,费孝通在当年所写的文章中,在强调中国的工业化道路不能脱离中国经济的乡土特色的同时,提出了一个既实际又长远的思路。他认为一个要能受人民拥护的政府,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战争,必须先做到与民休息,培养元气的最低标准。而这个最低标准,就是应该增加人民看得到的收入。他说:

在这创痛之后即刻强制人民去为国营工业积累资本,在政治上看去,是件冒险的政策。所以我倾向于先发展乡土工业的意思,然后用这种工业里所创造出来的资本去发展较大规模的重工业。简单说,我们得从土地里长出乡土工业,在乡土工业长出民族工业。这条路线是比较慢的,但也比较稳。

费孝通所说的乡土工业,也就是现在意义上的农村乡镇企业。这一思想,是费孝通在抗战结束后提出的,建国后也一直这样坚持。

"圈外人语",感慨万千欲说还休

"圈外人语",是费孝通不久前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讲的是1957年反右派时自己的心态。在与我们谈到这段历史时,他依然欲说还休:

我从1957年起已经是在学术圈子之外的人了,连一般人的权利都没有了。这个社会不准许他进入,把他排斥到外面去。当右派是很苦的。从1957年到1980年,这些年的经历对我也有好处,我学习了人生。特别是劳动,接触了真正的农民生活,同时也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什么叫social,什么叫social circle。

1957年3月,费孝通发表那篇非常著名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那是有感于党"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而写下的。

建国以来到1957年的历次运动中,党和国家一直没有给知识分子一个定位,一心想为国家出力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不由得生出了"墙外行人"之感,发出"笑渐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的感叹。1956年,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以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实施,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热情,费孝通首先感到的是一种如坐春风般的舒畅。文章写道:

去年1月,周总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像春雷般起了惊蛰作用,接着百家争鸣的和风一吹,知识分子的积极因素应时而动了起来。百家争鸣实实在在地打中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太好了。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从立场这一关改起的。划清敌我似乎还比较容易些,一到观点、方法,就发生唯心和唯物的问题,似乎就不简单了。

百家争鸣恰好解决当前知识分子思想发展上发生出来的这些问题。据我的了解,百家争鸣就是通过自由讨论来明确是非,即是知识分子进一步的思想改造,在观点、方法上更进一步的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现在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有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要求的。他们希望具体弄清哪些是唯物的,哪些是唯心的,唯心的为什么不对,口服心服地在思想上进入工人阶级。他们欢迎百家争鸣,因为百家争鸣可以保障不会冤屈任何一点正确的东西,而且给任何一点可以长成为正确的东西充分发展的条件。

费孝通把百家争鸣理解为知识分子进一步改造思想、接受辩证唯物主义的途径,只是对于这一方针的贯彻,费孝通并不怎样乐观。就知识分子方面说,"对百家争鸣的方针不明白的人当然还有,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不久以后的事实表明,这些并不是知识分子的过虑。

"事情正在起变化"后,费孝通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被卷入到了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中,《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也成为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费孝通的命运也从早春落入严冬,成为著名的"右派"。从此,费孝通在沉

默中度过了自己最年富力强的20年。

1987年费孝通接受美国教授巴博德采访时说：

1957年，气氛突然改变。我被解除一切原任行政职务，只保留教授职位。实际上我喜欢这个角色，在中央民族学院当一名教授简单得多。可是，我当然不能做实地调查了。然后，下一年，他们“摘掉我的帽子”，或者说去掉我这个标签。

1959年他们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

理论上我是恢复了名誉，但实际上没有改变。这时我被称为“摘帽右派”。所以事实上我仍是一个右派分子。“摘帽右派”成为像我这样的人的特殊称号。我们还是被当作右派分子对待，被剥夺许多权利，被当作一类特殊的人对待。这是阶级斗争。

那时我的思想实际上停滞了。我不能写作，这使我智力停滞。

这一学者20年的学术生命，就这样的葬送在“圈外”了。

“行行重行行”，二次生命才开始

1980年，费孝通的“右派”生涯结束了，恢复了名誉和正常生活。他又回到圈内了。费孝通把这一天称为“第二次生命的开始”。

1990年，费孝通把自己在“第二次生命”开始后的行踪和思考，写成一本书《行行重行行》，这本记录改革开放风云的大书，凝聚了费孝通对中国改革开放形势的思考和鼓与呼：

我第二次生命开始就是去三访江村，二访江村是在我被划成右派的时候，我当时批评了政府忽视发展当时农村里的副业，农民是有饭吃而没有钱花。农村的市场经济合并到国家统一的市场经济里面去了，结果农民就吃不到饭了。真的吃不到饭了，有人饿死了。我把这个事情讲了，我批评了政府，说我是反革命，打成右派。打成右派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的事情，这里不讲。我改正之后，重新进入第二次生命，我就开始再下去调查，我要研究城乡关系，研究农民生活的，中国不只是农民问题还有其它问题，我没有精力去调查研究了。

1980年，费孝通到处去搞调查。在四处奔波调查的日子，费孝通写下了很多论述改革开放的文章。

费孝通回忆说：

我能在全国跑了之后，才看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个最清楚的事情，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当时还不行。当时认为乡镇企业不是社会主义道路，因为我支持乡镇企业差一点又被打成右派了，但是没有打成。后来承认中国农民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一定要工业下乡。在我的《行行重行行》里面就谈到，一个地方发展不发展要有个指标，有一个指标就是工农比例，工和农的生产比例，比如到我们苏南，工农比例超过一半。在长江北岸，刚刚不到一半，到了苏北就是8:2，80%的农和20%的工。

我在全国各地行行重行行，特别注意看乡镇企业，对乡镇企业我看到有三个主要来源：第一个是以公社社队工业为基础，比如像从社办或生产队办的农机修配站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原来只有几千块钱，现在有些已经发展的有几十亿了，发展到这么大。我们一路都看见了，这是一种，叫“苏南模式”。第二种就是刚才讲的“小商品大市场”，搞家庭工业，小商品都是在农民家里面造的，像钮扣、电器用品。这个市场里，农民造出来的商品质量不高，可是他造出来的，而且推销出去了，全国推销了，他们有一支推销的大军，大约有一百万人在外面，这叫市场经济，这种市场经济是从哪里来的呢?终究还是从农民那里来的。第三种是在广东最先看到的。就是三来一补的乡镇企业。现在小城镇不是大问题了，而是大战略，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小平同志说，乡镇企业是农民致富的必由之路。

这一时期，费孝通对小城镇的研究后，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并汇集成《小城镇四记》一书，引起了有识之士的广泛注意。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看到这一组文章后，在评语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这本小册子是值得一看的。文字将近四万，太长了一点，但是好看。费老毕竟是一位

有专长的学者。而这篇东西持之有据，言之成理，能给人一定的思想启迪。

从 1983 年到现在，农村的发展证实了费孝通的预言：乡镇企业的发展，推动着小城镇雨后春笋般的生长势头；而小城镇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建设，又引导着乡镇企业逐渐步入集中发展和集团化发展之路。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这个重要的经济现象有深入的理解。他说："农村改革时，我们完全没有料到的最大收获，就是乡镇企业发展起来了，……解决了占农村剩余劳动力百分之五十的人的出路问题。农民不往城市里跑，而是建设大批小型新型乡镇。" 这段话，揭示出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大批小城镇迅速兴起和亿万中国农民切身利益的相互关系。

从对关注乡镇企业开始，费孝通把目光关注到了整个工业的发展关系。他说：

香港的工业很有趣，开始是上海，就是像荣毅仁他们那样的民族工业。解放前夕他们本来是想在苏南发展民族工业，机器都买来了，到香港却停住了。不叫进来了，也不敢回来了，回来怕斗争啊，所以他们在香港落脚了；由此奠定了香港的工业基础。是用我们内地去的这些民族资本家为基础，到现在还是宁波帮、上海帮势力最大。现在他们又回来投资了，叫港资。珠江三角洲这一块是利用外资发展起来的。这叫"借船出海"，也叫"三来一补"，就是资本、原料、技术等都是外面引进的，用中国的劳动力办工业生产，即借船出海做生意。后来发展成为自己造船出海，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三资企业。

去年年底我们在珠江三角洲跑，从深圳到珠海这条线都跑了一趟。看了之后发现，他们现在基本的经济是靠外资。乡镇企业是在吸引外资，外国企业，外国市场，外国的资本，现在有 80% 是和外资结合的，现在的经济基础已经不是十年前的经济基础了。像苏州工业园，各地都有自己的开发区。搞开发区吸引外资，自己去造市场，这个很复杂。为什么这次东南亚的金融风波对国内影响没有那么大，这里原因之一就是结构上的不同。现在我们的工业结构主要是靠引进外资，外国人拿大头，带动力是中国的。我们只是拿了小头，可是这个小头把我们托起来了。变成市场化、工业化的社会了，这到江苏看看就知道了。

费孝通的这些思考，对改革开放的经济模式，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思路。

在结束采访时，费孝通说：

1999 年，我的公职都辞掉了，退休了，只留了一个北京大学的教授，还是名誉教授，不拿钱的，是做奉献。退休之后，我想还有几年要活，看上去身体还可以，还可以讲两个钟点，不错了。1990 年我 80 岁时，当时统战部请客，给我祝寿，吃饭的时候人家问我："你这一生干的事情，有没有一个目的？推动你的力量是什么？" 我当时就脱口而出说了四个字："志在富民"，志向是在富民，是要让老百姓富起来。

说起来很简单的"志在富民"四个字，费孝通一生就是这样的实践着、思考着。我们祝愿费老健康长寿，为我们的国家继续贡献他的智慧。

徐庆全 《百年潮》杂志社社长助理
杜明明 香港《文汇报》高级记者

（责任编辑 淞城）

费孝通参观家乡的展览馆

建国初叶帅抓经济的点滴回忆

● 王 匡 曾彦修

1949 年夏，曾彦修（原在中央宣传部工作）在北平奉命南下到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工作，至 1953 年冬，曾彦修调回北京止，在广州工作共 4 年多，工作岗位是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并兼任了《南方日报》社长约二年半。王匡先后担任新华社华南总社社长和华南分局宣传部副部长、部长。因此我们都看到和听到华南分局的一些事情。

进广州后不久，华南分局两位主要领导叶剑英、方方便开始采用一种领导方法，即每周召开一次分局常委扩大会议，实即分局领导召开的一种经常性的干部会议，以达到上下左右沟通和培养干部的目的。这会一般由方方主持，要做结论或回答的，由叶、方当场定案。列席这个会议的人是固定的，约二三十人，他们是：分局各部正副部长、工青妇委负责人；省府秘书长、各委副主任、厅长（当时只有民财教建……等六七个或七八个厅）、广州市委副书记、秘书长，市府副市长、秘书长等。列席的同志们现多已去世，存世的而又从头至尾一起列席这个会的，可能只有王和曾两人了。我们这篇回忆，将当时看到和听到的一些事情记录下来，也算是我俩对叶帅的一点纪念吧。

叶帅在穗期间所主持的大事很多，其中异常重要的一项就是：叶帅特别重视经济工作。这项工作大概是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谈得最多的事情。和平时期一到，叶帅最主要的注意点，就是抓住经济工作不放。在广东，则是在解放海南岛以后便特别突出。在省政府礼堂主席台一边的墙上写的就是“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这 16 个字。叶帅紧紧抓经济工作的根本特点，就是紧紧抓住“四面八方”这“十六字诀”坚持不放，从不动摇，同时他又是紧密地联系地方特点来执行这 16 字方针的，从而使得它的效果更好。而后面这点，却使他遭受了重大的打击，过去曾彦修在《广东“地方主义”是海外奇谈》一篇长文中论述过这点，他认为打击叶帅那几年在华南的工作路线的，不管它首先出自多么老资格的、我们十分尊敬的领导，我们认为他们还是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左”比右好的主义在作怪。叶帅走后，华南的空气变了，下面介绍的叶帅那么重视经济建设的种种重要措施就不见了。

叶帅紧抓发展经济这项工作时，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这就是，他没有一次不是把发展经济的重大步骤同教育和培养干部联系起来同时进行的。

解放初期，广东的经济环境是相当困难的。这首先表现在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大大减少或基本停止。这时的情况是：凡是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大；凡是半自然经济比重越大的地区，表现出来的经济困难越小（此中道理易解，就不去说它了）。据我们的观察，广东境内商业的重要性（包括运输业），在全国各省中大概要数第一了。而解放初期却有三大困难，影响物资在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交流及省际交流。其原因大概是：一是我们的经济实力还薄弱，影响人民币的币值下降；二是粤汉铁路上的英德铁桥被蒋军撤退时炸毁，沿海被封锁，无法将物资经

海陆两路运往内地及上海、天津等地。第三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中等以上的商人不了解共产党的政策,怕“共产”,怕没收,怕瓜分等,遂致观望不前,使商务不旺。当时的情况颇紧,例如农民的香蕉运不出去,每斤相当于币改后的一分钱或二分钱仍卖不出去。这类事在分局经常讨论。叶帅一面催促赶修英德铁路桥,一面抓紧省内的物资交流工作。他认为讲道理、宣传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以实例示范,使人解除顾虑。1950年,叶帅即发动和催促各地区召开物资交流大会,用赶大集,也即兴办基本上同后来的“广交会”有类似性质的较长期的交易市场,用以活跃省内的城乡与地区间的物资交流。用近20年的话来讲,就叫“搞活经济”,不过那时未用这4个字。记忆中,叶帅本人是到过两三个专区,去指导和观察过这种物资交流会的作用与问题的(其中之一肯定是到西江专区的肇庆)。叶帅决定在广州举办一个全省物资交流大会,筹备开始于1950年夏,地点选在西濠口到六二三路转角处日军轰炸成的一大片废墟地,该地即现在的文化公园。这片废墟被清理整顿好之后,搭成简易的竹棚,建店铺,各种农副产品、手工制品,琳琅满目。大约在1950年九十月时,叶帅曾带领一批干部同往该地址踏勘,我们都参加了,边看边讲,并落实到朱光副市长负责建设全省物资交流大会场地房屋工作。这个全省物资交流大会大概是1950年12月正式开幕的,叶帅又带领一批干部在正式开市前去巡视与解决问题。这次我们也被叫去了,真是大开眼界,看到了全省不计其数的名贵土特产。

又如,叶帅又大抓内外交流及侨汇工作。当时港英当局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严密封锁新中国,进出口的正式渠道被堵死了。似乎只有通过沿海及宝安县等地走私的办法分小批才能将货物运往香港,再转东南亚各地。当时我们尚无什么近代工业品可以出口,主要是土特产。叶帅多次讲,这些东西只有大陆生产,东南亚华侨、华人也只要大陆去的东西。中药(包括煮药的陶罐)、烟花爆竹、香烛、迷信品(纸钱、金银箔等)、食物、香云纱、细竹竿等等,全是外销品。这些,都是叶帅在会上介绍的(当时华南财委主任及财政、商业两厅长均不是广东人)。我记得他讲过两个特别有趣的例子,一是煨药的中国老式药罐,说中国人煎药,讲究药罐,海外华侨、华人也是一样,煨药也要用中国老药罐。至于细长竹竿,这是英国绅士特别喜爱的排场,用以围绕他们的花园及房舍,英本土及英殖民地也跟着流行这套东西,以示高雅,需求量不少,价格不低。在坐的人,多是南下的,所以叶帅还得对部下做这类启蒙工作。

当时,中国同外国以至港澳都还没有汇兑关系,侨汇一时进不来。叶帅说,要努力争取,想法恢复“水客”制度,这主要是对分局统战部饶彰风同志讲的,好像还嘱咐他去请教邓文钊先生(著名民主人士、香港银行家,中共的可靠朋友和支持者,时已回穗任省财厅厅长或副厅长)商量,如何把老“水客”们重新组织起来去招揽侨汇。所谓“水客”,外省人不懂得,是指19世纪及20世纪初,中国尚无近代银行汇兑制度时,东南亚华侨、华裔寄钱回家的一种专业的现款携带人。这种人必须是在广东家乡关系多,信誉好而又十分能干的人,跑来跑去专干此事,从中取得规定的报酬,是旧时侨汇收入中不可少的业务承担人。可是到解放时,这项业务已经停顿了。由此可见叶帅劳心忧思之细密。

叶帅对“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16字方针,是坚持必须全面执行的。例如,在会上,他常常问起广州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情况,很注意团结他们,强调不要对他们太“左”等。会上,经常向朱光副市长和饶彰风副部长问及一些爱国进步资方代表的情况和他们有些什么意见等。整整50年过去了,但至今我们还记得林志澄、梁尚立这些代表人物的名字,这是因为会上常常提及他们的缘故。这个例子,说明叶帅、方方、古大存、朱光、饶彰风这些老同志当年是如何兢兢业业地在认真执行党的正确政策,而且他们给人们的印象是何等深刻。

我们感到,在叶帅的心目中是从不曾有过

"闭关锁国"想法的,他真心实意地要搞内外交流。重要事实之一是,在1951年夏天,他在分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了要准备继续修建黄埔港,以便在珠江三角洲直接进行对外贸易。又宣布,大家要去看看,不要纸上谈兵。不久,果然去了。坐的是一只小艇,由叶帅带领数人参加视察。艇上带了面包和汽水,是下午才回市内的。这次视察,到场的人不多,我们现在记得的是分局办公厅林西、姚天纵,可能还有交通厅长冯燊,王匡和曾彦修应是以新闻记者身份随行的。视察区域是黄埔军校附近的水域,这一带港湾交错,有的地方水深,可建造停泊巨轮的大港。叶帅对大家介绍,这地方是1936年吴铁城当省主席时开始建设的(此点可能记忆不确),日本侵华后停止了,胜利后宋子文来当省主席时又继续建设,已有点基础了。如建成,×万吨(记不清楚了)外国货船可直接进出,港英当局就卡不住我们了。这次座谈是在岸上钢筋水泥未建成码头的坝址上进行的,基本上是由叶帅讲话。其余时间则在附近珠江三角洲水域航行,叶帅一面观察,一面给大家解释附近水域情况。叶帅强调,经济建设不能在室内空谈,一定要到现场去了解情况。数十年后,曾彦修对王匡谈起此事,说参加那次开港查勘的,只有我们两人在世了。我还保存那天的照片,叶帅穿的是香云纱中式短装。

叶帅特别强调要重视培养干部,并在实践上把经济建设作为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他从实践上,实行了要干部们对经济工作从头学起的教育方法。他在常委扩大会议上反复讲的一句格言是:不怕事前不懂得,就怕临事不学习。他的解释很科学:人哪能事事都先学会,遇到新问题时只要肯认真去学习便好了,怕就怕临事还不学习,那就什么新本事也不会,什么新工作也不会做了。叶帅的这番格言,确是十分重要而极富智慧的。

在实践上,叶帅在华南工作期间正是始终坚持这么做的,现在再举两个训练干部学习经济工作的例子。一个是海南岛种植橡胶问题。叶帅在广州梅花村分局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专门的干部会,到会人数,估计有七八十甚至上百人,省市副部、副厅、副局以上的干部都参加了,主要的报告是由苏联专家作的,他们国内虽然不适于种橡胶;但对于亚热带种植橡胶问题还是有些研究。这个会开了一整天还是两整天记不清了,印象是讲得相当详透,闻所未闻,大开眼界,实际是进了一个短期训练班。

另一件是讲在广东大修全天候战略公路问题,参加会议的人可能比橡胶会议还要多些。主要由苏联专家讲。这会好像也开了两整天。那个"公路"同我们日常所说的公路概念可谓大为不同,它的名称叫做"全天候战略公路"。在华南,它的含义大概包括以下几个要点:一,连降几天大雨仍可通车;二,几天暴日下路面不溶化,仍可日夜通车;三,可长期承受重卡车及坦克碾压。1951年冬,曾彦修奉命带了一个文教大队到肇庆专区云浮县参加土改,就看见了正在大修这种公路。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工程之大,令人吃惊。曾彦修曾因返肇庆向地委书记梁嘉报告并请示工作,单独往返云浮至肇庆间二次,曾下车详睹了这公路的建造法。此路路面上绝不用柏油,以防溶化并成片脱落。大致是:地面掘进约一尺半深,最底层是用人力一块块地镶嵌一尺多长的不规则石块。镶嵌好后,再以蚕豆大石粒适度填充大空隙,以固定石块,然后以重型压路机反复碾压。如此反复,再砌或铺2~3层块石或碎石,每加一层碾压一次。最上面二层,依次为橄榄般大小碎石,碾压后再铺表层,表层全为略大于黄豆的细石粒,然后再反复碾压,公路即成。路的两肩也均用大石块镶嵌,以资保护。如此,路面不会溶化,不会成块脱落,不怕高温,不怕淫雨,不会卷起沙尘巨龙,最主要的是透水性能极好。于是,便成为全天候的战略公路了。据当时苏联专家介绍,这种类型的多种公路,是二战期间进入德国后才得知其详的。

可惜叶帅主持华南工作的时间太短了,如果尽其所能,少受干扰,那么华南的经济建设工作,恐怕早就十分可观了。

(注:此文由曾彦修起草,经王匡定稿,联名发表)

(责任编辑　方 实)

张爱萍初上国防科研路

● 贺茂芝

1955年冬的一天，已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陈毅，找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兴致勃勃地告诉他："我刚参加周总理主持召开的一个会回来，新成立了个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研究制订全国科学技术12年规划。"

张爱萍听了十分激动、振奋。前不久，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强调：我们进入了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新时期；适应这种新的情况，钻进去，成为内行，这是我们的任务。而今又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制订了向科学高峰进军的作战计划，冲锋在即，他怎么能不激动呢?

陈毅对他说："这是第一次会议，还没研究到我们军队的12年规划。我刚才同彭老总商量了，第二次会议你去参加，参加制订军队的科研规划。"

这年初，张爱萍指挥打了一场解放一江山的立体战争，当他刚迈入现代化军事指挥艺术的门槛时，又要他进军科研，他不禁愕然，连忙说："我不懂科学技术，怎么能去参加这样的会议呢？"

陈毅说："我同彭老总排了排队，觉得还是你合适，他点名要你去；再说你管装备，对部队也熟悉，就这么决定了。"

张爱萍参加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举行的第二次会议。根据国家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研究拟定了全国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张爱萍根据这总的规划和要求，又草拟了《关于十二年内我国科学对国防需要的研究项目的初步意见》，当即呈报给聂荣臻副主席并军委。规划要发展的项目有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常规武器、军事医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备和油料等。

4月13日，国务院决定成立航空委员会，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安东为秘书长，负责领导导弹和飞机的研制工作。接着，召开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的科学规划

张爱萍近影

工作会议，同时确定军队方面的科研工作规划。会前张爱萍又向聂荣臻呈送了《关于军队内部建立科学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内容是:组成全军科学研究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并在各军种、兵种、勤务部门分别建立科学研究机构。重点建立带共同性的研究部门,如航空、导弹;电子学、雷达、常规武器;军事医学;原子、化学防护;国防工程;军需装备等。并抽调人员培训大批军事科学技术研究干部,同时争取苏军的军事科学技术研究机构对我军的科学研究工作予以全面的协助。

聂荣臻和军委很快同意了这一意见。1956年10月15日,聂荣臻采纳了张爱萍关于组团到苏联学习并谈判,争取他们在原子弹、导弹、航空等方面给我国以技术援助的建议。

不久,聂荣臻率团赴苏学习与谈判。两国代表团团长在莫斯科签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政府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工业的协定》。协定商定:苏联在1961年底前向中国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中国仿制导弹,提供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增加火箭专业留学生名额;苏联保证供给中国某些原子弹的全部技术资料;提供训练和战斗用的成品样品;帮助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协定还就苏联向中国提供制造氢弹技术资料、生产和装配原子弹的工厂等作了具体规定。

这一时期,在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兼职的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仍然继续负责组织领导常规武器的规划、研制及装备部队等工作。他在拟制了军队十二年科研规划之后,就向彭德怀报告了有关常规武器的研制拟在军队专门组织一个小组的打算。彭德怀授权让他考虑组织。

1958年5月19日,根据张爱萍的建议,中央军委决定:国防部下设第五部,负责领导全军特种武器装备的科学技术研究和特种部队的组织及其装备计划等工作,万毅任部长。其整体工作及尖端武器的研制工作还是由张爱萍负责组织协调。

为了领导常规武器的研制工作，张爱萍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学习改进常规武器方面来。只要能挤出空来,他就往吉林白城子靶场、黑龙江的半自动步枪厂、重庆的坦克工厂等常规武器的研究、生产单位跑,向专家们请教,向师傅们学习。

1958年8月,他还作为团长,率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代表团访问苏联；请苏方对我国常规武器发展12年规划提意见,并请苏方对我们聘请专家、派遣留苏进修生以及技术资料、仪器设备等方面提供帮助。

随着尖端武器和常规武器研制工作的展开,有些问题和矛盾需要协调和解决。

当时,军事行政是由总参管,政治(包括干部的调配)属总政治部管,后勤保障由总后勤部管。多头负责,机构分散,时间愈久,暴露出的问题就愈多，最后许多问题还得报由周恩来总理解决。于是,张爱萍就在几位相关的老帅、军委首长及周恩来总理面前游说,终于在1958年10月对协调问题统一了认识。

10月16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关于改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为国防部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的报告》，提出国防科委的主要任务是,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国防科学技术研究的方针、政策,负责加强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和监督检查。

1960年3月18日,周总理批准,国防部任命,张爱萍兼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分工负责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以下简称酒泉基地)、西北核试验基地和储存器材仓库基地的组织领导工作。

酒泉基地坐落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境内。除青山头、狼心山几个丘陵外,则是一望无际的茫茫戈壁。张爱萍率领的检查组来检查时,自抗美援朝战场胜利归来的二十兵团正投入紧张而又艰难的基地建设之中,有的厂区已拉起了围墙,修平了道路,有的正在修建宿舍。

这里是沙漠深处,张爱萍代表中央军委、总部首长向顶风冒沙、艰苦奋斗的建设者们表示

了亲切的慰问，并深入到每个工地看望大家，慰问了伤病员。之后，他又率领工作组对施工的进度、质量和设备安装情况，进行了认真细致的检查。

张爱萍在检查中，发现几十名指战员正在建设防爆设施。他们在坚硬的戈壁上挖洞，土层坚硬得如铁板，一镐刨下去，只留下一个白点儿。不少指战员虎口被震裂，有的手掌磨起了血泡。

张爱萍和朱光亚在一起谈国防建设

张爱萍环视了一下周围，发现不远处就有座小山，遂问道："既然是为了防爆，为什么不到山那边去挖呢？依山挖洞，傍山建房，不是更利于防爆也省力气吗？"指战员回答说：这是苏联专家设计的。张爱萍说：苏联专家设计的就不能改了吗？权威的东西也不一定都是正确的，不从实际出发就不是什么权威。于是指示技术人员：再重新审核一下，如果这个建筑只是为了防爆，就挪到山那边去。

在检查中，张爱萍还发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没有地下水。工程兵司令员、特种工程指挥部指挥陈士榘曾组织工兵部队打井，在几处挖了100多米都未挖出水来。怎么办？张爱萍当即决定去空中勘察，看周围有没有水源？如果没有地下水，我们就引外边的水。

直升机在额济纳旗的上空缓缓飞行。开始，张爱萍看到的是广阔无垠的戈壁滩和一簇簇骆驼刺。再往北飞，陡然发现一片横贯东西的林带。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片原始森林。张爱萍不胜欣喜地说：有林就有水，我们不愁找不到水源。果然，林带中有一条河流，好像一条宽阔的白练丝带。当听说这是弱水河时，张爱萍不禁兴奋起来，立即想到苏武牧羊的故事。据说，当年苏武就常赶着羊群到弱水河饮水。也许正因为如此，张爱萍对弱水河似乎增添了特殊的情感。他让飞行员沿着河道再看上一遍。张爱萍当即提出引弱水河水南下，以解决基地无地下水的困难，基地领导一致赞成。

在研究生活区的设计和建设时，张爱萍力主把基地建成一个设备齐全、环境优美的现代化新兴城市。他说：不能什么都靠外面运，要自己创造，自己发展，要充分利用自然条件和环境，变废为利，变害为益。在依山建筑、挖河引水的同时，要注意修路植树，建起商店、书店、学校和幼儿园，并动员先期到达的家属一起干，建成后安排他们在这里工作，既解决了就业问题，又培养了创业精神。

之后，张爱萍一行又乘专机飞抵坐落在罗布泊西北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核试验基地进行检查。

从直升机俯瞰塔克拉玛干千里戈壁，茫茫荒漠，犹如无垠的大海。几座丘陵就像浮出水面的孤岛，均呈铁青色。直到孔雀河上空，才发现星星点点的绿色和断断续续线状的亮色。这绿色和亮色分别是孔雀河的芦苇丛及河水，与其相邻的则是一片古城的废墟。

"这是不是古楼兰国的遗址？"张爱萍脱口

问道，语气里透出兴奋。有人回答："可能是。"他坚定地说："一定是，照这个位置也应该是。"他让飞行员飞低一些，低到可以看见被漠土掩埋其半的残垣断壁及墙垣一角的烽燧，直低到飞机的螺旋浆搅起了纷飞的沙土。有人深知张爱萍酷爱游览名胜古迹，便提议道："我们把飞机落到地，看看再走吧。"张爱萍果断地说："不，我们的任务紧急，等我们炸响第一颗原子弹后，再来拜访古楼兰。"

勘察后，张爱萍结合实地，分析图纸，认为没有充分利用自然环境、地形地貌的优势，在戈壁滩里深挖建房同依山势而建相比，显然是舍优而图劣，事倍功半。于是，经多方比较、反复研究，对基本建设布局作了部分变更。

之后，张爱萍、陈士渠同基地司令员张蕴玉等一起，分乘两辆吉普车穿行在大戈壁中，对原设计中确定的场、区、点址，又逐点逐点地检查、核定。

戈壁滩里没有路。戈壁滩上厚厚的一层是被烈日蒸烤、风雨浸蚀而凝固成的沙石，坚硬如铁，高低不平。车行上面，颠簸异常。张爱萍一行在已选定的靶区内下车，脚踩在沙石板结的地面上，像踩在玻璃碎片上一样，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张爱萍弯腰一看，脚下踩的是形状各异的紫褐色的石片，四周遍地都是。他捡起两块敲击几下，发出清脆悦耳的响声。他跺了跺脚下说："靶场中心就定在这里。"工作人员遂标图、定点、楔桩。

一天晚上，他们来到一处兵站休息，兵站叫张郭庄，是由该站站长、政委的姓氏组合而成的。张爱萍说：这样叫不科学。以后站领导易人，要不要再以新领导的姓氏更名？站领导恳请他给起个名字。恰逢科委副秘书长张震寰扛着棵大甘草走进来。张爱萍说：我建议这个接待站叫甘草泉吧，沙漠里缺水，接待站就像甘甜的泉水一样重要。在选定生活区驻址后，大家商讨叫什么名字。张爱萍见这里长有一片片的马兰草，青翠的剑叶，亦白亦红亦蓝的小花，生命力极强，为荒漠平添了几分生机，于是就提议叫"马兰"。此后，地图上就出现了马兰的名字……如今这里已是一座数十万人口的城市了。

（责任编辑　刘 文）

钱瑛与《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无关

接到原红二方面军战史编委会办公室主任杨秀山同志的电话，对贵刊2000年第9期发表的《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钱瑛》一文提出意见。他说：作者对钱瑛在洪湖苏区一段斗争经历了解甚差，有不符合历史真实之处，用此标题，就更错了。钱瑛是1931年由中央派到洪湖苏区的，主要担任潜江领导人。而《洪湖赤卫队》影片及歌剧是反映1930年当地游击队、赤卫队与敌白极会（一称北极会）作斗争的。此时钱瑛尚未来洪湖苏区。1931年她到苏区后也未参加红军、赤卫队、游击队的活动。因此，写她在1932年5月率一支游击队与敌军主力作战，打乱敌军部署，使敌不敢贸然进犯，红军主力赶来，击溃了敌人等等，都是并无其事。将钱瑛说成是"洪湖赤卫队"主角原型更是错误的。

杨秀山是洪湖沔阳县人（现洪湖县），1929年参加红军。建国后任总参军校部部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后勤学院院长等职。洪湖苏区的斗争，他从1929年以后都直接参加过，他对钱瑛那一段历史是很了解的。我在1959年——1962年参加编写《红二方面军战史》及1987年至1990年改战史，对钱瑛这一段历史也是比较清楚的。我认为，为文艺作品的主人公找"原型"是不科学的。文艺作品总是典型化的，有虚构的成分。《洪湖赤卫队》刚刚出台时，洪湖当地群众盛传是写贺龙的大姐贺英的，而且，不少老游击队员证明贺龙和贺英都在洪湖苏区斗争过。韩英即贺英也就传开了。后来我们战史编委会出面说明贺英从未参加洪湖苏区的斗争，作正式辟谣。原歌剧的作者也没有具体的"原型"，把剧中人韩英如此取名，只是偶合。如今又多了一个钱瑛，更是荒唐了。

贵刊发的这篇文章标题太显眼，事实又失真，引起当年在洪湖苏区直接参与斗争的老同志强烈反映，也是可以理解的。

黎　白

大革命前后 刘少奇在上海

● 陆米强

刘少奇从青年时代起就在上海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以后他又多次前来上海，在上海留下了许多永为后人纪念的光辉足迹。

为留俄到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

1920年6月，时年22岁的刘少奇从河北保定育德中学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毕业，在该校求学时，他阅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那年8月份，当他返回湖南长沙时，听说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正在介绍一些青年人到苏俄去学习，于是就萌发了留俄的想法。不久，他与贺民范等人频繁接触，交谈讨论有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事情。同年10月，经贺民范介绍，刘少奇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前来上海，进入外国语学社留俄预备班学习。

外国语学社是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中共早期组织）创办的，创办的时间在1920年9月，地点就设在霞飞路渔阳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该处也是中国最早创立的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所在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公开创办外语学社的目的，是为了输送有志青年赴俄学习，培养造就革命人才。学生中除刘少奇外，还有罗亦农、任弼时、李启汉、汪寿华、肖劲光、丁玲、蒋光慈等许多进步青年。由杨明斋任校长兼教俄语；俞秀松任秘书具体管理行政事务。教师有：魏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俄语；李达教日语；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英语。后来学生人数增多，又聘请了王元龄任俄语教师。魏金斯基是俄共（布）党员，当时是由共产国际指派到中国来酝酿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杨明斋是共产国际代表团的翻译，当时又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之一；俞秀松时任上海青年团和团临时中央书记，也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李达、李汉俊、袁振英也都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最早成员。

刘少奇到上海后，先后住宿在白尔路（现太仓路）和外国语学社内。不久，任弼时、肖劲光等人也到上海，他们就同住在菜市路（现顺昌路）的一幢石库门房屋的亭子间里。

青年刘少奇充满革命热情和求知欲望。他每天清晨徒步到外国语学社静听老师们讲授俄文；晚上则独自在宿舍内复习功课，阅读各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刊，沉思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在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领导和组织下，刘少奇还经常和同学们一起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杨明斋在该处创办了一个中俄通信社（后名华俄通信社），专发介绍俄国十月革命后情况的稿件，文章主要送《民国日报》刊登。刘少奇和同学们一起帮助该通信社以及由陈独秀、李汉俊发起创办的《劳动界》周刊做收发、缮写、校对等工作。在此学习期间，他们生活过得相当艰苦，每月生活费只有5元6角，有时五个人包四个人的饭，节省一人的饭钱留作他用。

1921年初，经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推荐和

刘少奇

杨明斋的介绍，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等十多人准备赴俄国留学。他们初夏从上海出发，7月9日到达莫斯科，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同年冬天，刘少奇和罗亦农等人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刘少奇还担任东方大学中共旅莫支部的支部委员。

离俄回国在沪参加革命活动

1922年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少奇带领一部分留俄同学回国来到上海，参加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工作，寓居于虬江路宝源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于1921年8月成立的公开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总机关，当时上海许多工厂工人在罢工前都来这里请求指导和帮助。这一年浦东日华纱厂等厂工人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刘少奇穿着工人服装到罢工的工人群众中间去进行宣传和鼓动。上海的党团员和平民女校的学生也在劳动组合书记部的组织安排下，声援工人的罢工斗争。平民女校是中共建党初期为了开展工人运动和女工工作需要而创办的，由中共中央局宣传主任李达任校务主任，许多早期著名的中共党员如陈独秀、陈望道、邵力子、沈雁冰、张太雷、恽代英、施存统等人都应邀到该校去讲课。学生均为半工半读，共有30多名，都是各地不堪忍受封建压迫到上海寻求出路的青年女学生。校址设于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今成都北路7弄42号）。当时，刘少奇也在该校担任理论教员，经常给青年妇女作演讲。他能滔滔不绝地连续讲上几个小时，讲的内容相当丰富，深入浅出，通俗易懂。他向学生汇报自己赴俄国学习的感受和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情况，阐述世界革命的形势、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科学知识。课后，还常常和大家促膝谈心，询问她们的出身、经历和生活情况，启发她们把争取个人自由、争取妇女解放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结合起来。他还介绍湖南青年王一知等同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团中央临时机关设在大沽路356、357号(今大沽路400、402号)。在党的领导下，团组织在团中央机关内设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上海的党员、团员和进步青年常在那里开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活动。刘少奇也曾经到那里去指导大家的学习和研究，耐心地向大家解释各种难懂的理论问题。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不久，毛泽东、李立三在安源领导路矿工人大罢工。毛泽东请求党中央调派一名得力干部去加强这次罢工斗争的领导力量，于是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陈独秀接见了刘少奇，派他回湖南工作，临行前还把中共“二大”通过的文件交给他带给由毛泽东等人领导的中共湘区委员会。

参与领导上海五卅运动

1925年，中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上海、青岛等地的日商工厂工人先后举行大规模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5月15日，上海日商纱厂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10多人，激起全市工人、学生和

市民的愤怒。5 月 30 日，英国巡捕在南京路屠杀集会群众，制造了五卅惨案，一场以上海为中心的反帝爱国运动迅猛爆发。此时，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对上海工人罢工斗争的领导，电令刘少奇立即从青岛返回上海，参与领导上海的罢工斗争。6 月 1 日，上海总工会成立，刘少奇作为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兼上海总工会总务科主任（相当于秘书长），与担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李立三共同领导上海的罢工斗争。

6 月 1 日，上海总工会刚一成立，就公开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 20 多万工人先后罢工，5 万学生举行罢课，大部分商人参加罢市，租界巡捕房华捕也有半数以上罢岗。刘少奇记述当时情形道："那时我们到上海马路上一看，只见满街贴的是反帝国主义的标语、口号、图画；处处都有游行的，演讲的，募捐的，演戏的，闹个不休，个个人都忙着反帝国主义的工作，此是中国境地的情形。至于在租界内，则大不同了，我们只看见工厂闭了门，商店闭了市，侦探往来，巡捕满街，机关枪大炮布满街口，都作射击之状，此为租界恐怖严重之情形。"（见刘少奇撰：《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

上海总工会成立后，李立三主要负责对外联络交涉等重要工作，刘少奇则在工人内部抓紧组织工作，他竭力加强总工会自身职能机构建设，又十分重视建立和健全基层工会组织。他安排工会骨干和上海大学学生分赴工厂去组织工会。他还亲自制定了基层工会严密的组织体系，规定基层工会每 10 人为一组，每三组成立干事会，干事会设工会委员会，还在全市分设 5 个办事处，以加强总工会和各基层组织的联系。此外，他还把纱厂、印刷、铁厂这三大行业按条块组织起来，先后成立了印刷总工会、纱厂总工会和铁厂工会联合会这三个行业工会。其中铁厂工会联合会由于组织基础薄弱，刘少奇就亲自参加筹建工作，出席成立大会，并当选为该会的秘书。在刘少奇的直接领导组织下，截至 1925 年 7 月 28 日止，全市共建立了 93 个基层工会，连原来建立的 24 个，全市共建立了 117 个工会，会员人数达 21 万多人。

6 月中旬以后，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擅自修改同帝国主义交涉的条件，又擅自决定开市，向帝国主义妥协。在反帝爱国运动的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刻，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一起，又担负起领导全市工人继续罢工的重任。

6 月 20 日下午 2 时，上海总工会召集全市各行业 60 多个工会的 130 多名工人代表紧急研究和部署对策。会上，刘少奇阐述了运动形势和工人阶级所负使命，并传达了党的斗争策略，鼓励大家不要灰心，要坚持斗争。刘少奇还提出商界如要开市，必须答应发放罢工救济费的条件。与会代表听了刘少奇的讲话，都十分振奋。大会决议：不论商会开市与否，工界决不依赖，坚持罢工到底。会后，工人罢工斗争的声势更大，一些中小商人在工人罢工斗争的鼓舞下，又纷纷投入了罢市斗争。

自从 7 月份以后，全市总罢工进入更加艰苦的阶段，开始陷入孤军奋战的困境。客观形势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作出相应的策略转变。然而，当时党内一部分同志和工人骨干想以工人武装暴动来挽救此种危机。刘少奇独具慧眼，十分冷静，他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向中共中央力陈主动收缩罢工，保存工人力量的主张。党中央同意了他的这一正确主张。8 月中旬，党中央研究决定，为保存工人阶级的组织和争得的利益，为迎接大革命高潮的到来，号召工人有组织、有条件地转入复工。此时，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在闸北宝通路顺泰里 4 弄 30 号内设立机关，由刘少奇任总负责，李立三任组织部长，林育南任秘书长。全总机构设立后，刘少奇和李立三等人又高度灵活机智地掌握了党的斗争策略，肩负起领导工人分批复工的艰巨而又重大的任务。

8 月底到 9 月上旬，为了解决华商工厂的复工问题，刘少奇代表上海总工会与总商会和纱厂资本家反复交涉谈判，最后资本家答应工人提出的承认工会、工人恢复原职、发给停工期内工资等 6 项条件。接着，刘少奇又耐心说服工人在满足基本要求条件下顾全大局，马上

转入复工。9 月 10 日，华商各厂终于顺利复工。日商、华商各厂复工后，刘少奇又在总工会召集英商工厂代表开会，他要求英厂工人继续罢工。他向大家阐明道："英国人在南京枪杀同胞……以至到现在 9 月 7 日在爱多亚路又枪杀我工界同胞"，由于"我们受英人许多的压迫，许多惨杀"，"所以这是我们不上工的第一个理由"。代表们纷纷表示："我们罢工已久，无条件上工是不可以的。"大家一致主张继续罢工。这样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最凶残、最顽固的老牌英帝国主义（见《上海总工会代表会议记录》）。经艰苦努力，9 月 30 日，英商工厂资本家被迫答应工人提出的七项条件，英厂工人有组织地开始复工。

另外，在五卅大罢工期间，全市 20 万工人罢工后，断绝了一切工资来源，工人的生活将无法维持下去，这就严重影响罢工斗争能否持久广泛地开展下去。为了解决这个十分棘手的问题，刘少奇义不容辞地担负起募捐救济罢工的领导工作。他经常到工人家中去访贫问苦，亲自给罢工的电车工厂和英厂工人发放救济金。当时敌人伪造总工会募捐账册和收据，假冒总工会的名义到处招摇撞骗，威胁社会各界人士限期捐款，污蔑总工会中饱募捐款项。为了揭穿敌人的阴谋，刘少奇特别邀请社会上很有声望的徐永祚会计师核对总工会的募捐账目，并将总工会收到的捐款和各项支出等账目，公布于《上海总工会日刊》，用铁的事实来揭穿敌人的阴谋，从而使上海总工会在全市工人和各界民众中间树立起良好的声誉，使各界民众更加同情和支持全市工人的罢工斗争，他们把许多捐款纷纷寄送给上海总工会。至 1925 年 7 月 24 日为止，外地和本市群众团体及民众寄送给上海总工会的捐款共有银元 26 万多，美金 4 万多，另有许多日币、银角、铜元等（见《民国日报》1925 年 8 月 17 日）。就这样，在刘少奇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全市大罢工有了一定的经济支援，从而增强了工人罢工斗争的信心。

上海总工会在五卅运动中的重大影响和作用，激起了帝国主义和军阀走狗的恐慌和愤恨。9 月 18 日，军阀政府调动大批军警查封总工会，又下令通缉李立三和刘少奇等人。刘少奇不畏艰险，在总工会被封的第二天，仍然和总工会组织科负责同志联名致函临时济安会（五卅运动中资产阶级的一个组织），要求该会继续救济英厂罢工工人。此时他不幸身患肺病，但仍坚持抱病工作，日以继夜地奔走在工人群众中间，组织安排各基层工会的工作。他曾对工人们说："如果真正为工友奋斗，替工人谋利益的人，并不在平日工人组织公开的时候看他的工作如何，而在最紧急的时候看他努力不努力以为断。"刘少奇的这种崇高革命品质深受上海工人阶级的敬仰和爱戴，也得到了全国爱国民众的一致好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五卅运动后赞颂刘少奇道："废寝忘餐，从事奔走，号召国人为救国运动，以全力为罢工工人后盾，爱国热忱，举国同钦。"（见《工人之路》1926 年第 200 期）同年 11 月，五卅运动的浪潮过去以后，刘少奇才抱病离开上海，回到长沙休养。

大革命失败后
在沪秘密开展革命活动

1927 年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惨遭失败，全国各地到处处于腥风血雨之中。在此期间，上海的革命形势也非常危急，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捕被杀，党的各级组织和进步群众团体也遭到很大的破坏。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为了挽救革命，坚持斗争，刘少奇不畏艰险，从 1927 年 10 月至 1932 年冬，曾数度前来上海，积极从事党的地下革命活动。

1931 年秋，刘少奇从莫斯科回国到达上海。此时，他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担任中共临时中央职工部部长兼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统治地位。王明一伙不顾极其危险的客观环境，坚持冒险主义的公开活动，拒绝利用一切合法的形式，组织工人到市中心公开场合散发传单，高呼口号，举行飞行集会，使许

多工人骨干和罢工领导人暴露目标，惨遭国民党军警的逮捕和残杀，导致上海工人运动屡遭失败。为了改变当时工人运动不利的状况，正确引导工人群众投入实际革命斗争，刘少奇在上海召开的中央职工部工作会议上，发言表示反对王明一伙的这种极端错误的做法，引起了王明追随者的注意。不久，刘少奇又以仲篪的笔名，写了《关于工运意见》一信给中共临时中央，对工人斗争的形势提出了不同的意见。王明一伙看到这封信后，更加警觉到刘少奇与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尔后，中共中央派人同刘少奇作了两次谈话，并在党的会议上宣布刘少奇在职工运动问题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1932年，日本出兵侵略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上海各界爱国民众积极援助十九路军奋勇抗战，全国总工会也号召上海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不久，沪西日商纱厂工人首先起来响应。随后，沪东、闸北大批工人也在沪西汇合参加罢工斗争。刘少奇在工人斗争高涨的形势下强调指出，应首先帮助近20万罢工工人及其家属解决生活问题，并向社会广泛宣传反日罢工的意义，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利用合法方式开展募捐活动。并发动群众包围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社会局和地方维持会，迫使他们拿出钱来救济罢工工人。就这样，罢工委员会较好地解决了罢工期间的工人生活问题。接着又在工人中间开展教育和组织工作，发动罢工工人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抗战，承担救护伤兵、运输、挖掘战壕、宣传鼓动等工作。3月初，十九路军孤军作战，国民党政府不予接济，后路又被日军袭击，不得不撤离上海，淞沪战争结束。此时，上海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中外反动派集中力量严密监视和镇压沪西罢工工人。为了保存工人群众的有生力量，免遭不必要的损失，刘少奇支持全国总工会作出的复工决定。但中共临时中央拒绝接受刘少奇提出的关于有条件复工的意见，仍要工人坚持罢工，最后导致许多罢工者被厂方开除、罢工领袖被捕。在罢工期间刚刚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又遭到严重损失。

1931年11月至1932年3月，刘少奇在《工运指南》和《红旗日报》等刊物上相继发表了《建立辅助组织问题》、《加紧领导工人的自发斗争》、《在目前反帝运动中赤色工会应努力的工作》、《罢工策略》、《国民党封闭永安工厂工会及逮捕工人、我们应否号召工人反对？》、《批评“退出黄色工会”的策略》、《1931年职工运动总结》等一系列文章，正确估计了群众斗争的形势，提出了转变白区群众工作的方针和策略。并尖锐地指出：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同志总是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当作“圣经”来念，“他们不会估计到实际的具体的特殊的环境”。（见《在黄色工会里面建立什么？》一文）他还明确主张应该利用公开合法的形式和敌人的内部矛盾，去争取群众和同盟者，积蓄革命力量，等待时机，准备同敌人进行胜利的决斗。然而，他的正确理论和策略却遭到王明一伙的粗暴攻击。1932年3月，王明在《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的一书再版时，不点名地批判刘少奇的所谓右倾错误。与此同时，中共临时中央也发表《中央为职工运动致同志的一封信》，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刘少奇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又接二连三地在党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公开批判刘少奇，指责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4月3日，康生也以谢康的笔名在《红旗周报》上撰写《机会主义职工运动的总结》一文，用极左的论调攻击污蔑刘少奇的正确主张。在此期间，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还撤销了刘少奇的中央职工部部长职务，并逼迫刘少奇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检查。刘少奇虽然遭到诬蔑和打击，但他总是从大局利益考虑，严守党的纪律，对自己所受的委屈，从不随便跟党内其他同志谈起。

刘少奇被调离中央职工部以后，下放到上海市工会联合会，任党团书记。他一边深入到浦东纱厂从事党的基层建设工作，一边还抽出许多时间研究国民党统治区和革命根据地的工人运动理论。

1932年冬，刘少奇离开上海，前往江西瑞金毛泽东开创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

（责任编辑　云　山）

为知识分子仗义执言的陈毅

● 吴跃农

陈毅出任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是邓小平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议的，并由毛泽东征求了著名的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人的意见后定下来的。50年代后期，陈毅奉调到中央工作，兼任外交部长，是分管科学文化工作的国务院常务副总理，与知识分子交往交朋友是他的主要工作内容。

知识分子愿意与他交往，促膝谈心，因为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位求知若渴之人，懂得尊重人

上海解放时，周恩来说，上海不仅在工业、商业方面是占了全国总量的一半，人文荟萃，文教事业上也是"半壁江山"。可见，上海工作对于稳定全国有着举足轻重的示范效用。"进入上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大难关。"毛主席确信陈毅能与上海的知识分子打好交道，能打开上海工作的局面。陈毅高度重视上海知识分子工作，在四大接管系统中，他亲自任文化接管委员会主任，并经中央同意，专门从香港调回熟悉城市工作、文化工作的潘汉年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调回中共老资格的经济学者许涤新协助曾山处理经济工作，调回中共的文化工作者、作家夏衍任负责实际工作的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他告诉夏衍，要教育我们的干部与上海知识分子打交道，"不要急躁，更不得粗暴"，一定要"礼贤下士"，有事要一一亲自登门，千万不能一个电话打过去，叫人家到机关来谈事。

陈毅说，与知识分子相处，要懂得基本的一条道理，"我们尊重他们，他们才会尊重我们。"上海接管后，陈毅指示夏衍筹备一个他以上海市长身份与上海文化界座谈的出席者名单，夏衍一时吃不准该请谁，不该请谁，加上以前在上海工作时，有亲有疏，索性搞了个范围很广的名单，意思是让陈毅自己来筛选，陈毅看了后，把常务副市长潘汉年找来作进一步商量，不仅没有删名单，而是对名单充分研究后又进行了细致的增补。他说，范围广点好，都要请嘛！他语重心长地对夏衍说："这是我第一次与上海文化界见面，要讲讲党的政策，让大家安心工作，团结面越宽越好，你们这些老上海要胸襟宽大，不要因为过去有过什么思想上、感情上的纠葛而抱成见，过去他骂过你一句，你嘘过他一声，这都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千万不要因为你们做了当权派，就可以报一箭之仇，凡是愿意为新中国服务的，一律要团结，社会上地位相同的人，请了这个不请那个人家就会生气，这就是古话说的'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照顾到，'勿使一人向隅，举座为之不欢。'"

也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陈毅与知识分子交心说："我这个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也算是知识分子出身。我翻译过波特莱尔的诗，写过小说、诗文。我个人的改变就经历了3个阶段：开头是地主出身，信孔夫子那一套，后来接受了新思想，改信了"德先生、赛先生"，变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最后，从法国勤工俭学回

来，经过矛盾、消沉、碰壁，才选择了革命的道路，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这几步我走得都不容易，有别人推动，也有环境的逼迫。”

这次会议，使上海的知识分子对陈毅有了深刻的了解，被他的魅力所吸引，许多人成了不折不扣的陈毅迷。夏衍也叹服陈毅为人的真诚。陈毅对夏衍说：“有人把上海的接管概括为‘接、管、清、改’四个字，这是先接后管，然后再清理、改造，这个秩序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在文化界，我看，‘清’和‘改’特别要慎重，不要图快，更不要性急，急了就会出毛病，误大事。做统战工作，特别是对知识分子，先要交朋友、谈心，让他们敢讲真心话，不入耳之言也要听，骂娘也不要紧，可怕的是他们有话不讲，放在心里，形成怨结。”

大度为怀，善交朋友，这是陈毅赢得知识分子敬佩的奥妙

上海市刚开始设立文史馆、参事室，市政府秘书长只准备给文史馆30个名额，参事室34个名额，陈毅得知后，要秘书长都在后面加个零，秘书感到难办，对陈毅说：“上哪儿去找这么多人呢？”陈毅要他让下面各区统战部报名单，各区统战部迟迟报不上来。一问，回答不是这个不合条件，就是那个有历史问题。陈毅恼火了，拍桌子说：“你们这些人，连蒋介石都不如，他还把段祺瑞一家养起来呢，我们现在遗老遗少、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多的是，我们养得起，每月给个八九十、一百多元生活费，养起来嘛，每个月学习一、二次，来受你的教育，有什么不划算？”有一位颇有名气的文人，精通围棋，靠儿子养活。陈毅得知后，便专门到文史馆来，对文史馆副秘书长说，你们文史馆不是要人吗？我来推荐一位。副秘书长听完介绍，连连摇头，说，陈市长，你不知道，进文史馆条件有三：一是文，有文史水平；二是老，必须年满60以上；三是贫，生活有很大困难者。他还差一个条件，不够老，才56岁嘛。陈毅风趣地说：“你这位同志，怎么这样笨，把56岁倒过来，不是65岁了吗？”副秘书长恍然大悟，说：“我懂了，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年龄可以适当放宽。”

旧上海有个交响乐团，也是当时中国惟一的交响乐团。上海解放后，军管会有人主张予以解散，“花钱养这么个洋玩意儿有啥子用？”陈毅指示，不仅要保留，而且要搞得更好。他说：“交响音乐是全世界的共同艺术财富嘛，上海这样的城市应有一个自己的乐团。”当时乐团所在地环境较差，在一个菜场的楼上，嘈杂混乱，陈毅亲自过问催促，使乐团搬进了一座花园洋房。以前乐团指挥都是外国人，当陈毅得知青年音乐家黄贻钧作为第一个中国人将登台指挥的信息后，立即亲临现场予以支持。有一次，陈毅专门请交响乐团为中共上海市党代会演出，有的人以“我们是工农干部大老粗，对这玩意儿听不懂也不感兴趣”为由，中途开始三三两两地退场，陈毅立即叫工作人员锁上剧场的大门，中场休息时，他告诫大家要尊重艺术家的劳动，听不懂也要静下心来慢慢体会。黄贻钧等全团艺术家得知后非常感动，立即现场演奏了革命乐曲。上海交响乐团自1881年成立以来，从来没有演奏过中国乐曲，这次，他们演奏的是《新四军军歌》和《秧歌舞曲》，那些“听不懂”的干部耳朵竖起来了，听得热血沸腾，全场掌声雷动。陈毅满意地对身边的同志说：“看到了吗？你尊重了人家，就能感动人家，人家就能让你听懂了。以后，交响乐可以演奏中国乐曲，但我们要有音乐的耳，要听懂西洋乐曲。”

大度为怀，善交朋友，在和风细雨中开导朋友。当时上海民乐界的卫仲乐是留美归来的琵琶高手，但性格颇怪癖，不爱与人交往。陈毅却与他相处甚洽，话语投机，陈毅显示了一位领导干部对周瑟秦筝、胡笳羌管的广博爱好的情趣，对这位民乐高手予以嘉褒，这使上海文艺界的艺术家们甚为感动。陈毅说：“上海的文艺界千富万富，最珍贵的财富还是人才。”上海的一些著名人物，如沈尹默、张元济、熊佛西等，他们当时对共产主义并没有表示出多大的兴趣，但又是在文学艺术上各有建树的赫赫之才。陈毅对他们总是虚心求问学术上的问题，充分尊重他们的知识才华，同时作为执政的领导人，又处处

关心他们的生活、工作，通过细雨润无声的朋友交往，循循善诱，引导他们不断弃旧图新，投身新社会的文化建设事业。张元济年长陈毅 34 岁，陈毅当上海市长时 49 岁，张元济已是 83 岁高龄的老人，每逢张老生日，陈毅必送蛋糕，两人的关系不是一种“客气”，而是一种真正的尊重，陈毅的“内行”赢得了张老的敬重。上海解放时，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负责人，由于经济困难，工资发不出，他向陈毅求救，要求政府贷款，一张口就是“20 个亿”（合现在 20 万人民币），陈毅没有就事论事，划拨贷款了事，授人以鱼，不如授人渔，陈毅和颜悦色地与他分析商务印书馆的困难原因，跟他谈改善经营之道的奥妙，他说：“如果我说人民银行没有 20 个亿，借不出来，那是骗你老前辈了，你这么大年纪，为了文化事业跑来，理应借给你。但是我想，还是不借为好，20 个亿搞到商务印书馆，一下子就花掉了，却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听说现在商务印书馆那些编辑天天打扑克、唱歌、捅炉子、烧枣子吃，只愿搞学术丛书，不愿搞通俗读物，这样不要说 20 个亿，200 个亿也没有用的，要你老先生到处借钱度日，我很感动，但也很生气，我不能借，借了是害了你们。”一席话说得张老先生茅塞顿开，心悦诚服，钱也不要了，回去就搞经营整顿，经济上很快好转。从此，张老对陈毅是真正佩服，逢人便夸。

新上任的上海市市长陈毅

仗义执言，“脱帽加冕”深受知识分子的爱戴

1955 年，民盟中央有一个意见反映到中共中央，分析了解放后中共对知识分子的“六不”现象：“估计不足，信任不够，安排不妥，使用不当，待遇不公，帮助不够。”1956 年，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上周恩来总理作了著名的肯定知识分子作用的讲话。讲话对知识分子作出了正确的定性：“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是陈毅协助周恩来总理起草的讲话稿，他特别注意在报告起草中贯穿这样的思想：要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大规模地扩大知识分子队伍，尽可能地迅速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他还特别写道：“必须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工作日用在自己的业务上，其余时间可以用在政治学习、必要的会议和社会活动方面。”

1957 年，陈毅因脑血栓病离岗休养，没有卷入反右扩大化的运动中。但事后他是痛心的，这反映在他的著名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广州讲话中，真是痛定思痛，其言殷切。

1962 年 3 月，中央在广州又召开了科学家座谈会和全国话剧、歌剧、儿童剧创作的座谈会，周恩来在这两个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了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的论断，经过反右冲击的知识分子听了这个报告热泪盈眶。会上，他们倾吐了多年来在“左”的思潮迫害下的艰难处境，与会代表的大多数竟然不是被开除党籍，就是送去劳动教养，代表们在小组讨论时说起这些来涕泪零落。

陈毅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对极“左”的做法深恶痛绝。会议期间，周恩来总理有急事回北京

处理，委托陈毅主持座谈会，陈毅把准备与知识分子“掏心”的话与周总理概括地讲了讲，周总理表示赞成。他临走时对陈毅说：“我们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于是，陈毅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脱帽加冕”的观点，就是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

他仗义执言，说：科学家、知识分子“是人民的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是人民的劳动者，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是我们国家劳动人民中间的三个组成部分，他们是主人翁。不能够经过了12年的改造、考验，还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顶帽子戴在所有知识分子的头上，因为那样做不合乎实际情况嘛。”他越说越激动，索性站了起来，挥舞着手臂，大声说：“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地鞠了一躬，激起全场掌声雷动。陈毅继续说：“我劝所有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做行政工作的同志，在这方面要进行反省，要有自我批评。过去没有从团结他们、体谅他们出发，有很多事情做得太粗暴、太生硬。”他还真挚地说：“我是心有所危，不敢不言。我垂涕而道：这个作风不改，危险得很！我们必须改善这个严重的形势。形势很严重，也许这是我过分估计，严重到大家不写文章，严重到大家不讲话，严重到大家只能讲好，这不是好的兆头。将来只能养成一片颂扬之声……危险得很呵！”他几乎是呼喊着说：“今天我们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帝国主义是个敌人、封建势力是个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

陈毅这篇3万多字的讲话，生动活泼、诙谐风趣，悲愤交集，涉及了党对知识分子的信任问题，涉及了党怎样团结好知识分子的问题，讲得真诚动情，使到会的同志深受感动和鼓舞，激起了全场60多次掌声。也因为这篇讲话，“文革”中陈毅背上了“二月逆流”的“黑司令”的黑锅。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欲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今天，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英明正确，深得人心，这使我们更怀念陈毅同志。

（作者注：本文材料来自有关陈毅传记、回忆录等书，特向著作者致谢）

（责任编辑　仲 文）

《炎黄春秋》的编校工作有待加强

我热爱《炎黄春秋》，贵刊去年12期上《〈炎黄春秋〉是我的良师益友》那篇文章完全表达了我的心情。正因为她是一个高档次、有很大存查价值的刊物，我才不避“班门弄斧”之嫌，每期看后不厌其烦指出她的错别字和语病。新年伊始，有几点想法陈述如下：

一、大部分是由于校对不认真造成的，如“志愿军”误为“志原军”，“莫斯科”误为“莫斯料”，“北伐军”误为“北阀军”，“日寇”误为“日冠”，“周扬同志”误为“周场同志”，“曾彦修”误为“曾曾修”，以及“地”“的”不分、“那”“哪”不分，标点符号使用不当、“出乎意料之外”一类的病句。这类差错，虽不碍大局，但数量多了，时间久了，也会影响刊物的信誉，因而不能不认真对待。

二、少数不更正便易误导读者（特别是若干年后的读者）的差错，则应设法加以解决，不能不了了之。涉及史实性的差错，更应纠正，以示对读者负责，夸大一点说也是对历史负责。

三、要改变这种状况，当然主要靠编者和作者的努力，但发动读者参与也会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沈阳读者　谢 宁

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 刘德荣

历经"七无"艰难苦战

1945年8月，苏联出兵东北，日寇战败投降。当时在向南发展方针的误导下，我新四军三师主力在黄克诚师长的率领下，于8月8日由苏北阜宁地区向南进发，提出了抢占南京的战略方针。三天后，由于蒋日勾结，时局发生变化，部队转向西进安徽。当进军到大洪山地区时，遭到桂系军阀李品仙部的阻击。相峙十余天，接延安总部密电，令我部回师两淮。来回千里"大游行"，一无所获，消耗了体力，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为尔后同国民党军争抢东北增加了困难，付出了代价。

1945年9月28日，部队从两淮之间的河下镇出发，五天后过陇海路，进入山东郯城。此时适逢陈毅军长从延安参加完党的"七大"归来，在临沂为我们作报告，动员我们去东北。陈毅军长乐观地说："东北什么都有，武器弹药可以装备几十个师。部队轻装前进，少带或不带武器弹药。"黄师长很谨慎地说："不带枪还叫什么军队。"遵照指示，我们将重机枪、迫击炮以上的重武器留在山东了。

半个月后，我们过北宁路，发生了安亭事件，美军企图拦阻我们，感到战斗气氛了。11月16日上午，我部进军到冀东的卢龙，距山海关仅一天行程。前面传来消息：山海关已被国民党十三军夺占。我们抢占山海关，并坚守山海关的任务落空。部队转赴迁安出长城。

11月17日晨从迁安出发，北风呼啸，灰蒙蒙的天空飘着雪花，走不远就到了冷口关，出长城了！极目远望，见不到村庄，见不到炊烟，我们在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下穿着单薄的服装，继续向东北行进。行军速度很慢，第二天很晚才找到一个村庄，叫玲珑塔。从外面看约几十户人家，进村后却找不到人。经了解，群众害怕，都躲到山里去了。屋里的炕是冰冷的，不用说吃饭，就是想喝一口热水的愿望都难以做到。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行军数日，有人见景生情，说起姑苏女孟姜为夫往长城送寒衣的悲惨故事，更使寒意由内心透遍全身。

11月23日，靠近杨仗子（兴城西）时，根据中央电令，刘震、洪学智副师长召集各旅研究，准备阻敌前进。此时黄师长赶到，神情严峻地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能打！要撤，还不能让敌人咬住。部队撤向锦州、义县、阜新一线。

某部在兴城地区与敌接战，发现敌火器配置很有层次，火力密度高、且猛烈，同以前的国民党军大不一样，比起日本鬼子的火力还要高出许多。一接战就必有伤亡，如何妥善处理伤员，在无群众、无后方的条件下是最大困难之一。伤员从火线运送下来，只能借用群众的门板抬着，一个伤员需四个人抬，而这四个抬伤员的人的枪支弹药行装，又需两个人背扛。如此，一

个伤员就需占用六个人来护送。算上伤员本人就是七个人不能参加战斗，加上天寒地冻,饥饿难熬,部队行军速度很慢。一个连队如有六、七个伤员,全连就变成担架队了。这是黄师长后来在阜新干部会上深情地为我们算的一笔账。

到阜新休整三天,12 月 26 日师部召开干部会议。黄克诚师长根据一路的观察、调查、思考,在会上讲:我们现在条件很困难,主要是离开了根据地,无地方党组织的帮助,无政府支援,无群众依靠,无后方供应,无粮草,无医药,无御寒衣物,武器差,弹药又少。如此疲惫之师,怎能同强敌作战(当前之敌有国民党的十三军、七十一军、五十二军、新一军,均为美械装备)?只有走发动群众、开辟和创建根据地之路,把我们从苏北来的三万五千人作为三万五千棵种子,撒向松辽大地,生根发芽,作长期艰苦斗争的准备,才能转弱为强,战胜国民党。

此前,黄师长已有电报给东北局,报告了“七无”困难情况,建议将主力部队划分地区,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并郑重提出:不如此不能改变“七无”困难局面,甚至有可能走西路军失败的道路。

“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本是毛泽东制定的一条军事原则。兴城地区撤退实践证明完全是必要的、正确的。可是在 1959 年 8 月党的庐山会议之后,在全党、全军上下掀起一股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的高潮,说黄克诚在历史上一贯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其中就说到:日本投降后,毛主席命令黄进军东北时,黄克诚提出“七无”,把当时形势说成一团黑暗;又说黄企图“保存实力”、“消极避战”、“畏敌如虎”……,要大家开展批判。我当时在南海舰队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指名要我揭发黄克诚,而我认为 1945 年进军东北初期的形势确实如此,因而也遭到批判和处理。

阜新干部会议后,我们继续北上,师部与我旅同行。到东北改换装备的希望全落空了,部队士气低沉。我们仍按指示沿西满铁路,向通辽前进。这一地区仍然人烟稀少,天气更加寒冷,“七无困难”毫无改善。部队行进在废铁路线上（无其它道路可走），一步跨一档不好走;跨两档呢?就如跳越了,且难以持续;跨在两档之间呢? 脚下全是碎石,脚上穿薄底鞋,鞋底都被磨破了,其困难可想而知。由于天气严寒,部队只要一行动中间就不能停下来休息，即使休息十分钟也不行,因为一旦休息,腿脚就冻僵硬了,再走路就更难了。所以一上路就不停,到晚上才宿营,连续走十几小时。有马的首长也不能乘骑,只能同大家一道步行,因骑马会冻坏腿脚。

张天云旅长有一匹骏马，红鬃黑毛，在苏北,老百姓都认识它,老远就认出那是张旅长的马。每当部队集合,饲养员把它牵引到队前,此马总是昂首嘶鸣、奋蹄蹬地,展现它的雄姿。在辽西的路上,此马昔日雄姿不见了,集合时,总是无精打采,垂着头,用它的脑袋在饲养员身上磨擦。除了饲料不足这个原因之外,它的主人,整个部队情绪低落，已影响到这匹骏马，有人说,马通人性,有感情啊!

在辽西的路上，有的战士因无法忍受严寒、冻伤、疲惫的煎熬而自杀。此时,我们深深地怀念苏北根据地,怀念苏北父老乡亲。深深感受到没有根据地,没有地方党支持,没有群众依靠,是何等艰难困苦啊!

我们指战员大都来自江苏水乡，长期吃惯大米、白面,现突然改为一日两餐,全吃又粗又硬、难以下咽的高粱米,体能的消耗更加入不敷出。在进军东北的著述中,没有一个作家、记者把“饥寒交迫”同能征善战的大军联系在一起的，而这时的我们确实实在在地处于饥寒交迫之中行军作战。

1 月 12 日,攻占通辽,歼灭由国民党收编的蒙王李守信部两千余人，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物资,部队御寒衣物有所改善,出冷口关近两个月来,第一次饱了肚子。

通辽战斗后,曾一度向开鲁开进,进军一天后,发现那里全无人烟,不得不撤回,又沿铁路线,经郑家屯,向开通方向,剿匪开道,计划到洮南过春节。这时又遇大寒潮,寒风凛冽,大雪纷飞,风助寒威,冷倚风势,狂风吹透衣裤,狠毒地掠去人体的热量,直刺肉骨,眉毛胡子上一层白

霜，鼻孔出气喷出的是雪花，脸如被刀割、针刺，有传说说撒尿要用棒子敲，这一说法玄乎，但撒了尿后再也没法系上裤带的事例不少见，我自己就遇到过，手冻得不像是自己的，那个艰难劲，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在风雪里，人都站不稳，行军实在困难，不得已在一个叫黑水的小车站住下，首长与作战、机要人员都挤在一起，李雪山政委谈起出冷口以来的行军作战情况，说我们虽然很困难，但比不上长征那时艰苦，以此鼓励大家。张天云旅长一向少言寡语，此时却动情地说：“比起长征来也差不了多少。”其他同志又议论起黄师长讲的“七无困难”，参谋长庄林说：“不止七无困难，还有无地图、无情报、无人抬担架……”副旅长胡继成说：“还加上无烟抽。”他的烟瘾大，这时只能靠警卫员帮他弄些大豆叶来过瘾。其他有烟瘾的也只能如此。大家七嘴八舌地罗列“十无”、“二十无”……总之困难重重，政治部主任陈志芳说：“主要困难就是‘七无’，如果‘七有’，其他一切困难都好解决了。”此时李政委说：“只要按照黄师长的指示，创建根据地，有了根据地就能把那么多的‘无’都变成‘有’了。”

我们司令部的几个青年干部在一起议论，日寇投降时，当初我们不去安徽，直接挺进东北，提早国民党军两个月时间。有两个月时间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创造战场，再迎战国民党军，就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困难局面，形势会是另外一个样了。

部队在洮南过完春节，继续北进，继续北进齐齐哈尔，沿途有苏军分队驻扎，张天云、李雪山亲自赴白城子苏军指挥部拜访，请其协助我军北进，但收效甚微。国民党通过派俄语翻译向苏军诬指我军为“胡匪”，挑唆苏军对我进行无理拦阻。在大赉、泰来、江桥等处均遇到这种情况。我二十四团一营在昂昂溪铁桥处遇到苏军千余人的坦克、大炮包围。要缴我们的枪，遭到营长张竭诚的坚决拒绝，险些发生军事对抗。

我们政治干部用长期心血培养起来的部队对苏联红军的崇敬感情，被他们自己用抢运物资、强奸妇女等劣行给抹掉了。对待苏军无理行为，我们用两种办法。一种是政治的，一见苏军，我们就大声高喊“斯大林乌拉”；第二个办法就用烟酒，尤其酒，苏军士兵大多数喜欢喝酒，有了烈性酒，许多事就能按我们想法来办。

到昂昂溪一带，准备部署剿匪，创建根据地。此时情况又有变化，苏军准备全部撤出东北，国民党立即指派所谓的先遣军（即收编的伪满军、土匪军等）接收城市，而我们只能以战斗行动从这些国民党军手中夺取大中城市。部队又挥师南下，一路扫荡，于4月18日攻占长春，歼敌万余。4月19日接到总部急电，令我们日夜兼程，火速赶至四平街西面之八面城，与兄弟部队一道参加有名的四平保卫战。

四平保卫战是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进行的。当时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杜聿明集中了八个正规军，包括新一军、新六军等王牌军，约30万人。均由美国军舰、飞机运来东北。到东北后也是乘汽车、坦克行军，装备精良。他们傲气十足地向四平猛攻，寻找我军主力决战。而我军在四平仅有新四军三师的四个旅，山东部队一、七师（旅）和冀中的保一旅，共约五万余人，分别由苏北、鲁南、冀中地区长途跋涉，又经大小数十次战斗，真可谓精疲力竭，我们的武器弹药就更不能与敌人的美械装备比较了。在如此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毛主席4月27日电令：“化四平为马德里”，“要打出一个和平来”，部队不懂什么叫“马德里”，李雪山政委就解释说：“四平变为斯大林格勒，死守！”张天云问：“我们有苏联红军那样的条件吗？”可以看出，将领们只是执行命令，并无战胜敌人的信心。正如有些同志说的，四平保卫战，不是我们打敌人，而是挨敌人打。从4月18日起，到5月19日夜止，苦战32天，部队伤亡16000余人。7月间，我在肇东遇见在四平保卫战中负伤的二十一团特务连长李得胜，一见面就摇头叹气的说：“我们团从淮安出发，全团有两千来人，战斗到四平撤退时，只剩下五百来人。”这些都是经过抗日战争锻炼的精英，按黄克诚师长说的，全是种子啊！“马德里”丢掉了，和平也未打出来。有资料记载，在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7月

30日毛泽东找黄克诚谈话，批评黄一贯右倾，举例进军东北初期作战，说“什么七无？有那么多的困难，叫你们打是为了和谈。”黄说：“东北初期有些仗不该打，四平保卫战就不该打嘛。”毛主席说：“那是我决定的。”黄回敬说：“你决定也是错误的。”不难理解，一个说的是权力，一个说的是实践，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创建根据地

四平街撤退后，我们大踏步北撤。“七无”的困难状况不仅继续存在，部队士气低落到最低点。吵架、骂人、不服从管理，干部懒散，部队纪律松弛，违纪事件屡有发生。不仅战士开小差，干部也有，甚至有营长带枪逃跑的。四平街撤退病号增多，又缺医少药，只能在伙食方面想法作些调理。平常人吃高粱米还难以下咽，病号就更不适应了。指导员、司务长、炊事班长想掏出心肝来换些米面做些病号饭，却难以做到。七旅旅长彭明治、八旅旅长张天云这两位战将，皆因过度劳累和情绪不佳而离岗休养。六月底，辗转到哈尔滨西北的三肇（肇东、肇洲、肇源）地区，旅部驻安达。这时西满军区才下最大决心将部队按地区划分，改为战斗队、工作队、宣传队，实行三位一体，执行剿匪反霸、减租减息、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这也是东北局七月会议的精神。

三大任务开展前，首先对部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整顿纪律，黄司令员到各团巡视，严查部队纪律状况。发现有伤兵吃馆子不给钱、看戏不买票，还有砸戏院等严重违纪现象。为整顿军纪，在明水就地处决了两个带头闹事的伤兵，将接兵团的营长魏保山撤职罚当挑夫，整顿了因“七无困难”条件下疲劳作战带来的涣散状况。

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三位一体的任务。不剿灭土匪，就反不了当地的土豪劣绅，群众就不敢起来。群众发动不起来，土匪就难以消灭，土豪劣绅就能在暗中控制群众。剿灭土匪是前提，打击土豪劣绅是条件，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是目的。

东北土匪（当地叫胡子），有两大特点：枪法好、马术精，并因此出名。我们虽是主力部队，经常同日伪、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但面对那帮地形熟、跑得快、马术精、枪法准的惯匪，开始真有些不好对付。并且土匪成分杂，渗进了大量民愤极大的原伪满军官、伪警察、伪政权人员，这些人一心与人民为敌，均接受国民党的委派，成为座山雕式的匪徒，在三肇地区有“草上飞”、“花蝴蝶”等人聚集的大股匪帮，他们作战顽强，不愿投降，因而增加了战斗的残酷性，我方伤亡亦大。在剿匪战斗中，有团级干部伤亡的，可见战斗之激烈。

开始时，首先是大部队围剿，在击溃大股土匪、地主武装之后，紧接着把部队分散，化整为零，以营、连、排甚至以班为单位做发动群众的工作。以排、班分驻自然村，几个战士组成小组，挨家、挨户、串门谈心，一次又一次走访群众，从帮助群众担水，扫院子这样一些具体小事做起。这对于接近群众、疏通感情很实际，很见效。群众不仅听我们讲，还看我们做，很快就消除顾虑，相信共产党和人民军队，是真心真意为他们谋利益的，视如一家人，情同手足，从而激发了他们的阶级感情和阶级觉悟，我们的干部真像种子一样，撒向群众发芽生长。这也是我军的光荣传统。如担水、扫院子、家访等具体工作，是任何大道理、大文章、开大会、做报告所不能替代的。宣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重要，如果没有担水、扫院子、促膝谈心，群众是不会轻易相信我军是人民军队的。

在宣传、发动群众工作的基础上，由自然村到村，逐级召开群众大会批斗土豪劣绅，产生了基层政权。真正体现了枪杆子里出政权、枪杆子里造党的理论。

七大中央候补委员古大存随我旅指导政权建设工作，以中央特派员名义向西满分局报告工作。他说：经过三个月的剿匪反霸、发动群众和创建根据地的艰苦斗争，形势完全改观了。我们有了政权，有了地方党组织，医药、医院都有了。从此，“七无困难”消失了，群众纷纷自愿参军，部队扩充兵员，改善了成分，士气普遍高涨，

战斗力起了质的变化。人民是人民军队力量的真正源泉，它为即将到来的战略反攻、战略进攻、战略决战准备了雄厚的力量。

进军东北初期，黄师长的“种子”论，在其后的发展中得到了有效的验证。实践证明：种子思想是光辉的思想，种子理论是革命的理论（《毛泽东选集》里就有“共产党人好比种子”的记载），绝对不是逃避战斗，保存实力的军阀思想。

1946年10月开始，部队集中整训后，雄赳赳，气昂昂，重返松辽主战场，改变了敌我进退的形势。1947年5月初，距四平街撤退一周年，我们转入了战略进攻阶段，连续发动了夏、秋、冬的战略进攻。

战略进攻

5月初，我们二纵队（原三师三个旅编成）在刘震司令员的指挥下，以迅雷之势奔袭长春以西30公里的的八家子，以猛虎扑羊动作，捕捉到了国民党王牌军新一军的九十团，干净利落地将其歼灭。紧接着，在一、七纵队协同下，追歼援敌八十七师于小黑林，击毙敌七十一军参谋长，直追至四平以南。

经一段时间整训，我军于9月初发起了秋季攻势。由郭尔罗斯前旗出发，绕经农安、长春、公主岭、四平街等敌军据点，长途奔袭500里，直击昌图之敌一三0师。是日是中秋节，我们披着明媚的月光，在入秋首次瑞雪的掩护下，未经炮火准备，就直冲城内。经四个小时激战，歼敌一个师，俘虏八千人。不等敌军反应过来，又杀了一个回马枪，于四平南之大洼地区，经一夜激战，干净利落地歼灭了新一军的一五0团。该团是王牌军中的王牌。团长王耀云是国民党军中的英雄，被我军当场击毙。为揭穿国民党的一贯谎言，我们用一口棺材，将王耀云的尸体用四匹大马拉着，派吹鼓手拥送到四平街城内，迫使南京中央社不得不承认事实。

吃菜要吃白菜心，打仗要打新一军……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各部同声齐唱的一首激昂的战歌，站队唱、集合唱、行军也唱，这首歌是动员令，要大家齐来打败新一军，可见新一军在军界中极其重要的地位。新一军列为蒋介石五大主力之首，新一军军长孙立人，被英国元帅蒙哥马利称誉为“东方隆美尔”。此人系清华大学的高材生，保送到美国弗吉尼亚军校攻读。1942年4月率新三十八师在缅甸仁安羌击溃日军，救出被围、行将覆灭的英军第一师，被英国女王请到英国伦敦，亲自授予大英帝国自由勋章。就是这位声名显赫的新一军军长，从1945年11月始，乘美国军舰在秦皇岛登陆，追击我们这支刚进入东北的新四军三师部队，成了冤家对头。从山海关、四平街、长春、德惠都是新一军逞威风。孙立人给新一军带来旺盛的士气和嚣张的气焰。我们只能以局部优势的兵力，一个连、一个营的消灭某一部，打了就跑。夏、秋季攻势，我们接连歼其两个整团，占新一军全部兵力的九分之二，算是很大的大仗了。

东北蒋军以新一军为核心部署，只要一触动新一军，其他各部就向其靠拢，维护新一军不使其受损失，是蒋军各部的责任。蒋空军一得知新一军驻地有战斗，不需参谋总部命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就主动派飞机支援掩护。就是因为这些，各部队都以能打败新一军为荣，以打硬仗打恶仗为荣。歼灭新一军一五0团，其意义不在于歼敌一个团的兵力，而在于歼敌王牌军中的王牌，是掏心战，表明我军能打硬仗、恶仗，是我敌战斗力升降的重要标志，引起双方高层的重视。据传，在南京的美军军事顾问团为此专门召开了研讨会。

冬季攻势就更热闹了。此时，国民党换上其参谋总长陈诚主持东北战场。陈诚接受夏秋作战失败的教训，将分兵据守改为集团防御。在沈阳北集中了新一、新六、二0七、新五等军，组成了集团防御，我军虽集中了六个主力纵队，却难以寻找突破口。几经运动迂回，终于在北宁线上，新民以西之王道屯、公主屯地区，捕捉到敌新五军，迅速将其歼灭，生俘敌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中将，同时将敌四十三师、一九五师师长一并生俘。陈林达是个大胖子，缺乏军人风度，俘虏他的我军班长称：陈林达耍死狗，是个孬种。

歼敌新五军是1948年1月6日，大地一片

雪白，天空晴朗，傍晚发起总攻时，无数照明弹高挂于空，五颜六色，把夜晚变为白昼。无数的曳光弹和铺天盖地的炮火，映红了整个夜空，五彩缤纷，煞是好看，战场的美景使人终身难忘。

歼敌新五军之后，就使东北国民党军被分割包围于长春、沈阳、锦州三点，战略大决战的形势逐渐形成。

辽沈大决战

1948 年 9 月，距我们离开苏北正好二年。部队跨长城、转战白山黑水，踏破松辽千里雪，历经千辛万苦，创建根据地，克服 “七无困难”，提高了战斗力，终于迎来了辽沈大决战。

由新四军三师主力编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被敌人称之东总两只猛虎之一，她的行动，已成为敌方判断我方战略行动的一条根据。为了迷惑敌人，二纵隐蔽了电台，改番号为“天津部队”。9 月初，各部队秘密向南运动，9 月中旬突然出现在义县城下。

义县是锦州的门户，欲图锦州，必先取义县。敌人对义县防御十分重视。城墙既高又厚，相隔几十米有一碉堡凸出城墙外，轻重火器的射界能控制一百八十度，进行三面射击。城外有八米宽、两米深的护城河，紧挨护城河的地方有两道铁丝网，护城河。铁丝网前密布地雷阵地，加上城内重炮拦阻、空中支援，构成多层立体防御。敌人傲气十足地称之为“固若金汤”。

高层指挥对攻打义县十分重视，视为攻锦战役的第一阶段，是攻锦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全体指战员把攻击义县战斗看成是攻锦实战练兵的大好机会，鼓足劲，做好各项准备工作。

战前准备主要是侦察地形，选择突破口，进行逼近作业。攻城突破的重要战术手段是挖壕。白天轻挖，夜间大挖，一直追近到敌护城河前。

第一次有强大炮兵配合，是各级指战员所没有想到的，大家欣喜若狂。多层炮兵齐射，炮火猛轰，城塌堡陷，泥块把护城河给填埋了，成为步兵冲锋的垫脚石。凌晨发起总攻，当晚即结束战斗。

义县战役，我军最大损失是炮纵司令朱瑞触雷牺牲。

攻克义县，全歼敌暂编二十二师等 15000 余人，生俘其中将师长（名字忘记了）。此人系滇军将领，黄埔系，对我军高级将领较为熟悉，虽为战俘，尚不失儒将风度。五师政委石瑛接见他，问他有何要求时，他说：“败军之将，不敢做非分之想。如果能予同意的话，请将内人移送锦州城内卢兄、卢峻泉处。免她也受俘虏之苦。”石政委说：“这样做对夫人不是安全之策，甚至有危险之虞。”那将称：“贵军长于围城打援。围锦意在图援军，锦州尚不至于有危险。”两人对锦州战事前景估量的对话，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敌有意坚守锦州，组织东西对进，会战于锦的打算。这一有益情报，速报总部参考。

义县战役一结束，各部即向锦州靠拢，准备攻打锦州。

攻锦前，林彪司令员到五师，在营以上干部会上作动员讲话，大意是：五师进步很快，义县

围攻锦州的我军炮群

打得不错。这次打锦州,是关门打狗,是一场恶仗,要准备狗急跳墙。攻锦州,我准备用两把尖刀,即五师和七师,并肩突破,要不惜一切,要死打硬拼,要有一股不顾一切的狠劲,无论多大伤亡,要冲进去。我们有强大炮兵,用密集炮火打开口子,部队要以密集队形冲锋,要像散大戏那样,你挤我、我挤你的队形往前挤,往前冲。打鞍山、吉林,用疏散队形,一个营用了33分钟才进去。太慢了,伤亡大;要用密集队形,要你挤我,我挤你,冲!要狠,要用足劲,打开突破口。就算五师完成任务!

林彪司令员讲话后,各级首长均以宣誓式的讲话来表达决心。从首长到炊事员都鼓起了一股拼劲、狠劲!

攻锦州的炮火准备也是空前的。参战炮兵分五个层次:总部炮兵,以150以上口径的榴炮编成;纵队炮兵,以野榴炮组成;师山炮营担任抵近射击;团九二步兵炮、重迫击炮随部队跟进;营连八二迫击炮、六零炮直接掩护冲锋。火力准备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总攻击前几天进行,将敌已暴露的工事编成号,逐个击毁;第二阶段是主攻阶段,五个层次的炮兵齐射,打开一个50至80米的突破口,为冲锋部队扫清前沿的一切障碍。锦州总攻前的火力准备,主要在锦州城的西北方向,五、七师正面就用了三百余门各种火炮。总攻开始后,一、二、三火炮立即执行第三阶段任务,延伸打敌纵深和拦阻射击以打击敌人的反冲击。

锦州总攻开始是1948年10月14日上午10时。按东总命令,总攻信号弹是由五师参谋长汪洋手发的。由于强大炮火齐射,把敌人打蒙了,失去了反应,也无还击的能力,尖刀营仅用了17分钟就冲进突破口,伤亡不大,迅速向左右扩大战果,撕大突破口。

锦州战役准备充分、士气高昂、速战速决歼敌十万余人,生俘敌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范汉杰中将,兵团司令卢峻泉中将。从总攻开始到战斗结束,仅用了32个小时。

锦州大战前,敌我双方总兵力相当(敌含傅作义部分),蒋军占有装备及海空军优势。范汉杰为黄埔一期生,任蒋陆军副总司令。九个月前调任东北"剿总"副司令兼锦州前进指挥所主任。在他的校长亲自领导下,很有信心地要同他师弟、黄埔四期生、共产党人较量一下,向蒋提出"坚守待援、东西对进、决战锦州、扭转战局"的十六字方针,得到蒋介石的满口赞同。

东西对进是个好主意。西面傅作义有何想法?他在想下一步东北大军进关应如何对应。东面的文章要由廖耀湘来做了。此人在法国圣希尔军校镀过金,1946年5月率蒋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攻占四平街有功,以稳扎稳打著称,向为蒋介石重用。这次由他率领的由新一军、新六军、七十一军、新三军、二Ｏ七师(军)组成的精锐兵团,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增援锦州,企图与范汉杰会合,实施锦州大会战,这是蒋介石、范汉杰、廖耀湘精心策划的如意算盘,可惜志大才疏。

这个沉稳持重的廖耀湘于10月2日由沈阳西进,他不是沿北宁线直逼锦州,而是向西北绕道占领黑山、北镇、新立屯、彰武一片地区。作家、记者们都说廖耀湘此举全在"磨洋工",除含有嘲弄之意外,也是外行之言,小看了这位蒋介石爱将。廖占彰武、新立屯意在截断我大军后勤供应线,从侧后威胁我攻城大军,动摇我攻锦州之决心。还有一着杀手锏,就是在我攻锦酣战不下之时,将他的五个军、15万人组成的精锐兵团投入攻打锦州之战,造成里外夹攻,同范汉杰内应外合,以制我军于死地而一举成功。他完全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术考虑。战争不仅是实力的较量,同时也是智力的较量。

东总10月12日敌情通报通知各部,敌廖兵团是日占彰武、新立屯,由我十纵、五纵钳击拦阻,各部务必专注锦州,加紧攻城的一切准备。意在告各部不要去理会廖兵团的行动。正巧,此时转来东总副总司令员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黄克诚的电报,要攻锦部队的伤员齐送赤峰地区,那里已做好准备。首长们得知这个消息十分高兴,知道黄司令员在此地为锦州大战做了战场准备、后勤安排,平添了力量。三年前就在此地区遭遇"七无困难",今天成为"七有"的胜利条件。廖耀湘切断我后勤保障线的行动

已不起任何作用。说明攻锦之战早有全盘的战略布局。

锦州战役，以我大获全胜而出敌我双方高层意外，战局发展发生了有利于我的急剧变化，演变成为震惊中外的辽沈大战。

从 10 月 20 日开始，各路大军奉命向东运动。兄弟部队作前卫，我们纵队晚于他们两天跟进。因我们连续攻义（县）锦（州），部队伤亡大，东总意图将我们作总预备队。开始两天仅以战备行军速度跟进，两日后抵大虎山，前面传来枪炮声。炮声隆隆，催人奋进。此时东总电令我们加速前进，准备投入歼灭廖耀湘兵团之战。部队即以临战姿态，急行军跑步前进。于 25 日在励家嵩棚、胡家嵩棚一带投入对敌廖兵团的激烈战斗。

歼灭廖兵团之战很特殊，首先是敌人乱了，懵了。范汉杰已全军覆没，蒋介石仍坚持东西对进，仍命令廖兵团攻锦州，夺回锦州。而廖耀湘不听蒋的，自己决定去营口，在营口地区固守待海运关内，或回沈阳守城待援。对此东总已预有部署，着部队穿插至盘锦地区，阻断敌退营口之路，廖已无路可走，只好被迫退向沈阳，在我数十万雄师压迫下哪能不乱。从廖耀湘到连队，上下都乱了套，上头不知各部位置，部队不知自己任务，如何处置当前战斗。而我们战斗情绪特别高涨，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往那里冲，无须按作战程序进行准备，以营、连、排为单位，攻击前进，团以上指挥机关跟着部队向前跑就是了，只要发现敌人，就冲上去俘虏。一群俘虏里就有连以上十几个单位的，甚至有跨师、跨军的俘虏挤在一起，足见敌人乱到何种程度。就这样，用了二十几个小时就把中国国民党最精锐的兵团歼灭了，当场生俘了廖耀湘及新一军军长李涛等一批将领。

26 日下午，林彪司令员电令：“敌全线溃退，我应以乱对乱，追。”这是一道作战命令，是在辽沈大决战中向几十万大军发布的一道作战命令，只有十二个字，是我记忆中最短的作战命令，是短的不能再短了。十二个字分三段，第一段五个字，包含了对敌情判断，向全军作的战情通报；第二段，六个字：“应以乱对乱”是向全军下达的作战行动命令，它知己知彼，切合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切合战场的作战行动；第三段，一个字，追！将数十万大军的行动，甚至营、连、排的具体作战行动都指明了，追就是了。

这是一道命令，也是一道战斗动员令，首长们接电后，人人兴奋起来，立即向全体指战员传达，人人兴奋，个个热血沸腾，忘却了一切疲劳，双脚自动地跑动起来，跑步前进！各级指挥员齐声下令，将铁镐、铁锹扔掉，把米袋扔掉，跑到前面，到处都有敌人扔掉的武器弹药，捡就是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追击就这样在松辽大地上轰轰烈烈、十万火急地展开了。开始总部还以电报划分各纵、各师所沿路线，甚至规定某部走公路的左半边或右半边，以防止大军堵塞道路，阻碍前进速度。这并不实际。谁跑得快，行军力强，谁就冲在前面。不能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不能让敌人再有组织抵抗的机会，目标沈阳！

10 月底，巨流河已结薄冰，水及腰深，我们徒涉过河，无一人怕冷叫冻的。从巨流河到沈阳的皇姑屯，约 100 华里，部队都是跑步向前冲。某团仅用了三个半小时，平均速度 28 华里，这是徒步追击的速度，是经过连续作战 50 天、强攻义县、锦州、胡家嵩棚等一连串的大仗、硬仗、恶仗之后，体力付出极大消耗之后所进行的速度。人人心急火燎，个个嘴唇爆裂，刘震，吴法宪也一样。有没有生理学家、医学博士们研究过人的体能活力究竟有多大？人在情绪亢奋高涨时，特别是战斗胜利时，体能的发挥与平常时的比较，是怎样的一个方程式！同 30 个月前四平街撤退时，体力疲惫情形是一种什么关系？

守备沈阳之敌系周福成兵团，在锦州范汉杰集团、长春郑洞国集团全部被歼灭之后，特别是蒋介石在东北战场上最具战斗力、最精锐的廖耀湘兵团全军覆灭之后，沈阳守敌周兵团虽有 10 万之众，已士无斗志，成惊弓之鸟，不战自乱，不战自溃，除特务、武装地主作些零星战斗外，敌周兵团实已溃散。11 月 2 日，我们大军潮涌跑步冲进了皇姑屯，冲进了铁西区，冲进了沈阳。沈阳解放了！辽沈大决战胜利了！全东北解放了！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盐城“二乔”

● 王光远

1965年1月，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会议期间，毛泽东宴请出席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当他得知坚持下乡务农的知青代表董加耕是江苏盐城人时，便问他：“你们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董加耕不知何意，回答说：“您问的是否指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毛泽东笑着说：“我不是说桥，是说人，盐城‘二乔’指的是胡乔木和乔冠华。”

胡乔木

胡乔木和乔冠华不但是同乡、同学，而且同用一个笔名——乔木。

盐城是苏北名城，抗战时期新四军总部就设在此地。胡乔木原名胡鼎新，是盐城县鞍湖乡张本庄人；乔冠华是盐城县庆丰乡东乔庄人(现属建湖县)，两地相距不远。胡乔木生于1912年6月1日，乔冠华生于1913年2月21日(农历)，两人相差不到1岁。

胡乔木6岁入鞍湖小学，12岁以优异成绩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后改名扬州中学），18岁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因他酷爱文史，校长吴有训劝说他转入历史系。1930年底，经曾迪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在历史系只读了一年，就被调任为青年团北平市委专职宣传部长。

乔冠华毕业于盐城第二高等小学，先入宋村亭湖中学，后转入教会学校淮美中学，在南京钟南中学读完高中，1929年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样，盐城“二乔”就有了同乡、同学之谊。胡乔木离开清华后，有一段时间与家中失去联系，其父不放心，曾派其姐夫张肃堂来北平找他，首先找到了乔冠华，通过乔冠华才找到胡乔木。

胡乔木1932年回到盐城，在城里贫儿院当教员，经县委书记嵇荫根（又名蔡道生，后叛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胡乔木考入浙江大学外语系。1935年因反对校长郭任远，被勒令退学。他随即来到上海，担任“社

联”（中国总同盟）书记。因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37年奉命调往延安。先后担任“安吴青训班”副主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等职，1938年底调任毛泽东的秘书。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的讲话记录整理的，《六大以前》、《六大以来》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他在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导下起草的。1941年5月，《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发行《解放日报》，胡乔木开始以“乔木”的笔名，为该报撰写社论，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

乔冠华1933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入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两年后因参加日共外围组织，被日本警方逮捕，关押三个月后被驱逐出境。1935年经老师金岳霖的推荐，以公费去德国杜宾根大学攻读哲学，1937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经留日同学赵一户介绍，在广东余汉谋部当参谋。日本军队占领广州后，他来到香港，在《时事晚报》工作，负责写时事评论。这时开始用“乔木”的笔名。有一次，胡乔木的妹妹方铭以为哥哥在香港，写了信去，结果寄到了乔冠华手中。

1939年8月，经廖承志、连贯介绍，乔冠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香港沦陷后，他来到东江游击队，后经桂林辗转到重庆，在八路军办事处外事组工作，同时兼任《新华日报》社论委员会委员，仍用“乔木”之名写作。这样一来，在党内出现了两个“乔木”，为了加以区别，人们把在延安的“乔木”称作“北乔”，把在重庆的“乔木”称作“南乔”。两个“乔木”不在一起，尚可相安无事。

1945年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谈判，胡乔木作为随员，也来到重庆。两个“乔木”碰到了一起，有时《新华日报》上发表“乔木”的文章，人们弄不清是哪个“乔木”所写。于是要求由毛泽东出面，为“二乔”断名。原来“北乔”使用此名在“南乔”先，但“南乔”真姓乔，“北乔”却姓胡。毛泽东建议“北乔”在名字前加一“胡”字，这样就有了区别。此后，“胡乔木”的大名就为全国人民所熟知了。

全国解放后，胡乔木仍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同时先后兼任过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社会科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参加起草过《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共八大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主持编辑了《毛泽东选集》，参加审定《邓小平文选》，仍是中共中央的一支笔。周恩来曾说：“许多文件只有经胡乔木看过，发下去才放心。文件经胡乔木修改，就成熟了。”

乔冠华曾担任过新华社华南分社社长，解放后历任外交部政策委员会副主任、研究室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出席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十一大当选为中央委员。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在北京病逝，终年71岁。1992年9月28日，胡乔木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1岁。

（责任编辑 刘 文）

乔冠华和夫人章含之

世纪之交感言：还是要防“左”

● 李 锐

在进入21世纪之际，我这个1917年出生的老人，当然是感慨万端的。近二十年来，幸亏走上了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道路，国家的经济地位上升了，人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是民主法治落后，腐败现象丛生，人民对此很不满意。放眼世界，经济全球化，人类进入信息时代，科技与经济的竞争日趋剧烈。据有关方面统计，我们的综合国力居世界第七位，可是经济竞争力却仍居第四十位左右（香港、台湾居前十位）。这应该引起国人的高度警惕啊！百年前，我们落后挨打，辛亥革命后，仍然落后挨打。五四运动迎来自古没有的德赛两位先生，引进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国共两党沙场决胜，我们党领导人民终于取得了1949年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建国后，由于对马克思学说教条主义的理解，从苏联学来无产阶级专政的错误实践，以及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模式，并同中国自古相传的乾纲专断相结合，大大地冷落了德赛两位先生，使我们走了二十多年弯路，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跃进”和“文革”十年灾难，几乎走上一条绝路。而那二十多年，正是世界科学技术、经济人文突飞猛进的年代。因此，我希望进入新世纪之后，扬长避短，经济、政治双双改革开放，两条腿迈步前进，走上导致人类历史前进的民主、科学、法治、市场经济的康庄大道。

耄耋之人，余生不多，精力有限，新知难涉，常常只有回顾与反思。反思种种经历，走过的道路，哪些事还要提高警惕。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反思是为了更好地前进。1997年列席十五大时，我有一个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与意见》，随后在刊物上发表了。文中提出一个重要的建议：应当开始总结这二十年来（1978-1998）的经验教训，作出我们党的第三个《历史决议》。“设想一下，如果没有第二个《历史决议》，这二十年能这样走过来吗？在经济生活方面能有这样巨大的进步吗？何况这二十年中并非没有曲折，没有艰难，没有干扰。”

我现在想谈的，还是同“防左”有关的一些感想，先从个人有关的经历谈起。

重视历史经验教训

应该说，从抗战初期一直到延安整风，自己的经历还算比较顺当的。当年接受党的教育，学习毛泽东的著作，为抗战南奔北走。我在湖南地下党工作时，1939年到重庆参加南方局的青年工作会议。冯文彬、胡乔木代表中央青委出席会议。听王明、博古作过报告，博古抱了一大堆俄文厚版书，印象很深，如同讲坛上的迂腐教授，当年大家并不喜欢这种搬书本的教授。会后和胡乔木到湖南检查工作，转了一个月。当年我在地方上“红”了（即暴露了），南方局决定调我到延安。又同胡乔木一起到了延安，就被“扣”在中央青委宣传部工作。1941年调到《解放日报》。在这期间，我的处境还比较正常。

1941年，整风运动先在党的上层进行，主要是整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清算其在土地革命时期对党造成的危害和损失。由于发生了王实味等问题，随后整风从上层转到全党来进行，就涉及到了广大知识分子，当时把知识分子的什么缺点都归结为“小资产阶级思想”。这跟解放以后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归结为“资产阶级思想”是类似的。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意义，已经有了定论；但知识分子从而把自己贬得一钱不值的副作用，很少有人谈及。整风运动随即转入可怕的“抢救运动”，至今还没有见到对此事的全面论述。我是在这次运动中被捕坐牢的。

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我以为最主要是弄清“左”的问题。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讲话，特别讲了“左”是我们党根深蒂固的问题。

历史上“左”造成了把人往死里整的严重后果。土地革命时期从富田事变前后开始“肃反”，打“AB团”、打“社会民主党”、“改组派”、“托派”、“罗章龙派”等等，直到长征结束才停止。

延安“抢救运动”，由康生发起并执行，康生1937年从苏联回来，把苏联错误肃反的那一套也带了回来，说什么延安党政军机关“特务如麻”，毛泽东也曾一度相信，随即扩大到华北、华中所有根据地。当时沿用刑讯逼供信的办法，臆造出了国民党统治地区的“红旗党”，把四川、河南、甘肃、广西、广东、浙江、湖南等省的我地下党，几乎无一例外，都打成了“红旗党”。中央党校动手最早，我的一位老同学在逼供之下，诬陷我为特务，且是他的“领导人”，于是我被抓了起来。在枣园、保安处等地共关了几百上千人。杨静仁、武衡、吴波、周建南等都和我关在一起。当时逼供信很厉害。我经历过五天五夜不给睡觉，不准眨眼睛，认为这样就可能失去控制讲出真话来。我当时挺住了，没有乱讲。这种办法有长到半个月的。幸有毛泽东提出的九条方针，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等，才没有重复过去乱杀的错误。随后，毛在中央党校大会上，脱帽鞠躬，对被错整的同志表示歉意，这场运动就此草草结束。1950年我在长沙看过唐纵的全部日记。唐纵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头，戴笠的二把手，在蒋介石侍从室负责特工。他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上写道：现在延安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个内线（唐纵日记现已出版）。可见，康生说的什么“特务如麻”，完全是自己乱自己。

遗憾的是从江西时期起，如此严重、可怕和惨痛的教训，一直没有认真总结，以致解放以后，从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右派、反右倾、“四清”到“文革”，政治运动一直不断，其损失其后果的严重性，真是难以估量的。反右派整了当时十分之一的知识分子；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伤及380万人；“四清”运动认为三分之一基层政权不在我们手中；十年“文革”更是遍地敌情，冤案如山，国家主席、三军元帅都难幸免。1978年后我们党大刀阔斧地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基本结束了自己整自己的漫长历史，但积习犹存，余波未息。对举世公认的改革开放现实，对邓小平的“一个中心”、“三个面向”、“三个有利于”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正确理论与实践，近年来还不是遭到持极左观点人们的“万言书”的攻击么？所以来日方长，斗争正未有穷期。

延安的“抢救运动”，使我头脑更加冷静，较能够在复杂的环境中坚持自己的看法。

我党有史以来一大难题

不断运动，不断整人，这个现象在我党历史上反复出现，必须从根本上挖出它的思想根源。

首先是理论与认识问题。长期以来我们吃亏于“左”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局限于阶级斗争和“消灭一切私有制”（及由此形成的“意识形态”）的框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是正确的，但对于革命的进程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有具体的设想。对革命高潮何时到来，就曾估计得乐观了，但也只是探讨性的，尤其恩格斯到了晚年，已认识到早年的估计过于乐观，并认为经过议会道路改造资本主义是可能的。马克思曾设想在资本主义不发达（直至非资本主义）的东方国家避免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所带来的痛苦，而更快地导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即所谓跨越“卡夫丁峡谷”。马克思仅仅是提出了一个设想，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发展很不成熟时期的革命的设想，竟为东方革命国家一一实践！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似乎更证明了这一设想的指导意义。十月革命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列宁

曾匆匆得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即垂死阶段这一结论，似乎资本主义的寿命屈指可数了，社会主义革命不久就会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同时还提出共产主义可以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观点。列宁急于消灭私有制和过渡到共产主义，碰了钉子后，改行新经济政策，认识到过渡到社会主义是长期的过程。这是符合当时苏联历史实际的正确政策。可惜列宁死得太早。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的新认识，加速实行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实行完全的计划经济；条件不成熟，遇到困难就搞阶级斗争，搞肃反，实行镇压政策。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实行的是“一边倒”的政策，一切仿效苏联。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总是随着人类的进步不断发展的。不同时代，不同国度都应当对马克思主义有所发展，有所创新，而不能死抱住马克思的片言只语或已经过时的观点，生搬硬套。我们犯了历史性的错误，不能怪马克思，也不能怪列宁、斯大林，只能怪我们自己。因为，我们并没有遵从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是生产力和经济制度，而不是上层建筑，后者对前者只能起一定的反作用。我们对这一点，尤其在十年“文革”中，完全颠倒了。战争年代我们讲新民主主义，搞三三制；1945 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讲到：要将“中国建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我们一直认为中国没有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在中国不是多了，而是少了，要允许民族资本主义有一个合理的发展。毛泽东还谈到，“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没有几万万人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毛泽东这些正确的理论、思想，建国后可惜被抛弃了。新中国一成立，就急于进入社会主义，搞“一天等于二十年”，搞“大跃进”和“三面红旗”，一直错到十年“文革”，到“崩溃的边缘”。回顾历史，真是感慨万端。

其次“左”的反复出现还有一个根本原因——体制问题（来源于“无产阶级专政”同封建专制主义相结合），即我们“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有待加强，这就同民主化的问题有关了。

我国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长达两千多年的国家，儒家命根三纲六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于是从秦始皇到蒋介石，一直是一个个人专断、家长制和愚昧、盲从、迷信的国家；当然也是一个权力无限，滥用权力，没有监督与法治的国家。旧社会的这种专制传统也不能不影响到我们的党与我们的新中国。

革命和战争年代，我们的地下党与根据地的党对敌斗争尖锐，战争环境、军事生活，需要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党政不分，客观形势使然，当时不能不这样做。但当年也还有某些值得回忆的民主生活。延安整风开始后，广泛填写“小广播表”即属十分异常行动，以后就逐渐不敢随便说话了。建国之后，战争年代这些传统不仅继承下来，而且历次运动有所发展。党员要做“驯服工具”，人人以当螺丝钉为荣。一个以反封建专制主义为天然职责的共产党，到十年“文革”，林彪鼓吹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一句顶一万句”；“四人帮”搞封建法西斯专制主义；全国人民天天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搞“早请示，晚汇报”。于是围着一个人转成为生活习惯。这不能不使我们深思。

第三，从文化层面上讲，缺乏科学素养和排斥科学精神也是一个根本原因。革命年代搞政治斗争，法治难于健全，是必然的；可是革命胜利后搞建设，革命党变成执政党，就再不能“无法无天”，不讲科学规律，排斥法治了。科学思想、科学精神包含客观的依据，理性的思考，平等的争论，最终是实践的不断检验；科学精神有赖于民主精神，而学术自由和思想自由正是民主的基础，所谓权威主义（“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崇拜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是同科学精神水火不相容的。只有科学精神才能保证我们各种建设不犯错误，才能保证人类的进步。可是我们过去恰恰反其道而行之，大搞一言堂、家长制、大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于是导致大权独揽，唯我独尊、定于一尊，一个人说了算。直到改革开放年代，这种习惯有了改变，但还不够彻底。我们还出现过同科学精神相反的“新权威主义”热，社会主义同封建专制主义还没有完全脱钩。

第四，“左”似乎有一种“惯性”，“越‘左’越革命”，作为一种“生存意识”深深地铭刻在一代

又一代人的心中。右倾危险，“左”倾保险，右是立场问题、“左”是方法问题的传统旧观念，至今还在起作用。“右”的平反了，仍被冷落，尚有余悸，被告诫要“夹住尾巴”；犯左倾错误的人往往总被提拔重用，“文革”时造反派人物有些依旧升官跑红。因此“万言书”不断，“左”倾思想严重的人一遇机会便兴风作浪，肆无忌惮，甚至不点名地批判邓小平理论。相反，强调反“左”，强调一下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强调一下党和国家都应该走上民主化的康庄大道，就会被认为“自由化”了、不利于“团结一致”了。

总之，民主、科学、法治，以及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依据，也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产生与发展的依靠，我们必须遵循邓小平理论，坚定不渝，贯彻到底，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坚决贯彻邓小平 1980 年的讲话

应该说“文革”以后，我国在经济方面比较好地吸取了经验教训，有了较大的突破。经过十多年的曲折，反复实践，我们终于认识清楚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历史上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现代市场经济制度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和社会，总之，利多害少，包容性强，效率较高，成本较低。只有通过市场经济，才能建设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邓小平理论上的一大突破。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规定为实现共同富裕，避免两极分化（追求社会公正）。近 20 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当然，随着实践不断发展，这一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还要继续发展。

相对而言，改革开放表现在政治体制，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还要进一步加强。

1980 年 8 月 31 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极其重要的讲话。由于当时发生了波兰团结工会的问题，有人提出要防止“自由化”思潮，这个讲话就被搁置下来了，直到现在，很少再提及。我在 1997 年 9 月列席十五大时的书面发言《关于防“左”的感想和意见》，摘引了邓小平《讲话》的很多原文，为的是以其正确性和权威性来说明《讲话》中所批判的封建专制主义的残余影响，权力过分集中，家长制作风，特权思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法制的不完备和法治难以贯彻，等等方面，都还解决得不够好。而政治体制改革如不能同经济体制改革同步进行，必然影响经济的更好发展，尤其使得国有企业改革迟滞不前。

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一个很好的文件，文件的内容同邓小平《讲话》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坚持集体领导，反对个人专断；要讲真话，言行一致；发扬党内民主，正确对待不同意见；接受党和群众的监督，不准搞特权，等等。“关于发扬党内民主”是这样写的：“首先要允许党员发表不同意见，对问题进行充分的讨论，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要严格实行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的‘三不主义’。”这些“生活准则”写得都很具体，但是，实行得怎么样呢？我认为还很不够，周扬事件就是这个《准则》通过不久之后发生的。

生活告诉我们：“左”的教条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记得在推行农村责任制的时候，有些省委的领导很生动地描绘过这个艰难的过程：“第一年说搞承包就是资本主义；第二年对搞承包的态度是你走你的阳光道，我走我的独木桥；第三年的态度是穷搞承包富不搞；第四年是富的也搞承包；第五年才觉悟过来——我落后了！”我看过一个材料，说西方禁止随地吐痰这件小事，也经过了一两百年才得以实现。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看来也急不得，要比较彻底的解决需要一个长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前面谈过，我们要大力提倡讲民主、讲科学，讲法治。民主、科学、法治是构成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我们肃清封建专制主义残余和克服“左”的教条主义不可或缺的条件。如果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没有清醒的认识，不仅难以阔步前进，甚至有可能葬送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果。因此，我希望全国上下、党内党外，采取具体措施，坚决贯彻邓小平 1980 年的讲话。

（李锐同志的原文，长约 12000 字，征得作者同意，本刊发表时有所删节）

（责任编辑　方　实）

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 金　凤

核潜艇和"两弹一星"一样，都是中国自行研制的具有战略意义和威慑力的尖端武器，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国防的有力保障，在研制中功勋卓著的黄旭华是我解放前在交通大学就读的老同学。想起当年那个热情活泼、积极参加进步学生活动、并于上海解放前夕加入地下党的小伙子，如今已成为核潜艇总设计师和中国工程院首届院士，怎不令人高兴不已，感慨万千！

我是在参加上海交大百年校庆和几次校友聚会时重新见到黄旭华的。我们都已年过古稀，报国之心不改，通过几次交谈，让我了解了黄旭华参加组织领导研制我国核潜艇的一些情况。

服从分配，甘做无名英雄

1949年，黄旭华从交大造船系毕业，分配到新成立的船舶工业局工作。踏上工作岗位后，他勤奋出色，不几年便当了潜艇设计科科长，跟苏联专家学习，从事扫雷艇、猎潜艇、常规动力潜艇的仿制工作。

1958年6月，中国第一座试验核反应堆开始运行。主管国防科技的副总理聂荣臻邀请有关领导和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座谈研制导弹核潜艇问题。他向党中央呈送了关于开展研制导弹核潜艇的报告，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批准。

1958年7月，有关部门组建了导弹核潜艇的设计研究队伍，32岁的潜艇科科长黄旭华受命参加了这支重要队伍。

黄旭华十分兴奋，他至今记得当时领导上向他提出三点要求：一、坚决完成任务；二、参加了就要干一辈子，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退出去；三、工作机密性很强，严格保密，准备当一辈子无名英雄，不能暴露个人姓名和工作地点，和家属少联系。

黄旭华毫不犹豫，欣然接受了这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排除一切艰难险阻，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艰苦创业，打破大国封锁

核潜艇特别是导弹核潜艇的研制，是集中艇船技术、核能技术、导弹技术、核弹技术和导弹水下发射技术于一体的复杂系统工程，是国家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生产能力的综合反映。导弹核潜艇的设备、仪表有两千多项，近五万台件，电缆近三百种规格，长度近一百公里，管道二百多种规格，长三十公里，总体建造材料有一千多种规格。这些设备、仪表、电缆、管道和材料，全部立足于国内制造。它们的研制涉及24个省、市、自治区和21个部委、两千多个工厂、研究院、所和高等院校。黄旭华谈到这里，十分动情地说，中国核潜艇的研制成功是全国大力协同的结果，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

当时国家的科学技术和工业生产能力还很低，科学实验设施简陋，计算手段也很落后，只有几部手摇计算器，有时只好运用古老的算盘进行计算。

更主要的是，当时国际上包括资本主义大国和社会主义苏联，都对中国进行技术封锁。

黄旭华气愤地谈到，1959 年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来到中国，中国政府曾向他提出援助研制核潜艇的要求，赫鲁晓夫竟然傲慢地拒绝，说什么核潜艇技术十分复杂，花钱太多，中国没有能力研制核潜艇。他甚至提出要和中国搞什么“联合舰队”，苏联出舰队，中国提供基地。毛主席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种要中国出让主权的无理要求，他大义凛然地说：“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毛主席这句话自然是句气话，意思是无论怎样困难，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一定会自力更生地研制出核潜艇。这句话传到部队，成为黄旭华和他的战友们排除万难，在极其艰苦条件下研制核潜艇的巨大动力。

黄旭华说，开始探索研制核潜艇时的技术队伍很弱，除了几位刚从苏联学习常规动力潜艇专业的留学生，主要是新调来的年轻技术干部。有的技术人员连仿制常规动力潜艇也没接触过，要从头学起。以后陆续补充的大学和中专毕业生，更没有实践经验。

最要命的是他们手头没有核潜艇的设计参考资料。国外刊物上难得找到的点滴资料，真伪难辨，不能作为研制工作的可靠依据，一切都得从头摸起。

他们当时的工作地点是一个荒山半岛，条件十分艰苦。大风终年不停地刮，刮得连树都栽不起来。又赶上 60 年代初三年国民经济严重困难时期，主食主要是高粱米和棒子面。黄旭华是广东人，组织上照顾南方出生的同志，每月仅供应两三斤大米和一、两斤面粉。食油供应也少，黄旭华一家五口每月只有一斤半油。生活上的种种艰苦，黄旭华他们都忍受了，因为全国人民都在经受这样的困难。1964 年至 1965 年经济情况开始好转，生活有所改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来到了，白天必须搞“革命”，黄旭华和一些技术骨干还得挨批斗。但是到了晚上，办公楼灯火通明，黄旭华和大家一起自觉加班加点，把白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1967 年，黄旭华被“勒令”养猪，1968 年他才被“解放”出来，夜以继日地继续进行研制工作。夜半寒风刺骨，工厂施工遇到技术问题，一个电话，他们立即掀开热被窝，穿起工作服，冒着零下十几度、二十几度的严寒，爬山五十多分钟，赶到工厂，找出技术故障，和工人一起干到天明。

我问黄旭华，是什么力量支持你们在这样艰苦恶劣的自然条件和政治条件下坚持核潜艇的试制工作？黄旭华回答，全凭爱国的志气，一股强烈的报国之志，一种无论如何中国人也要把核潜艇搞出来的强烈革命责任感。

他向我详细解释了导弹核潜艇在国防上的重要作用。他说，导弹发射有几种方式：一是从陆上基地发射，射程远，威力大，但人家导弹对准你基地，不保险；二是车载导弹，体积和射程受到限制，对选路质量要求很高，人家照样能发射导弹对准它；三是飞机发射导弹，飞机场和飞机都易受攻击；第四种便是核潜艇带导弹长时间地潜伏海底，伺机发射导弹。全世界的海洋这么辽阔、这么深，只要能保存一艘核潜艇，便能打击对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目标和交通要道，保持核打击力量。他说，1964 年我国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便发表严正声明：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但如果遭到核打击，如何有力量保卫自己呢？导弹核潜艇便是保持第二次核打击的主要武器。

听到这里，我明白了导弹核潜艇在保卫祖国事业中的不可代替的作用。身负重任的黄旭华他们这批科技人员能在如此空前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下来就不难理解了。

辩证思维，指导研制工作

生活上的艰苦、政治上的艰难吓不倒立志要研制出核潜艇的黄旭华和他的战友们，真正的难题是如何解决一系列技术问题。

黄旭华首先考虑的是制造核潜艇应该采取

什么技术途径？攻关课题如何确定？设备、材料如何选型？战术性能如何制定等等。

在交大读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黄旭华运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指导研制工作。他和领导一起研究，决定从调查研究入手，发动大家从国外报刊杂志的点滴报道中，带"放大镜"去找，用"显微镜"加以放大，一有线索就跟踪追寻，务求摸清有关核潜艇的研制情况和发展趋势，从中获取经验教训，避免走弯路，提高我们设计研制工作的起点。同时，领导小组又组织大家到全国有关的科研生产单位，摸清国内的科技水平、实验条件、生产能力和科研成果，以便立足国内，研制核潜艇。

在广泛深入地开展对国内外有关资料的调查研究中，富有辩证思维的黄旭华发现，任何复杂的尖端技术都是在常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常规的综合和提高。越是复杂的尖端系统工程越是要利用国内成熟的技术，加以综合利用和提高，特别是总体研究设计，更要在综合运用上做文章，在运用中加以提高发展。他力求运用辩证观点妥善处理好先进和现实、尖端和常规、重点和一般等关系。他认识到尖端并不神秘，综合就是创造，综合能出尖端。他们围绕核反应堆给潜艇带来的特点，将尖端系统工程分解为常规单元，确定了两项总体攻关课题和七项系统、装置和设备的攻关项目，有条不紊地分解给研制人员，并在全国开展大力协同工作，合力攻关，啃下一个个攻关难题。

结合国情，独立设计

研制核潜艇要瞄准世界尖端技术，认真学习、吸取外国的先进经验。但黄旭华认为，不应盲目地踏着人家的脚印，走人家的老路，而应独立思考，通过大量细致的科学实验工作，得出自己的结论。

例如确定核潜艇的线型要适应潜艇水下高速航行的要求。美国的做法是第一步先集中力量解决核动力应用于潜艇带来的一连串技术问题，第二步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潜艇，摸索适合核动力水下高速航行的水滴线型。在两者都获得成功的基础上，第三步将两者结合起来，研制出水滴线型核动力潜艇。他们是世界上第一个研制核潜艇国家，这样分三步走是有道理的。有人认为，我国研制核潜艇似乎也应这么办。

黄旭华认为，既然人家经过探索，走的路成功了，我们不必重复他们的脚印，也分三步走，而是可以大胆地三步并作一步走，一步就把水滴线型和核动力结合起来。

要使这一大胆设想变为现实并非那么简单。黄旭华和许多科研人员不知度过多少不眠之夜，流了多少汗水，费了多少心血。为了掌握好核潜艇水下高速和近水面低速航行时的操纵性能，他们反复进行了风洞、悬臂水池和水舟航模的试验，又通过潜操仪进行仿真，取得上万数据，才使方案成为现实。这样做比分三步走节约了大量时间和人力、物力。

为了使核潜艇能满足导弹发射对核潜艇航行姿态稳定的严格要求，黄旭华他们查看到的美国资料说，美国曾考虑在核潜艇内装一个重达 65 吨的大陀螺，用来稳定核潜艇发射导弹前后的航行姿态。这样一套庞大的机械装置，加上辅助系统，不仅要增加一个仓室，增大了核潜艇的排水量，影响它的航速，而且多了一个攻关课题。

黄旭华从大量试验数据分析，认为安装大陀螺并不是解决稳定发射姿态的惟一方法。如果从操纵的设计上多下功夫，有可能代替笨重的大陀螺的作用，满足水下发射条件下航行姿态的严格要求。

黄旭华果断否定安装大陀螺的办法，认真检查实验工作，取得科学数据，从操纵的设计上提出新的要求，进行反复试验。实践证明这样做完全正确，效果非常好。我们自行研制的导弹核潜艇在进行水下发射试验时，核潜艇的航行姿态稳定得像在陆地平面一样，它的偏航角、纵横摇摆角以至升沉变化等几乎接近零！

"斤斤计较"，万无一失

科学来不得半点马虎，尤其是国防科技的

尖端项目。敬爱的周总理当年曾对核工业指出："严肃认真，周到细微，稳妥可靠，万无一失！"黄旭华他们在研制核潜艇时，正是这样做的。

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他说，学造船的人都懂得造船时必须保证船的稳定性的重要性。他谈到在交大读书，老师曾讲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造船系毕业生的纪念戒指上刻有 I/V 稳性公式的图案，意思是要大家牢记稳性的重要性，千万不能大意疏忽。核潜艇的设备、仪表、附件有几万件，电缆管道密密麻麻，如何精密地确定各个设备、仪表、附件以及电缆、管道和船体材料的重量重心值，然后调整出一个理想的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这是个尖端课题，但又可用常规方法解决。

黄旭华要求所有负责设计的人，都要到有关工厂、科研所蹲点，去弄清楚并控制好与自己有关装艇的设备、仪表、附件以及管道、电缆的重量重心值。在建艇过程中，凡上艇安装的设备、材料，在进船台和上艇前都要精确地全部过秤，记录在案。安装过程中切下的边角余料，多余的管道、电缆，凡拿下艇的也要一一过秤，并从上艇时秤出的重量中扣除。在整个建造过程，他们都是这样天天过秤和"斤斤计较"。这种方法听起来多么土呀！然而，他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精密地求得核潜艇的重量重心值，然后计算、调整。他们做到几千吨级核潜艇的排水量和稳性设计的计算值，建成后的实艇测量值相差无几，几乎一致。他们不是用"大跃进"时代那种不科学的土办法上马，而是靠"软科学"上马，靠思维的软性功能把常规综合成尖端，靠研制过程中严肃认真、一丝不苟、"斤斤计较"的工作，终于保证核潜艇研制成功。

黄旭华把核潜艇研制过程中形成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科学求实、无私奉献"的思想作风归结为"核潜艇精神"。正是这种高尚精神指引大家忘我工作，奋勇前进，攻克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关，直到研制成功。

甘冒生命危险，参与深潜试验

黄旭华概括的"核潜艇精神"句句适用于他自己。当年他领受研制潜艇的任务后，必须保密，好几年他不给家中六七十岁的父亲通信。明知父亲十分惦记，他硬是压下思亲之情。从核潜艇 1965 年立项上马到 1971 年开始试航，黄旭华一直战斗在研制工作的第一线，历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总工程师、副所长、所长。1982 年他被国防科工委任命为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他一直默默工作，正如他当年向组织上保证的那样，甘当无名英雄，默默地奉献自己。

最能说明黄旭华具有无私奉献精神的是这样一件事。

1988 年，有关部门决定对核潜艇进行一次新的极限深潜试验。62 岁的黄旭华，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和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已有好几年。他十分清楚这种试验具有很大风险，犹如飞机的试飞那样。他了解到参加试验的一些新服役的官兵压力很大，有的写下"遗书"向他们的亲人告别……黄旭华为此深感不安，决定和即将参加深潜试验的核潜艇官兵对话。

黄旭华和同学金凤

他首先告诉大家，设计中余地相当大，建造中经过泵水泵压试验，和极限深潜有关的问题已逐项研究解决，所有的仪器、设备、部件统统经过仔细检查，这次深潜试验是有充分科学根据的，要大家放心。他说，试验是一个深度一个深度地逐渐下去，每个深度都有测试人员把关。到临界极限深度时，是一米一米地下潜，工作十分细致。他这样说，使参加试验的官兵增强了很大信心。但黄旭华并不回避事情的另一面。他承认，试验还是有风险的，按照现在的认识水平还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他说到这里，一些官兵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有的战士暗暗想，为了神圣的国防，豁出去了！

不料，他们听到总设计师黄旭华说了这样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为了确保这次深潜试验的成功，我和你们一起下去！"

一语惊人，在场的官兵听呆了，在场的领导也听呆了。他们连忙说："老黄，你不要这样讲，我们再研究研究。"黄旭华微笑着说："你们别拦我，我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参加核潜艇研制工作，已经二十多年，情况比大家熟悉。我在指挥岗位，万一发生情况，一可以根据情况作出判断；二可以及时处理；三可以稳定大家情绪，保证试验顺利进行。我的决心已定，谢谢你们的好意，你们就不要阻拦我了。"

对于他将亲自参加深潜试验，按照通常做法，他应先报告组织。但他知道，领导上一定不会批准，一定不会允许总设计师去冒这样的风险。他决定生平第一回，不请示报告而在会上宣布。

但他不能不和自己的老伴打个招呼。他的夫人李世英比他小八岁，大连海运学院外文系毕业。他们 1956 年结婚，1962 年她调到部队做核潜艇情报工作，和他同甘共苦，是他得力的助手和贤内助。当他谈了自己准备亲自参加深潜试验，深明大义的李世英很清楚他将冒的风险，仍毅然决然支持他和大家一起下去，黄旭华没有后顾之忧了。

领导上经过考虑，也批准了黄旭华的要求。

准备工作进行得更加认真细致，对所有仪器、设备都更仔细地检查一遍。试验当天，领导同志到码头送行，紧紧握住黄旭华的手，郑重叮咛："老黄，我们相信你，祝你成功。"黄旭华默默点头，沉着地和指挥员一起步入核潜艇指挥室。

黄旭华稳稳地站在指挥室里，注视着指挥员下达潜水命令。一百米，两百米，顺利下潜。接着又十米、十米地下潜了。黄旭华密切注视着下潜的深度和变化。当下潜到达极限深度时，核潜艇承受的压力已超过正常压力几十倍，钢板劈啪作响，但响声不很大；海水渗透进舱成水珠状，但没有出现漏水现象。这表明，我们的试验已超过当时美国核潜艇深潜极限的水平。

试验成功了！黄旭华和核潜艇指挥员高兴得笑起来，黄旭华挥挥手，指挥员下令核潜艇缓缓回升。当核潜艇平安地露出水面，回到码头时，受到基地官兵和领导同志的热烈欢迎。

欢迎人群中没有黄旭华夫人李世英。她虽然顾全大局，支持丈夫甘冒风险参加极限深潜试验，但她多年从事核潜艇情报工作，从资料上看到，有的核潜艇作极限深潜试验时，艇毁人亡！当然，她信任黄旭华负责设计的核潜艇功能。但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她没有到码头送行，在家中守着电话机。那试验的几小时，真是度时如年，不，度分度秒似年！终于，电话中传来政委的声音，兴奋地通知她极限深潜试验完全成功，黄旭华已平安回到码头，李世英喜极而泣，大哭了一场。黄旭华回到家，看到老伴抽泣，懂得老伴大哭的全部意义。这几小时，她等于和他一起在精神上经受了极限考验。他立即挥笔写了一首小诗送给夫人："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他的夫人破涕笑了。这首小诗好就好在"花甲痴翁"这四个字，尤其一个"痴"字道出黄旭华痴迷于核潜艇事业的高尚情操。

在这之前黄旭华主持设计的核潜艇进行过自持力即持续长航能力的试验。他了解到，美国的指标定为 90 天，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结果，航行 78 天，不行了。重新准备，最多坚持 84 天，艇上官兵疲惫不堪，由军舰迎接他们上岸，有些官

兵被人用担架抬了出来。这也难怪，在水下连续潜伏八十多天，真够他们受的。

我们的核潜艇水下的自持力如何？目标瞄准美国。也定为 90 天。结果，70 天过去了，一切良好。80 天过去了，一切正常。

90 天到了，本准备另派一批艇员接替他们靠码头。潜艇指挥员来电，他们能自行上岸，不需军舰迎接。但码头上还是准备了医生、护士、担架和救护车，随时准备抢救。

连续远航 90 天的中国自行制造的核潜艇归来了，露出水面了。黄旭华高兴地看到，军装整齐的司令员带头出来，战士们一个个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队上岸，大叫："我们拿到金牌啦！"

这一时刻，一向稳重冷静的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激动得也和官兵一起高喊："我们拿到金牌啦！"这说明中国核潜艇的远航能力此时已名列前茅。

幸运的人，赤子之心

我们一些交大同学听到黄旭华的这些介绍，从内心深处为他感到自豪。我们一致认为黄旭华是个幸运的人。幸运的是，黄旭华 1949 年从交大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学有所用，学用一致，没走弯路。1954 年至 1958 年，他参加常规动力潜艇的仿制工作。从 1958 年起，他和其他同志一起开拓了中国核潜艇的研制领域，主持过中国第一代攻击型核潜艇和弹道导弹核潜艇从方案论证、研究设计、施工建造到试航各个阶段的技术工作，主持过多项重大技术攻关项目的研究，参加指挥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和极限深度深潜、水下全功率全速航行等大型试验，为我国继美、苏、英、法后成为第五个自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国家而献出他毕生的精力，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原来，黄旭华准备一辈子甘当无名英雄，这是他受命研制核潜艇时向党组织作出的承诺。时代不同了，改革开放后，他的贡献和价值得到应有的公开确认和尊重。

1978 年，他获全国科学大会奖，1985 年和 1996 年他两次获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1986 年被授予船舶工业总公司劳动模范称号，1988 年荣立船舶工业总公司一等功，1989 年国务院授予他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同时又是工程技术界第一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有突出贡献的专家。

1994 年 5 月，国家成立中国工程院。黄旭华被选聘为首批院士。1995 年，他获香港一些大企业家为重奖国内有重大成就的科学家，获奖金十万元（港币）。

长期以来，黄旭华一直生活得很艰苦。1976 年，他依然住在研究所楼梯底下的一间单人宿舍。1982 年，他已担任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所长，一家五口才分到三室两厅。他身为所长，主动将好的楼层让给别人，自愿住最高一层。这里夏季气温高达 39.5 摄氏度，冬天为零度，在这样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黄旭华以苦为乐，他说："我们当年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参加地下党，心中想的只是推翻黑暗的旧社会，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平等的新中国。那时根本没想到什么工资和待遇。解放后，我们奋力拼搏，胸中装的是祖国的建设和人民的幸福。我们艰苦清贫，甘之若素，政治风浪，逆来顺受，多少委屈，毫不计较，从来也没考虑过什么级别、待遇。我认为自己是幸运的人，因为我能将自己毕生的精力贡献给国防科技事业，为保卫国家的安全作出应有的贡献！"

幸运的黄旭华同时有着一颗赤子之心。我记得 1999 年 11 月，原上海交大的重要社团"山茶社"八九个老社员重新聚集一起，回忆"山茶社"在学生运动中所起的作用。来北京参加工程院院士会议的黄旭华也来了。大家谈了许多情况。谈到高兴处，73 岁的黄旭华院士站起身来，脱下外衣，只穿一件毛衣，又歌又舞，表演了"山茶社"当年演出的诙谐风趣的歌舞小品。他和我们一起唱着"姐姐妹妹拾棉花，忽然想起走娘家……天上下雨路又滑，摔破我的大西瓜呀，哎哟，摔破我的大西瓜呀！"我感到，身为院士，年过七十依然保持一颗赤子之心，这是黄旭华最可宝贵之处。

（责任编辑 云 山）

红军电台创始人之一王逸群

● 舒 云

1930年4月底，红七军缴获敌人的一部电台，那么沉的铁疙瘩，也不知怎么用，在转移途中把它埋掉了。那时，红军是游击作战，用号音、旗语、徒步、骑马进行联络就足够了。以后，红军转向运动战，将领们才感到电台在长距离通信中起着重要作用。在第一次反"围剿"中，红军总部就命令所有部队必须把缴获的电台和电台人员送到总部。这一次红军只缴获张辉瓒师部的一台收报机（发报机被搞坏了）。王诤是张辉瓒的十八师电台报务员，被俘后，总部首长要他们留下来办无线电训练队。那时，朱德总司令每天晚上都要与王诤他们谈话。1931年2月初，红军在江西宁都县小布开办了第一期无线电训练队，王诤任队长，学员是从红军挑选的优秀连级干部。就在训练班期间，红军在打谭道源部队时，又缴获了一套完整的灯泡式电台和电池。这时，有了一部半电台的红军还不能通报，当时主要用于抄收新闻和对敌侦察。毛泽东对这个训练队十分关心，经常来讲形势或上党课。在第二次反"围剿"前，上海已经派伍云甫、涂作潮、曾三等到中央苏区，又办了第二期无线电训练班。同时，红三军团也开办了无线电训练班。1931年7月，国民党第三次"围剿"开始，为了集中优势兵力，红军主力要从敌空隙中穿过。在转移途中，毛泽东问伍云甫，电台缺了什么就不能工作。伍云甫说真空管，毛泽东就把真空管装在自己口袋里，让警卫员拿着电键。

王逸群

1930年春天，上海党组织想让王逸群去学习无线电收发报技术，征求他的意见。那时王逸群正在大夏大学读一年级。这是个很危险的工作，稍有不慎就会被捕牺牲。特别是收发报机上用的蜂鸣器，一般人是听不到的，但狗耳朵很灵，一开蜂鸣器，狗就在外面叫，这在特务如林的上海是很难掩护的。但王逸群接受了组织的派遣。中央特科发给他一台练习机和字母的号码，并按月给他生活费。他就每天练习，直到滚瓜烂熟。当时中央特科派伍云甫来教他，每星期来一次，一年后伍云甫调走，上级又派王子纲来教他。直到1931年4月，领导中央特科的顾顺章叛变，5月，来到了江西瑞金苏区的中央局无线电队。

王逸群到了中央苏区，怕家庭受到牵连，就托朋友告诉家里，说他跳黄浦江死了。

王逸群出生在四川省广汉县一个小康家庭中，他在四川成都民主大学读预科时就接触了

马列主义。1929 年他考入上海大夏大学后，经常去闸北的上海艺术大学去听茅盾、沈从文等人的讲演。1929 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秋天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 年夏天，鲁迅在上海艺术大学演讲提出的知识青年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中去，大学生要真正了解工人的斗争和生活。王逸群就和同学王新民在工人聚居的浦东区租了一间屋，体验工人的生活，并与工人交朋友。在伍云甫帮助下，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解决的道路只能是民族民主革命。

王逸群的任务是建立上海党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无线电联络。王逸群记得，从 1931 年夏天起，日夜开机，轮流守候在电台前，从空中成千上万的呼叫声中，寻找上海党中央的呼号。那时电台信号弱，像海底捞针，大家都很焦急，几个月过去了，他们仍守在电台前。一直到了秋天的一天晚上，曾三值班，王逸群协助他，终于收到了党中央电台的信号。

王逸群到中央苏区时正值国民党对苏区第三次“围剿”，他负责配合王诤、刘寅搜集军事情报。虽然这时红军才 3 万多人，但由于对敌人情报掌握得比较清楚，红军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国民党军的电台建立时间也不长，1927 年时，国民党才有一个军装备了电台。到了 1929 年底，国民党军也只有 26 部电台，直到 1949 年，国民党的重庆军用无线电机工厂还主要生产 15 瓦的发报机。而上海地下党，早在 1928 年就开始装配 100 瓦和 200 瓦的机器送往红军中了。敌人哪里想到红军中竟然有了比他们还高级的电台，所以一直很大意。王诤和刘寅等过去是张辉瓒部队的电台人员，与国民党电台的负责人是过去的同学、同乡或者同事，对国民党各师的电台代号都很熟悉，知道敌人的习惯，每调动一个新地方，都要互相告诉地址。这样，红军就知道敌人准备如何进攻，走哪一条路线，敌人的进攻基本上有了了解。加上地方党组织配合送来的情报，一般十拿九准。敌人“围剿”时虽然人数多，但他们经常兵分多路。这样，红军集中兵力打敌人薄弱的一路，加上选择有利地形，所以仗仗打胜。第一仗打了上官云相师，第二仗打了郝梦龄师，第三仗打了毛炳文师，连歼敌人三个师，彻底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围剿”，并缴到了敌人的三部电台。后来敌人虽然知道红军有电台，但他们也搜集不到什么红军的情报。因为红军电台特别注意保密，从不讲调动的地名，再加上敌人初到苏区人生地不熟，老百姓又封锁他们，所以他们基本成了瞎子聋子，只能被动挨打。

不久，宁都起义部队一下就带来了 8 部电台和 40 多名电台技术人员。这时红军的电台已经发展到 14 部。1931 年 12 月，在军委电台的伍云甫派王逸群到红五军团无线电台做政治工作。红五军团是原来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受抗日救国的影响，在赵博生、董振堂和地下党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改编成红五军团。在王逸群的耐心工作下，当时红五军团电台的负责人荆振昌带头留下来，好多无线电人员也打消了顾虑，自愿留在红军。王逸群在配备红五军团无线电台的同时，也对红十三军、红十四军、红十五军的收发报机的安装和配备作了详细的检查，及时做到各师和军团以及军团对军委的电台畅通。

之后，在福建长汀扩大红军时王逸群担任突击队长，完成任务后调任福建省委宣传部长，当时刘少奇是省委书记。1936 年春，组织上派他到西安参加我党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抗战时期，他担任过八路军总部民运科长、晋东北地区特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他担任过热河省委宣传部长兼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民运部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副政委，参加了辽沈战役和天津战役后调任四野南下工作团政治部主任……1942 年延安搞“抢救运动”，王逸群曾被错误地隔离审查，“文革”中，他又被打成特务、叛徒、走资派，开除出党。他坚持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每月交 50 元党费。不让他申诉，他就写材料，前后写了 150 多份，直到彻底平反，重新为党工作。

1986 年 1 月 25 日，王逸群在北京病逝，终年 77 岁。陈云、彭真、聂荣臻、黄克诚、程子华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

（责任编辑　刘 文）

戈枫为自己画了个圆满的句号

●南雁

几年前，一位老战友去看望赋闲在家的戈枫，问起他最近在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在等着画'句号'啊！"

没想到他如今真的画上了句号。去年3月21日，我忽然接到他女儿的电话，说她爸爸去世了。说到这儿，她已声音哽咽，语不成句。

放下电话，眼前霎时浮现戈枫同志慈祥的面容和硕长挺直的身影。我下意识地翻捡案头上的文件夹，找出二年前他寄给我的一篇稿件：《忆50年前听小平同志作报告》。稿件讲1948年4月间，鉴于我中原地区扩展很快，干部奇缺，上级领导确定从戈枫所在的平西根据地组建一个包括他在内的南下工作团，前去支援。由于敌人阻隔，交通不便，虽日夜兼程，仍行近三月，才到达中原区的腹地，受到热烈欢迎。中原区的几位主要首长刘伯承、邓小平等分别给他们作了报告，他认真作了笔记。后虽几经战乱，多次搬家，并备受"文革"冲击，居然得以保存，完好无损。小平同志逝世后，他缅怀往事，夜不成寐，特地将小平同志当年的报告记录整理成文，以志纪念。报告着重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强调要从实际情况出发，树立民主作风，形成好风气。

他将稿件寄给我，是希望在我当时"打工"的那家杂志刊登，也是对我的信任和支持。无奈我没有拍板权，未能如愿；也曾想据此写篇访问记作补救，又怕届时发表无门，下不了台，以致压在案头成了心病。如今他匆匆离去，无法向他作个交代了……我怀着歉意，回想起同他的相识相知。

我认识戈枫同志比较早，戈枫同志认识我则比较迟。60年代初，我入行《羊城晚报》任记者时，戈枫同志任广州市委宣传部长兼报社编委会主任，我曾在台下聆听他的讲话。20余年后，他认识我时，已经"卸鞍歇马"，成了一介平民。彼此作为杂文作者，多次应邀一块儿参加会议，这才得以透过他不苟言笑的外貌，接触到他的那颗平常心。后来捧读了他馈赠的、近年出版的自选集《悠悠岁月》，文如其人，使我对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给我感受至深的一点是，他平易近人的质朴。按说，他是名副其实的从延安出来的"三八式干部"——1938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下羊城后，他一直身居要职。先后担任过广州市委宣传部

副部长、部长——其间还兼任过市委党校校长、《广州日报》社长、《羊城晚报》编委会主任等,60年代中期调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在“文革”之前他已经出版过五本书,有小说集、杂文集、思想修养漫谈集等。他大可以在我这个当年他麾下的小记者面前,讲讲“光荣史”,给予教诲;他也早可以参加中国作协,自诩“著名作家”之类。但他绝无这类表演。据我观察,他总是身着布衣鞋来参加会议,默默坐在会场一边听大家发言。只有当会议主持者请他发言时才说上几句。至于会议期间乘车食宿等更是不见他提过丝毫要求。在他古稀之年作协广东分会吸收他为会员,他竟动情地说:“这是我过去想也不敢想的。”

记得有一年春节,我同他的一位老部下一起去看望他。发现他和老伴留守“空巢家庭”,子女们都早已自立分居了。他笑眯眯地说,最近发了点“小财”。坚持请我们到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原来是《羊城晚报》没有忘记他们这些老领导,节前给他们送了点慰问金,他就拿来款待我们了。

正因为他平和亲切,幽默善谈,使我很快消除了初次接触时的拘谨感,成了相处融洽的忘年交。

我思索过,为什么像戈枫这样的老革命能做到不自视优越和特殊,始终以普通一员的身份,严以律己,平等待人呢?我想,这是由于他投身革命没有掺杂私心,不是为了个人的名利和享受,而是为了祖国的繁荣富强,并保持这个信念至终。这有他本身“写”下的历史为凭。

戈枫同志,生长于燕赵之地——河北邯郸农村。18岁那年他当众撕碎日本强盗张贴在他们村里的“中日亲善,共存共荣”标语,抱着不当亡国奴的决心,辞别父母,背井离乡,奔赴延安,入了“抗大”。由于喜欢读文艺书籍,开始学写故事、小说。“作品刊登在报刊上,受到鼓励,写得更积极”。后来领导上让他做理论宣传工作。他自度在“抗大”是学武的,没有读几本理论书,全力以赴也未必能把工作做好,哪里还有工夫构思故事,创作小说,他就结合工作改写杂文,写思想修养方面文章,而且全用业余时间,星期天,节假日,天长日久,积少成多,至1961年已出版了五本集子。这些足以明证,他以革命利益为重,个人的兴趣爱好服从工作的需要。

还有几件小事可以表明他的人品。一是1949年上级领导要戈枫所在的《江汉日报》全班人马开进武汉创办《湖北日报》。他却郑重地向领导提出要求留在农村工作。理由是他比较熟悉农村,相反,“没有进过大城市,怕那里情况复杂,应付不了,贻误工作”。二是他“喜欢《七品芝麻官》这出戏,更喜欢芝麻官唐成这个人”。赞扬唐成为民作主,无畏无惧,善恶分明,刚直不阿。到北京,特地买了一个泥塑唐成,放在案头,每天都望他几眼。三是有一次,他因病被“强迫”住院,次日一早醒来头脑清醒如常,便坚决要求出院,结果被护士笑为“傻瓜”……他有感而作,写了一篇《“傻瓜”与“精瓜”》,充满感情地说:“我们革命队伍里,的确有许许多多的‘傻瓜’。他们不是为了自己也不是为他的一家,而是为了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为了我国勤劳的人民,或者说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理想,就这样,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离乡背井,久别亲人,在烽烟弥漫的战场上,在白色恐怖的‘地下’,或在暗无天日的监牢里,他们同国内外残暴的敌人,进行着英勇顽强的决死的搏斗……以至在最严重的时刻,洒热血,抛头颅,像苍松坚贞,决无怨言……不仅过去,就是现在建设社会主义将来建设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却正是这样的所谓‘傻瓜’”。

是故,他的老领导王匡同志评论他:“为人是非分明,胸怀坦荡,借用一句‘老话’,他很有一股燕赵豪侠之气。”著名作家秦牧生前也称赞:“群众对戈枫的评论是很好的。他立身处事,一贯都相当严正。”

戈枫走了,我认为他已经为自己的一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责任编辑　洛　松)

沫沙十年祭

● 李 普

这次搬家,发现了一些久寻不获,因而渐渐忘记了的宝贵东西,其中最珍贵的是沫沙廖公给我们写的一幅对联。1981 年春季的一天,我请几位湖南同乡老大哥夫妇来寒舍小聚,那时候沈容还能下厨,很露了几手。饭后大家赋诗写字,沫沙写的就是这幅对联,文曰:

胸无点墨真干净

笔重千钧保吉祥

十年浩劫之后,他于 1978 年回到北京。重逢时他说:"我原来以为《新华日报》只剩下你我两人了。"后来我们同住医院,谈天的时候他念过这幅对联,记不清是他临时做的还是先已做好的,这次在我家里写了出来。他去世以后增订出版的《瓮中杂俎》及其最后部分《劫后文存》中都没有收,看来它不曾在报刊上发表。现在我把它裱了起来,挂在客厅里。

这两句话看似平常,开个小小的玩笑罢了,发点小小的牢骚罢了;特别是,这点儿牢骚是通过玩笑表现出来的,含而不露。我想,这就是幽默。但是它总是要叫你往深处想的,这大概就是幽默的力量。这幅对联使我想起许多事。

"文革"中我多次想过,发过愿,甚至赌过咒,今后不买书、不看书,不置书桌、书柜,总而言之不再当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最肮脏,我要遵照毛主席的教导,当个干干净净的泥腿子。

这些,现在都过去了。对着这幅对联,我想的是沫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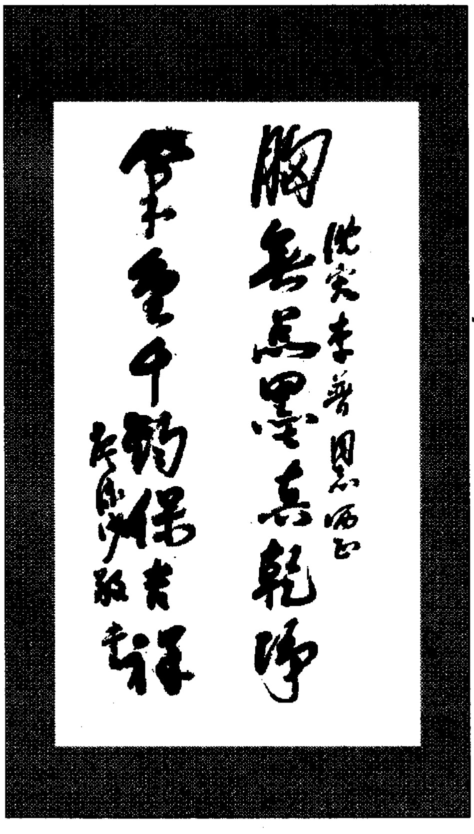
我最初注意到廖沫沙这个名字,是 1938 年,是听到他的一出家庭惨剧。那时我在长沙的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工作,知道主持长沙《抗战日报》的人叫廖沫沙。这张报纸是中国话剧的祖师爷大作家田汉田老大创办的,他筹到了一笔开办费,办起来以后他就不管了,由廖沫沙去撑持。有一天人们纷纷传说:廖沫沙家里出事了!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自杀了!人们揣测,她肯定是先把毒药给孩子吃了,然后自己才吃的。廖沫沙上完夜班,天亮回家才发现。他独自支撑那份报纸已经够吃力的了,既忙且穷,哪能再顾得了家呢?后来还知道他妻子得了肺病,这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比现在的癌症更可怕,丧命是早晚的事,何况还必定会传染给孩子!看来她是思之再三,实在走投无路,才横下一条心走这一步的。沫沙有一个笔名叫"怀湘",他常用,也许与这幕惨剧有关。也是在后来才知道,他那位妻子是我们《新华日报》总经理熊老板的女儿,是一位我们湖南的蛮妹子,难怪有这股子蛮劲。熊老板(瑾玎)和老板娘(朱端绶)是一对有名的老地下党员,那时候不在湖南。熊老板曾入狱多年,夫妻俩都擅长做格律诗。

沫沙家里出了这件事,那张报纸很快就撑不下去了,沫沙辗转去了香港。日寇发动太平洋战争以后,沫沙从香港脱险归来,周恩来调他来重庆《新华日报》担任编辑部主任,那是 1942 年。那时我在当记者,第一次见到这位久仰的报人。他笑口常开,很是开朗随和。我们一下子就像老朋友那样亲热起来。后来我不当记者了,当编辑,成了他的部下。我们都是要上夜班的,住在山上一间大房子里,那里比较安静,白天好睡

党。他住在靠里的右小角里,用书架隔开,摆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这就算是很优待了。

他是在上海入党的,我听说王明路线时期地下党有所谓“飞行集会”,问他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说那就是平时隐蔽在地下的共产党员们,由党组织规定时间,大白天在繁华大街上人多之处突然集合,喊口号、撒传单。他就是在一次飞行集会中第一次被捕,坐了一年牢,这等于是党组织命令他们自己送进牢去的。这样的危险事很不少,有一次一位同志住处的信号如常,但是他应该露面的时候没露面,不知道是否出了事,党组织必须赶快弄明白。最快的办法是到那人的住处去探看,这个任务落到了沫沙头上。沫沙走在前面,上级的人在后面跟着,幸好,没出事,否则不是去送死吗?他讲完了这段故事,发议论似地说:地下党就这样断送光了。但是如果换上是你,你会不去吗,尽管你心里不以为然。我们都是自愿提着脑袋来革命的,是随时准备牺牲的。

他 20 岁那年,湖南发生“马日事变”,黑名单上有他,他从长沙出走到上海。他在上海开始以写文章为业,这“为业”的意思是糊口。其实应当说他是以革命为业,他是一位革命职业家,写文章也是革命,是以笔代枪,反对国民党专制独裁,反对国民党不抗日,要求抗日,要求民主,写这样的文章也是要准备掉脑袋的。以笔代枪之外,他还要做其他秘密工作,总而言之随时准备牺牲。他曾三次入狱,侥幸活了下来,又弄到妻儿惨死。他照样继续革命,上夜班、写文章,继续勇往直前,继续置死生于度外。谁想得到呢?到了那个革命之后,到了他为之准备掉脑袋而取得的天下,他那枝笔却不行了。而竟有如千钧之重使不动了,他只能祈求保吉祥了。他



不能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只好赞叹泥腿子干干净净果真好。

他这幅对联写了这种境况,隐隐约约表达了这种心情,但是我们看不到悲伤,更看不到怒火。他只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发了一点小小的牢骚,他还在微笑。也许他流过泪,但是我们绝对看不到。

他刚毅,凛然傲然,开朗天真;另一方面,有时候对某些人和事,又能加以嘲弄,以开玩笑的态度予以卑视。比如对“四人帮”和他们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如此,不是横眉冷对千夫指,而是含笑冷对千夫指。这些,过去我似乎略有所感,但那只是些零零碎碎的印象,没有联起来想过。最近才想明白,想明白了才看清楚,才决意写这篇文章。他刚去世的时候有一位编辑朋友约我写文章悼念,我写不出来。他是 1990 年 12 月 27 日去世的,值此十年忌日,谨以此文致祭。

这要从我请他改诗说起。那天来我家的几位老大哥,最年长的是曹瑛,其次是沫沙、黎澍、于刚、最小的是李锐,也比我大一岁。饭后赋诗作字,李锐豪兴遄飞,第一个出手,写了即席口占一首,接着是曹瑛,写了他在“四人帮”狱中的一首诗。最后沫沙写了那幅对联。黎澍不愿花脑筋做诗,于刚说回去做一首,于是大家尽欢而散。我很高兴,心想也做一首试试吧。辛辛苦苦凑了四句,自己也觉得很不对头,便寄给沫沙,请他改。

他帮我改了,还给我写一封长信,首先逐句解释何以要那样改。头两句改了一两处,主要是平仄不当;三四句全改了,包含了我原来的意思,他重新造句。然后他写了这样一长段话:

我建议你:既作旧体诗,还是要大体按旧体诗的格律,尤其是绝句(四句)

与律诗(八句),前人认为这两式是最严格的格律诗;它们的妙处,就在于既守格律,又成佳句,文字简洁,意趣无穷,引人入胜。前人认为这两式是诗体中最难作的;难就难于格律严。但我却认为:只要掌握了格律,倒比写其他形式的简便易行,而且意味隽永,一旦写成之后,自己颇能自得其乐。格律也并不难掌握,你可以找点作旧体诗的书看看,以你现有的基础,一看便会。这种书,市上是有卖的。我似乎记得北大王力教授出版过这类书,可惜我手边没有这本书,无法奉赠。万一买不到,你哪天有空,到我家来呆个半天,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平仄格式抄给你参考。此外你必须自备诗韵一本,以便用时备查。

这样,我登门求教,到他家里去了。他着重讲“平仄”,附带讲了“粘连”。他自己懂透了,所以能要言不繁,三几句话就讲得清清楚楚。我豁然开朗,如他所说,觉得格律这件事确实并不难。他也很高兴,一再说:“你写吧,写格律诗真正是很好玩的。”

接着就谈天,谈他是怎样写起这种诗来的,他兴致特好,像讲故事一样越讲越来劲。我听得很入神,他讲的确实是一个故事,而且是一个很吸引人的故事。当时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但是直到最近我才恍然大悟,理解了这个故事我才更认识了他这个人,更增加了我对他的景仰。我只能责怪自己太差劲,要是早明白了该多好啊。

他说他童年读过《千家诗》、《唐诗三百首》;少年时代正逢“五四”新文化运动,他放下旧诗读新诗,而且学着写;30岁以后遇到抗日战争,当了报纸夜班编辑,从此几乎与诗歌绝缘,至少在30年以上。他接着说,世界上的事情真正千奇百怪,想不到“文化大革命”竟让我再续前缘,做起诗来。讲到这里他插了一句:什么“文化大革命”?让我来一点编辑技巧,勾一勾,颠倒一下,叫做“大革文化命”,这才差不多。他插了这一句,接着讲他的故事。接下去这段话极其精彩,可惜当时我只把它当做笑话听了,现在才深深地感受到那震撼的力量。他在《余烬集》的《自序》里把他这个故事写了出来,其中写了这段话,意思跟那天讲的一样,我干脆把它抄下来吧:

是什么机运使我同旧诗再续前缘呢?说起来恐怕人们不易理解:我凭记忆背诵旧体诗与自作打油诗,是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上台挨批挨斗的时候。挨批是挨骂,挨斗是挨打,这不是很痛苦的么?可是我清楚地自知,我问心无愧:既没有反对过党和社会主义,更连作梦与发疯都想不到要反对毛主席。我的罪过,至多不过是多写几篇杂文,写得不好,或许还有点小差错,而那些“帮们”却越批越离奇,给我戴上大而无当的帽子,高冲云霄,戴上一顶,被风吹落一顶,总套不住我这小小的脑袋;等到他们动手扭胳臂,迫使我低头弯腰撅屁股的时候,我就更觉得,这哪里是什么“文化大革命”,简直是在开玩笑、耍恶作剧。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在低头弯腰的时候,我默念起:“大慈大悲南无阿弥陀佛、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用这样的咒语来分散肉体的不舒适和取得精神上的胜利与快乐。可见阿Q精神,人皆有之,我也未能免俗。

在“文革”中挨批斗的人很多很多,把“文化大革命”看成“大革文化命”的人也是有的,虽然不一定这么明确。但是,把批斗因而把“文革”看成“开玩笑”、“恶作剧”,特别是,“当我一想到这些,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的,恐怕就不多了吧。他当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亲自领导的,那时候报刊、广播、电视天天这样明白昭示,而且如廖沫沙自己所说,他“更连作梦与发疯都想不到要反对毛主席”,尽管如此,“文革”中那些现象却使“我的滑稽感就油然而生”。我想,这正是他之所以异于别人的特点所在,是廖沫沙之所以为廖沫沙的特点所在。它之所以使我深感震撼,就在于它表明这廖沫沙是这样地超凡脱俗,与众不同。

这里我要着重声明一句,我只是在与众不同的意义上使用超凡脱俗这四个字,这四个字不包含任何高低优劣之类的品评。比如在“文革”一开始就被大肆挞伐的“三家村”中的他们三位,都是大作家,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但是这三位就各有各的特色。邓拓久在解放区,政治

斗争经验十分丰富，他曾经被指斥为“死人办报”而被逐出了《人民日报》，这一回，他清楚知道很难过得去。你说他觉醒了也好，说他绝望了也好，总而言之是他看透了，因此他早早地自己了断，免得受辱受罪。吴晗又大不一样，他是大学讲台上一位教授先生，如沫沙在一篇交代中所说，吴晗“社会生活和政治斗争的经验比我还幼稚”。所以，“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吴晗就被吓死了。一点也不错，他是被迫害致死的。究竟是怎样被迫害致死的呢，具体地说，我认为他是被吓死的，他几曾见识过这种阵仗。而廖沫沙呢，对于遭到点名批判，他始而怒火突发，继而心情沉重，然后当他在挨批斗中看到那一切而感到很滑稽，玩笑只当它玩笑，他就以极度的轻蔑来对待那个“文化大革命”了。我想，只是由于采取这种态度，他才能够从这个“大革命”中活着走过来。事实上，他早已以文贾祸，早在1966年这场浩劫开始之前，他就因为写了《有鬼无害论》那篇小文章，于1963年被勒令在北京市委扩大会上作了检查，随即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的职务，下放农村了。

现在我接着讲他的故事。他把默念的那些话叫做“挨批咒”、“挨斗经”，然后发展到背诵旧体诗，再发展到改作旧体诗，最后又由改作而发展到创作。他说他起初背的是《千家诗》的第一首：“云淡风轻近午天，旁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背过两三次以后，他觉得情景同他的现状不对味，于是开始了他的改诗事业，把这首诗改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弯腰曲背舞台前；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拜年。”他说，这样一改，倒也情景逼真，形象十足。背诵和改作让他吃到了甜头，感到可以驱愁解闷，而且乐趣无穷；再往前一步，他就创作起来。

《嘲吴晗并自嘲》现在成了名篇。这首诗置于《余烬集》之首，作于1967年夏，很可能是由改作而创作的第一篇。我们先念这首诗，再听他讲写作的经过，看看廖沫沙这个人多么特别。这是一首七绝：

书生自喜投文网，
高士如今爱“折腰”。
扭臂栽头喷气舞，
满场争看斗风骚。

沫沙在一篇文章里讲了这件事。他讲得很详细，我这里只说概况。1967年有一次，他同吴晗被揪往京西的一个矿里批斗。批斗之前，两人被关在一间职工宿舍里。他看见吴晗愁眉苦脸地低着头，他很同情，为了稍解吴晗的烦恼，低声地对吴晗说：“咱们现在成了‘名角’了，像梅兰芳、程砚秋似的，如果一台戏没有我们出场，那就唱不成了。”吴晗一听这些话，脸上立刻轻松起来，抬起头带着微笑问：“那我们唱的是什么戏呢？”沫沙随口说：“我们唱的戏叫《五斗米折腰》。”吴晗立刻懂了，这是指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他是北京市副市长，也是个地方长官，现在挨批斗，总要做喷气式，低头折腰。于是吴晗恢复了平时天真的姿态，要沫沙帮他算一算他的工资能买多少个五斗米。两人都算不出来，沫沙说，那就去掉“五斗米”三个字，简称《折腰》吧。沫沙这篇文章接着写了以后一些情节，让我再抄两段：

“就因为这一段对话，使两个人的心情大为轻松，而且也谈了一些别的事。在回城的火车上，我回想起这段对话，觉得有趣，在默想中凑成了一首歪诗。”

“我作完这首诗，自己觉得很有趣，但身边坐着许多人，不敢笑出声来，只能在肚子里抽搐几下，也不敢当面告诉吴晗。”

在那场浩劫中，他被羁押十年，写了不少检查、交代，以及思想汇报和给专案组的信，后来集成《瓮中杂俎》一书。我读了这本书，读着读着，常常哈哈大笑。这位廖沫沙老兄，真正不愧为杂文高手，在老祖宗《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单身牢房”里被迫写作这类东西，他依然能挥洒自如，妙趣横生。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所想，诚诚恳恳讲事实，不忌讳、不躲闪，只是前前后后仿照“帮们”的办法，戴上大而无当的帽子，叫你忍不住发笑。我想套用流行的两句顺口溜：“实实在在作检讨，认认真真开玩笑。”即使“帮们”有足够的智商，看得出廖公是在跟他们开玩笑，而且简直是在耍他们，他们也抓不着他

的小辫子。他们不能再责骂他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因为他已经讲了足够的事实。这样的妙文奇文,实在值得公诸同好,“奇文共欣赏”。他在给专案组的信中而竟有这样的标题:《不怕遗臭万年吗》。一次思想汇报的标题为:《是不是包括我在内》。我实在忍不住想引一点内容,可惜都太长。现在我从《检查我的顽抗态度》中摘几句,这是1967年3月18日写的,前一天外面某个群众组织来人问话,他在这篇检查中写道:

在回答问题中,我说过:要讲实在话,我不熟悉×××这个人,如果叫我胡说八道,我是不干的;

我说过:我的罪行已经很大,再加上一条两条,也没有什么要紧;

我说过:你们这样逼供,什么问题也得不到答复;

我还说过:我已经罪恶滔天,再多添一些,也滔不到天外去;

我也说过:我是等人民来审判处死刑的,死吓不倒我。

…………

昨晚我想了半宵,可能还没有想通、想全,我想,我这种顽抗性主要是来源于封建主义反动思想的熏陶。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自视清高,傲慢跋扈,谁都碰不得、一触即跳、自己自尊,却不尊重别人,自己不能被别人碰,却不惜碰倒别人,这完全是剥削阶级自私自利唯我独尊的反动本性。

……

我准备从今以后,有人来问话或开斗争会、批判会,我试着改变这种态度。

1986年《廖沫沙文集》出版,他请黎澍、李锐和我三对夫妇在三家村酒楼吃饭,各送一套,四大本,我们很高兴;可惜曹瑛和于刚不在了。

我常常去看望他,或者在某些场合碰到。有一回,我和沈容去看他,在他家大门上看到一张字条,写着因病遵医嘱静养谢客。他说,你们不要管这一套,这是对付那些不相识的访客的,还有那些要稿子的人。你们是特别受欢迎的,欢迎你们常常来。不过我们觉得接待客人总是件费神的事,以后就去得少了。

有一天高集来电话,说沫沙感到很寂寞。那是1990年冬天,我马上就去看他。我刚进屋、刚脱下大衣坐下,他说:“我觉得再活下去没有意思了。”这使我吃惊,使我战栗,这不该是他廖沫沙说的话。他这句这样丧气的话使我非常难过,我首先想弄清楚他何以一至如此!我埋怨自己这一阵没有多来看看他,我多么想给他一些安慰,想听听他倾吐一些他的心事。但是不料他每一开口就被打断了,插话的人那天说话的欲望格外强烈,好像非要抢着发表意见不可。我多次努力企图改变这种局面,故意不搭理那些抢着发表的意见,故意把我的眼睛只看着廖公,同时想方设法给廖公创造说话的机会,再三再四向他提出这样那样的问题,我实在想听听他给我说点什么,结果都不成功。看来廖公也感觉到了这种尴尬,他闷声不响,显出无可奈何的神情。我无计可施,踌躇再三,只得怏怏告辞。他思维清楚、说话和动作一如往常,我不能理解他那种活够了的情绪从何而来,我认为那是极其不正常的,是完全应当避免而且完全能够避免的。可惜我不知道我能够为他做点什么,特别是那天以后我再没有努力往这方面去想、去探索、去试着做,这使我抱憾终天。至少可以肯定,他太孤寂。高集在电话里说得很对,沫沙觉得很寂寞。这对老年人是很不利的。换句话说,老年人更需要朋友交往,哪怕常常在电话里聊聊天都有好处。现在想到这一点,我只能深深责备自己,我对得起这位老大哥老朋友吗?太晚了!太晚了!太晚了!

那天他送我到他家大门口,突然紧紧地拥抱我,大出我意料之外,我回来告诉了沈容。他那样用力,而且那样有力,也令我惊异,因此那时我还没有什么不祥之感。何以我那么愚钝,那么冥顽不灵呢,我早该想到,他那样紧紧地拥抱我,明明是向我作最后的告别,不久以后他就去世了。他是在自己家里走的,只说了“不舒服”三个字,头一歪就走了。那么,他没有遭受什么肉体上的痛苦,唯有这一点我深感安慰,我要为他庆幸。　　(2000年12月21日改定,于北京)

谈独立思考

● 欧远方

泗县第一小学举办金秋书画展，要我题字，我赠送他们一个条幅，上书“独立思考”四字。这是有感而发。

前些年，某刊发表一篇湖南人访问胡耀邦的文章。当时胡耀邦已不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他的谈话中，除反思他个人解放后犯了两个错误外，还谈到党内长期以来强调集中强调纪律而不强调民主，形成党员中产生驯服工具思想和奴隶主义思想，缺少独立思考。联系我个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受奴隶主义影响很大。有时也有独立思考，如三反时为王维、杨琪华夫妇冤案上书区党委，不但未被采纳，反说我是思想老虎，受了处分。以后政治运动一个接一个，或因长期干的是省党报总编辑，作为省委机关报，是省委的喉舌，我不但身体力行奴隶主义，而且在报社向干部宣传“驯服工具论”。后来调到省委办公厅、宣传部等单位，对党委同样是驯服工具，组织叫干啥就干啥，多干实事，少发议论。我也曾佩服老部长陆学斌的善于独立思考，他因发表“人人争上游，上游就堵死了”的言论，被打成“右机”，下放劳动。我也曾佩服李凡夫在省委常委会上一再反对林彪的“顶峰论”，他说：“理论还要发展嘛”！但我自律严，言行从不敢越雷池一步，为此我也曾受过表彰，当过“模范党员”，长期不觉悟，直到“文革”结束，学习了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讲话，又经过“真理标准”讲座的启发，我才开窍。这时，想到毛主席曾说过：一事当前，要问个为什么，然后决定接受它或是拒绝它。又回想起陆学斌常说的遇事要“左思右想”，我的思想禁锢逐步解除。从这以后写文章、讲话，就有点独立思考了。重新学习马克思理论，又做过一些调查研究，似乎胆子也大了些。

我为什么要给一小学展览会题“独立思考”四字呢？这是我近年来接触教育界、体育界的干部引出的一个认识，必须提倡独立思考，而且还要提倡“个人奋斗”。

有许多文章比较中国和美国、日本等国教育上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学校重视注入式，美国等学校则重视启发式。中国课堂中“先生讲，学生听”，而美、日等国学校教师和学生间关系则是平等关系，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题，学生也可以向教师提问题。我上过一年私塾，私塾教学方法是死记硬背，《论语》、《孟子》要背全文，一字不拉，所以世界数理化奥林匹克比赛，中国学生获奖者多。但中国学生和教师的关系是猫鼠关系，创造性和独立性思考相对差一些，这从大中学校考试中可以看出。老师出选择题，有十个答案，尽管其中有三、四个答案都是正确的，但教师只认同其中一个，即所谓标准答案，比八股应制考试还厉害，这就把学生思想搞僵化了。

举个例子：有个小学老师考小学生：“雪化了变成什么？”多数学生回答：“雪化变成水。”标准答案也是“水”。有位学生回答：“雪化了变成了春天。”老师却说“错”。这一声“错”，无形中扼杀了儿童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其实，中国古代教育家、学者，对教育留下很多宝贵遗产，除孔子的“有教无类”、“三人行必有我师”等等之外，他还主张拜“巫医、乐

师、百工之人”为师。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所著《师说》有句名言：“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并依此引出“教学相长”之说，都是至理名言。当教师的总以为自己样样高于学生，事实上未必。当教师的假如能正确对待这个问题，就不至于在考试时出偏题、难题，难为学生，以至于学生把考试视为畏途。这种教学方法，学生只有死背硬记，导致思想僵化，除学到一些书本知识外，就很难有独立思考的余地，因而创造性也受到限制。

过去以“师道尊严”出名的日本，也改变了教育方法。学生考试不及格，可以回去重新温习功课，第二次再考，考的成绩好了也算数，这样学生就解除了压力。这种生动活泼的教育方式，既密切了师生关系，又培育了更多人才。

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中国学生在世界奥林匹克比赛中常常获奖，而中国学者却未能培养出诺贝尔奖金的获得者？为什么中国学者到了国外，获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却不在少数？这不能说人家都是偏见，这和中国教育只注重死记硬背书本而缺少独立思考有关系，这是不无道理的。

不仅学校教育如此，对干部教育也同样如此。我们所需要的干部，应是善于独立思考，敢于创造，甚至敢于冒险突破各种禁区。中国人是聪明的，自古以来发明创造很多很多。如古代四大发明震惊世界，都是独立思考的成果，也是个人奋斗的成果（有的不是一个人，但精神是一样的）。“独立思考”和“个人奋斗”相辅相成，后者创造发明更多。近百年来由于政治腐败而使发明创造受到压制，或有了发明创造而不能转化为生产力，也不能运用于社会发展。解放以后，中国人的创造发明更多，但后来多次打击人才的政治运动，加上我们高度集中的政治制度压抑了人们的创造性，当然一些尖端技术也难脱颖而出。假如给人们以更宽松的环境，发明创造将更多，对生产和社会的发展贡献也会更大。

就淮河流域来说，历史上的发明创造就不少，如哲学上的老、庄、管、孔、孟、墨、杨……这且不说。解放后安徽人为战胜水灾创造了连拱坝等五大水库（连拱坝设计者是水利专家汪胡桢）；开掘了淠史杭人工灌溉渠，其效益可以和都江堰媲美。农业“三改”也是一个创造，50年代开花，80、90年代结果，淮河两岸十个县旱田改种水稻已达600万亩以上。在科学技术上，安徽在一穷二白基础上创造出的半导体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可惜安徽未能形成生产力，而为外省引用，且走在前头。淮南市创造的光缆技术，得不到支持，而外省却很快超过我们。现在的光缆技术已在国内普及，对通讯效率的提高是十分巨大的。这证明安徽人善于独立思考，善于发明创造，但往往因得不到起码的支持，因此中途而废。这证明安徽人才并不缺，缺的是爱护使用。

至于安徽人才外流，说来话长。安徽落后，在华东地区不如其它省市。回顾50年代大胆招引人才，使用人才，不拘一格，正如龚自珍诗句所说，做到了“不拘一格降人才”，才使那时的安徽在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和技术方面，教育、医疗方面，都建立了基础和框架。但此后，历经政治运动，知识分子受到打击、压制加上安徽的封建气氛特浓，官本位思想也特厚，人才纷纷外流，许多公认的尖子人才，也遭到某些单位逼其外流，因而有“出生入死”之说，即离开安徽人家就重用，留在安徽却没有前途。知识分子耻于走后门、拉关系，而又好发议论，太重视“独立思考”，于是被某些领导人视为“不听话”，“不尊重组织”（其实是不尊重他个人），于是把这类人才晾在一边，形成自找出路的风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到外省去。”（原话是“爷去投八路”。这个顺口溜是抗战时在敌后讲的，此处借用。）事实就是如此荒唐，哪里是缺少人才技术啊！当然总体来说安徽人才、技术是弱的，问题在于让现有人才、技术运用起来。

政策放宽，营造一个宽松的环境，尊重人家的“独立思考”，人才就涌现了，技术也有了，发明创造也就多了。

出于上述情况，人们就形成了一个观点：应当重视“独立思考”。

（责任编辑　杜　晋）

大哉 晏子

● 邹人煜

晏子名婴，谥平仲，东莱人，曾为齐国三君（灵公、庄公、景公）之相。庄公时，开始晏子是很受重用的，后来晏子看透了庄公“强而无礼，好勇而恶贤，祸必及其身”。因而辞了职，退了封邑，他叹息“哀吾君不免于难”。后来庄公果然被崔杼所杀。晏子听了庄公凶讯后，立于崔杼之门。崔杼问他为什么不去死？晏子道：“祸始吾不在，吾何为死？”“遂枕尸而哭”。一般人都以为崔杼必杀他，崔杼却说道：“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不过崔杼还是要人服从，不服从的就当场杀死。连续杀了七人之后，又威胁晏子。晏子神色不变，终未屈服。后来史家称他：“不可以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庄公后景公即位，开始只让他做东阿宰相，三年而“毁者众”（说他坏话的人不少）。景公要罢他的官。晏子请让他再治东阿三年，景公同意了，结果赞誉交至。景公要赏赐他，他拒不受。景公问他为什么？他说治东阿的前三年，他认真治理了，得罪了不少人，所以他们来告状；后三年他放松了，说坏话的就少了。当初应当赏赐而没赏赐，如今应当受处罚反而要赏赐，“是故不敢受”。景公知晏子贤，任以国政，“三年而齐大兴”。

晏子之惜民

景公之时，有年霖雨不止，晏子请发粟于民。景公不听，在那里饮酒作乐。晏子很恼火，他先把自家的粮食分给灾民，然后去见景公道：“使民饥饿穷约而无告，使上淫湎失本而不恤，婴之罪大矣。”说罢就走，景公忙追到晏子家，看晏子将家用器具抛在路旁，已经离家出走了。景公又一路追去，追上晏子，说：“寡人有罪，夫子倍弃不援，寡人不足以约也，夫子不顾社稷百姓乎？”晏子这才回来。景公于是“损肉撤酒”，发救济粮。

景公爱槐，下令：“犯槐者刑，伤槐者死。”有一人不知此令而犯槐，景公便要判这个人的刑，此人的儿子将妹妹送给晏子做妾婢。晏子笑了：“婴其淫于色乎，虽然是必有故。”女子便告诉了原委，他当下将女子送回，去见景公说：“婴闻之，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者谓之暴，崇玩好威严拟乎君者谓之逆，刑杀不称者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也。”“君享国德行未见于众，而三辟（罪行）著于国，婴恐其不是可以莅（领导）国子民也。”景公听了说：“微大夫教寡人，几有大罪。”立命罢守槐之役，出犯槐之囚。

有几次，景公问晏子盛君之行和谋事必成之道。晏子答道：“薄于身而厚于民，约于身而广于世”，“谋度于义者必得，事因于民者必成”，“民，事之本也，故反义而谋，倍民（劳民）而动，未闻存者也。”又一次景公问晏子：“贤君之治国若何？”晏子答道：“其政任贤，其行爱民”，八个字即概括了治国之道。又一次，景公问晏子，今后什么人能把齐国治好？晏

子答道："服牛死，夫妇哭，非骨肉之亲也，为其利之大也，欲知把齐国者，则其利之者耶。"就是说凡事都要看它是否有利于齐民。接着他又批评了景公"厚藉敛于百姓"，物资藏朽了都不给饥民，因而老百姓离心离德。景公无言以对。正因为晏子惜民力民财，所以"百姓得以附亲"，齐国大治。

晏子之俭

晏子居相国之位，却尽量把俸禄散给亲戚朋友，"待其禄而衣食者五百余家，门客赖以举火者亦甚众。"他告诉为官者："廉者，政之本也。"

有一次景公随从到晏子家，看到晏子正在吃中饭，肉很少，回来向景公回报。景公即赐晏子一块封地，晏子辞而不受。他说："富而不骄者，未尝闻之，贫者不恨者婴是也，所以贫而不恨者，以若为师也。"安贫，是晏婴的生活原则。又一次，景公派使者到晏子家，他正在吃饭，立即分一份请使者吃。使者不饱，回来又向景公回报。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贫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过也。"于是让人以千金与市租，"使奉宾客"。"三致之"（送了三次），晏子不受，对景公道："婴之家不贫，以君之赐，泽覆三族，延及交游，以振百姓。君之赐也厚矣！夫厚取之君而施之于民，是臣代君、君（临）民者，忠臣不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于民，是为筐箧之藏也，仁人不为也。"他又说："夫十总之布，一豆之食，足于中，免矣。"（我有丝服穿，有一碗饭吃，就足够了）再辞不受。不久，景公又要赐晏子封邑，晏子说："臣闻之，有德益禄，无德退禄。"又辞不受。像这样辞封还有好几次，不仅辞封邑，就连其它赏赐他也很少接受。他住的房子在市中心，吵闹不说，还又潮又窄。景公要他换房子，他不肯。他说：近市可知民情。景公笑道："子近市，识贵贱乎？"晏子立即回答："踊贵而履贱。"踊：刖足者之履。从踊贵可以得知齐当时刑罚多而重。景公于是"愀然改容"，下令"省于刑"。不久晏子出使鲁国，景公趁他不在，把他邻居的房子拆了，让晏子住得好一些。晏子听了回来不进家，派人传话："大居逆邻归之心，臣不愿也。"（为他盖房子而损害邻居利益，晏子不干）景公不理，他又派人去说，不答应他就不进家。景公没法，只好让步，恢复了邻居的房子。

又一次，景公至晏子家饮酒，见到晏子的妻子，景公道："嘻，亦老而且恶矣！寡人有女少而姣，请以满夫子之宫。"晏子辞道："婴与之居故矣！故及其少而姣也。人固以壮乎托乎老，姣托乎恶，彼尝托而婴受之矣！君虽有赐，可以使婴倍其托乎？"（我与她已是老夫老妻了，她也有过年轻姣好的时候，她年轻时托给我，我已接受了，现在怎能抛弃她呢？）

晏子之无畏

庄公时，他就力谏庄公不可以勇力临天下。他对勇力作了这样的解释："轻死以行礼谓之勇，诛暴不避强谓之力，今上无仁义之礼，下无替罪诛暴之行，而徒以勇力立于世，则诸侯行之以国危。"庄公不听谏，果然不得善终。

到景公时，他的进谏就更多了。有一次，景公赏赐了无功之臣，遭到掌管财务的人三次拒绝，景公生气，下令罢免掌财务的人。晏子谏道："君正臣从谓之顺，君辟（错误）臣从谓之逆。今君赏谗谀之臣，而令吏必从，则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这番话说得景公大悟，于是罢赏。有个王子送景公十六匹好马，景公本来不感兴趣，但他的爱妾婴子很感兴趣，一定要景公陪她去观看骑马。景公对她说：等晏子不在时再去。正好这时晏子病了，景公忙带了婴子去观看。婴子很高兴，要景公重赏马夫。晏子听了，抱病去见景公说：现在正是荒年，饿死的人很多，而君不以此忧耻，唯图耳目之乐，不继承先君的功业，却热中于欣赏骑马技术，这样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能不亡国吗？景公立即把马送回，从此疏远了婴子。景公有一次出游，登高望齐，忽然泣下。说：要是死了岂不是丢下这美好的河山。从行的梁丘据等皆"从而泣"。

晏子“独笑于旁”，景公很不高兴，问他为什么笑？晏子说：倘若古人不死，姜太公这些人将有齐国，桓、襄、文、武都是宰相了。今天的你，将头戴斗笠，手执农具，蹲在田里锄草，没有闲心想到生死问题了。同日，景公的宠臣梁丘据骑马来见，还未进门，景公问：是谁？晏子说，必是梁丘据。景公问，你何以知道？晏子道：这样大热天，马跑得这么快，这马不死即伤，除了梁丘据，哪个敢？景公说：“据与我和也夫。”（很要好，很一致）晏子说：“此所谓同也，安得为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接着晏子解释：“君甘则臣酸，君淡则臣咸。今据也，君甘亦甘，所谓同也，安得为和？”这就是中国古话说的：“君子和而不同”，顺着领导讲话，投其所好，只能是佞臣。景公大不高兴。不一会儿，景公又见到彗星，认为不祥之兆，马上召人禳祭，除邪消灾。晏子认为这样做毫无益处，他说：“近谗好优，恶文而疏圣贤，虽去彗而无用。”这就是著名的一日三谏的故事。有一年冬天，雨雪三日不停，景公身穿白狐裘对晏子说道：“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说：“婴闻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今君不知也。”景公说：你讲得很对，听你的。于是脱去裘衣，开仓救济饥民。有一次景公问晏子：我想穿圣王的衣服，住圣王的宫殿，这样诸侯可以来朝吗？晏子不以为然，说：应在节俭上起带头作用，不能以服饰来号召诸侯。爱护老百姓，多做善事，天下就会被你的德行所感动，并从而取得信义。你专门在服饰、宫殿上讲究，用力甚多，用财甚费，与民为仇，恐国家危险了。这样还想取得诸侯的信任，太难太难了。景公听了，无言以对。景公叫鲁工做了一双鞋子，镶了金银珠玉，足有一尺多长，景公穿着上朝。晏子上朝，景公起来迎接，因鞋子太重，仅能勉强抬脚。晏子见此情景，对景公历数鲁工的罪行：鞋子太重又不合脚，不能起到应起的作用，鲁工不知寒温之节、轻重之宜，其罪一也；穿这样的怪鞋，招致诸侯耻笑，其罪二也；花了钱还不适用，招致老百姓埋怨，其罪三也。应捉起来问罪。景公说：鲁工生活也很苦，放了算了。景公换了鞋子，把鲁工送出境。景公幸臣梁丘据死了，景公要厚葬他，晏子不同意，说：臣子只忠于君个人，就是不忠，儿子只孝于父亲个人，就是不孝。君臣之间应有正常关系，要给老百姓以实惠，要对诸侯讲信用，这才叫忠。现在四封（全国境内）都是你的臣下，而唯有梁丘据爱君，爱你的人为什么这样少啊！四封之内的财富皆君所有，而只有梁丘据以他私财忠于君，忠你的人又何其少啊。梁丘据隔断了你和群臣的关系，太可怕了。景公听了，觉得有理，遂废厚葬之仪。

景公久病不愈，让两人去巡山川祭宗庙，病仍然不好。景公对晏子说，他想杀这两人以“取悦于上帝”。问：这样做行吗？晏子默然不答。景公又问他一次，晏子反问道：你以为这样做对你有益吗？景公说对。晏子道：“若以为有益则诅亦有损也，百姓之咎怨诽谤，诅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国诅，两人祝，虽善视者不能胜也。”对无罪的人加刑，“夏商所以灭也”。景公曰：“善解予惑。”下令不杀两人。

晏子的座右铭是：“独立不惭于影，独寝不惭于魂。”他的一生，完全是按这个座右铭行事的。同时代的孔子、墨子对他都极尊崇，孔子称他：“救民之生而不夸，行补三君而不有，虽事惰君，能使垂衣裳朝诸侯。”墨子称他：“为人者重，自为者轻，先民而后身，薄身而厚民。”司马迁也极尊敬晏子，他说：“假令晏子而在，余虽为之执鞭，所忻慕焉。”

晏子逝世时，景公正出游在外，听到凶讯兼程赶回，“伏尸而号”曰：“大夫日夜责寡人，不遗尺寸，寡人犹且淫佚而不收，怨罪重积于百姓，今天降祸于齐，不加寡人而加于夫子，齐国社稷危矣，百姓将谁告夫！”

晏子逝世后十几年，齐景公对他还怀念不已，叹息道：“呜呼！昔者从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责我，今谁责寡人哉？”

（本文作者是《安徽老年报》总编）

（责任编辑　赵友慈）

先天下忧的龚自珍

● 靳树鹏

恩格斯说:“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以大人物为标志的。”中国从“封建的的中世纪的终结”过渡到“近代” 资本主义的开端,虽比欧洲晚了几个世纪,但在我们自己的“过渡”时期中,也出现了一个大人物,他就是诞生于1792年的龚自珍。

龚自珍在思想上开一代风气,从19世纪到20世纪,论者不绝。有人说:“近数年士大夫诵史鉴,考掌故,慷慨论天下事,其风气实定公开之。”胡适对龚自珍的评价是:“但开风气不为师,龚生此言吾最喜。”柳亚子云:“记取定公名论在,但开风气尽堪豪。”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文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热,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1932年《大公报》刊发张荫麟撰《龚自珍诞生百四十年纪念》一文,文中说“彼固一‘先天下忧’之志士:上下古今,讨究经国纬民之大计,效痛哭流涕之贾生,以开创风气为己任。”30年代苏渊雷教授就撰文说:“清末民初是一个大转变的时代,士人激昂慷慨,好谈天下事,飞扬跋扈,正是他们人生的极致;……一时稍解吟咏或奔走国事的青年,多少带点定庵的气息。大抵改革时代,最需要一种反抗的精神和奔放的热情。”

一百多年来论龚自珍才高者更是不胜枚举。梁章钜说他“抱负恢奇,才笔横恣,不为家学所囿”。叶德辉说他“旷代逸才,负经营世宙之略”。有人说他“空绝一世”,有人说他“绝世奇才”。魏源评其文说:“实不见天下有二原之水,二本之木。”林则徐赴广东禁烟途中读其惠赠大作后致信说:“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谭嗣同有名句“汪魏龚王始是才”。(汪指汪中,魏指魏源,王指王闿运)

章太炎是贬龚的。他写道:“……自珍之文贵于世,而文学涂地垂尽,将汉种灭亡之妖邪?”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章太炎之论甚不以为然。他说,章太炎“于后生崇信之龚自珍,极口诋排,致以为汉种灭亡之妖焉。世或以为不允也”。

龚自珍在思想文化上开一代风气是多方面的,如对君主专制从根本上发生了怀疑,主变的改革观,人性无善恶论,尊史的历史意识,尊情的艺术主张,解放个性等等。龚自珍何以会有兴王思想呢?这就要说到他的衰世说。我们古人有三世说,即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之三世说为治世、乱世、衰世。他是这样描述衰世的:

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声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这实际上是龚自珍所观察的晚清景象:文章史籍、法律规章、礼仪制度、等级名分等等,一切都像模像样,嬉戏游乐、歌舞升平,也颇像盛世。以至黑白混杂,音律混乱,道路荒芜,田

畴毁坏,人们也觉得是盛世的样子。人心浑浑噩噩,不会出言犯忌,也好像是“天下有道庶人不议”。只是才相、才史、才将、才士、才民、才工、才商越来越少,市场上连个合格的经纪人也难找到,胆大艺高的小偷和强盗都少见。更可怕的是才士与才民被“督之缚之,以至于戮之”,“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如果世上的人们忧国忧民,敢恨敢爱,向上向善的心都荡然无存,没有生机,没有生气,没有不同的声音,“万马齐喑”,这样一个社会还不是衰世吗?结果是“乱亦竟不远矣”,乱世即将到来。

龚自珍的兴王思想,主要在他年轻时所写《尊隐》一文中,是以隐蔽的写法写出他的改朝换代思想。文中以“京师”和“山中”相对,“京师”代表本朝统治力量,“山中”是反抗力量。王朝初建类似早晨,“京师”强盛,后来类似中午已至稍逊,到了黄昏之际,君子就不到“京师”去了,“京师”只能任用些丑类和不才,于是“京师”之气泄,“山中”之气盛。最后是“山中之民有大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造反之新王将横空出世,锐不可挡。

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
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人才踞上游,
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
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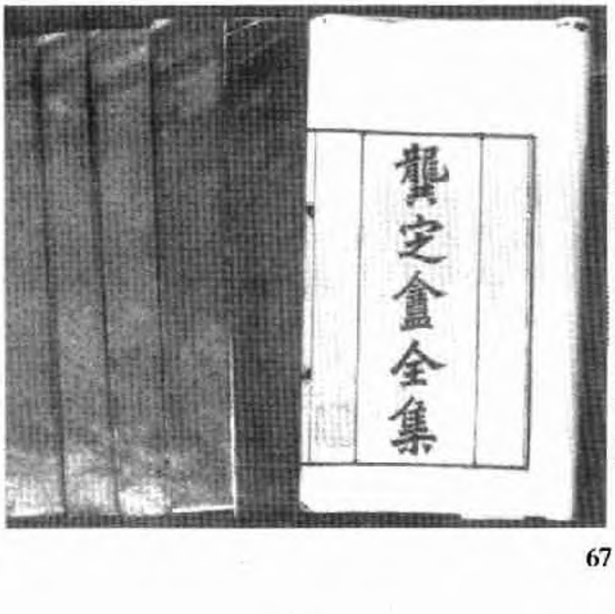
有人说龚自珍这首有名的七律《咏史》是讽刺当时卑颜屈膝的文化名人的,实则这首诗是从朝廷与文化名人关系的视角说衰世。牢盆狎客何以能操全算,团扇人才何以能踞上游,文化名人何以惧怕文字狱?世道使然,此世道自然是统治者所营造。文化名人甘受朝廷摆布、玩弄者,可以作高官发大财,稍有逆意即遭文字狱,一些违心著述者也不过为了混口饭吃。龚自珍对文化名流等景况极为愤慨。后两句是说反抗朝廷的人不要停止反抗。此诗主题仍是衰世与兴王。

龚自珍诗云:“五十年中言定验”。他预言鸦片战争要失败,在他死前即验证。他死后十年,太平军起于广西,初始之势真如“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不久建都南京,只是这个山中之王洪秀全不怎么样。又过半个世纪,清王朝覆灭,但孙中山不是再建一个新王朝而是要建立民主共和国,这已超出龚自珍的预料了。

龚自珍生于闭关锁国的清王朝,他的思想不可能先进,他对产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世界、马克思主义及科学、民主、议会、选举等茫然不知。今人十分重视的是他论世之深刻,欣赏的是他开创了大胆建议大胆批评的风气,是思想解放的先锋。龚自珍自知“书生挟策成何济”,仍然“狂言重起廿年喑”,批判锋芒所向广而深,诚如王芑孙说:“上关朝廷,下及冠盖,口不择言,动与世忤。”清王朝是禁止“楚上横议”的,毕竟已到衰世,经过龚自珍开创,又经过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已是禁不胜禁,许多人为国事奔走呼号,民间报章亦多刊行,才有了维新和革命。

龚自珍是经学家、历史家、地理家、散文家、诗人和词人,最重要的是思想家。任何思想家都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对所处时代有精深透辟的认识,能言人所未言。在思想文化上开一代风气,无论就世界说还是就一国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比单纯的一场大战争的胜利,一个新王朝的诞生,一个新政权的建立,都更重要。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龚自珍的著作《龚定盦全集》

昭君"怨"吗?

● 王宏志

车出呼和浩特市，向南行驶，约走十来公里，来到大青山脚下、黑河之滨。在一片平坦的土地上，远远耸立着一座高大的土丘。陪伴的主人指着它告诉我们，那就是真正的昭君墓了。我的老师翦伯赞在《内蒙访古》中说，昭君墓在大青山南麓有十几座，翦老那次的内蒙古之行就看到了两座，一座是我们在这里参观的墓，另一座在包头的黄河南岸。黄河南岸的一座墓，是否昭君墓，信者不多。

呼市昭君墓高约三十多米，占地有五十多亩，坐北朝南，用黄土夯筑而成，形状和汉代帝王墓近似，只是规模小多了。

有关昭君墓位置的记载，唐史学家杜佑的《通典》说，金河县有昭君墓。那时的金河，就是现在的黑河。金河县就在今天的呼和浩特市以南。《太平寰宇记》说，"青冢在县西北，汉王昭君葬于此"。《辽史·地理志》中，却说丰州有"青冢即王昭君墓"。丰州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无论是史书，还是历代诗文，都指昭君墓为青冢。

我们站在最高的平台上，听说起当年的景况：墓前一定建有亮丽的琉璃瓦殿堂，周围栽种了高大翠绿的树木；宽阔的墓道两旁，笔直地排列着颇有气魄的成对石雕；每到昭君的祭日，百姓捧着绸布、豆、麦，纷纷从四面八方前来祭祀。而今这个亭子已经重建，琉璃瓦的尖顶，在日光下，闪闪发亮。新中国成立以后，青冢才逐步被重新梳妆打扮起来，成为今天这个样子。无论这里是不是真正的昭君墓，但在众多的昭君墓中，这里称得上是最久远、最知名的了。

"单于和亲""千秋万岁"

昭君墓的两侧陈列室内，展出有关昭君的出土文物和历史文献资料，引人注目的是石碑数块，碑上刻着："汉明妃之墓"、"汉明妃冢"、"昭君青冢"、"塞外流芳"、"嬬夫愧色"等，还有颂扬她的诗文。同行的人问起"明妃"称呼的来历。主人说这是来自晋朝，因为晋武帝名司马昭，为避讳"昭"字，故改称"明妃"或"明君"。大约因"明君"有歧义，所以后世人一般都称她为"明妃"。

从高祖到景帝，汉朝和匈奴一直奉行和亲政策。到武帝时，因边境冲突，和亲关系中断，处于旷日持久的战争状态。至西汉后期，无论是汉朝，还是匈奴，都没有精力再打下去，而且匈奴已处于内乱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匈奴的呼韩邪单于主动与汉和好，表示愿归附，入朝晋见宣帝。宣帝自然十分高兴。

当年汉朝隆重欢迎呼韩邪单于的到来：朝廷派专使到塞外迎接；入塞后，所过郡县，均以两千骑迎送；到长安，宣帝接见于甘泉宫，颁给金制的"匈奴单于玺"，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还赠送给他很多衣饰和珍贵物品。后来，呼韩邪单于又两次入朝，其间还与汉使订立盟约，相约："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勿得相诈相攻"。

呼韩邪单于第三次来长安，已是汉元帝时期了。《汉书·匈奴传》里说他这次提出和亲请求，“单于自言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樯（嫱）字昭君赐单于。”并发布诏书说：“虖（呼）韩邪单于……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竟宁，赐单于待诏王樯（嫱）为阏氏。”王嫱是王昭君的名，昭君是她的字。“待诏”是在后宫待命供奉的人。

从诏书不难看出，元帝对昭君出塞不仅十分重视，而且寄予希望。因此，将当年（公元33年）的年号“建昭”，改为“竟宁”，希望从此边境安宁。为和亲而改元，这是西汉历史上独有的一次。而且，《后汉书·匈奴传》还叙述昭君和单于临行前，元帝隆重设大宴送行，就是在这次宴会上，元帝才第一次见到昭君，并为她的美丽容貌所震惊。

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皇宫里管理宫女的官）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大约是包括陪伴的侍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徘徊），竦动（惊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于匈奴。

元帝发现昭君国色天香，的确想留下她来，但大国的君主，不好将已经答应的事反悔，只得让昭君随呼韩邪单于走了。

从匈奴方面看，对此事也非常重视。《汉书·匈奴传》中说：“昭君赐单于，单于驩（欢）喜，上书愿保塞上谷以西至敦煌，传之无穷。”又封昭君为“宁胡阏氏”。“阏氏”是对单于妻子的尊称，“宁胡”，是企盼她的到来，会给匈奴汗国带来安宁。

昭君出塞后，呼韩邪单于对汉朝一直友好。他死后，按照匈奴的风俗，昭君又嫁给后继的单于，后继的单于仍对汉友好，也曾亲自去长安，朝见汉朝皇帝。昭君的女儿、女婿、外孙，多次以匈奴使节的身份，来到汉朝，促进两个民族友好关系的发展。昭君的两个侄儿，又多次任汉朝前往匈奴的使节，一直到东汉初年，为汉匈友好也作出了贡献。

那时汉朝的北方，“边城晏（晚）闭，牛马布野，三世无吠之警，黎庶无干戈之役。”“昭君出塞”使汉匈边境飘起和平生活的炊烟，长达50年之久。

昭君“无怨”还是有“怨”？

东汉末年文学家蔡邕的《琴操》一书，谈到《昭君怨》这支歌曲的来历。他说：“昭君“本齐国王穰女，端正闲丽，未尝窥看门户。穰以其有异，人求之不与（前来求婚的都没有答应）。年十七，进之（进宫）。帝以地远不幸。欲赐单于美人。嫱对使者，越席请往，后不愿妻其子，吞药而卒。”按此说，昭君应当是怨“匈奴父子妻其妻”的风俗。但书里又提到，“昭君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后人名为《昭君怨》。”这里所说昭君恨的“帝”，是指汉元帝，自然《昭君怨》中所怨的也是汉元帝。这首曲从“秋木凄凄，其叶萎黄”开始，直至“呜呼哀哉，忧心恻伤”，整个曲词悲切、忧伤、低沉。

《琴操》对这件事的记载和歌曲《昭君怨》，是属野史，而真实可信的两汉史书都记载了昭君在呼韩邪单于死后，曾“上书求归”，汉成帝令她“从胡俗”。于是，昭君又改嫁后继的单于，还生了两个女儿。后继的单于是呼韩邪单于与匈奴妻的儿子。

继《琴操》以后，东晋葛洪著《西京杂记》，对此事的叙述又多了一个枝节，就是把画师毛延寿拉了进来，说他是造成昭君出塞的元凶。书中说：

汉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令画工图其形，按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不减五万；唯王嫱不肯，遂不得召。后匈奴求美人为阏氏，上按图召昭君行。及去召见貌美，帝悔之，而业已定，重信于外国，不复更人，乃穷按（追究查办）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杜陵（今陕西西安市东南）毛延寿……同日弃市。

一些文学家认为这一记载不是事实，冤枉了毛延寿。宋朝王安石的诗里，就有“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句子。今天看到的有关昭君的最早作品《王明君辞》，是西晋诗人石崇写的。他在辞中想象昭君出塞，像汉朝

嫁到乌孙国的公主一样,也是抱着琵琶,一路奏着自编的哀怨曲子。唐朝关于昭君离开长安时启程的情景:“昭君拂玉鞍,上马啼红颊”,写她在塞外的境遇悲惨:“燕支长寒雪作花,蛾眉憔悴没胡沙”。杜甫的诗里描述昭君,“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因而怨恨元帝,就连死后弹琵琶也诉说着对汉朝君王的怨恨。白居易笔下的青冢竟然是:“唯有阴怨气,时生坟左右”,“不见青冢上,行人为浇酒”。这些诗虽有艺术性,但都是将昭君作为元帝和画工的牺牲品。为什么文人笔下的昭君怨气十足呢?除了一些文人借昭君出塞发泄个人的情感外,我认为还是儒家的传统观念在作祟。依他们的想法,像昭君这样的美貌女子,只能给天朝大汉的皇帝作妃嫔,决不能嫁给没有中土文化的塞外单于。这种观念反映到宋元明清的文人身上,就更加强烈。他们的诗词里,竟让昭君在去塞外的途中就自尽于汉朝的边疆,不让她进入匈奴人生活的土地,似乎这样才能保住大汉的尊严。这大约是程朱理学的影响。

元代著名剧作家马致远,步宋元诗人的后尘,把昭君以悲剧人物搬上戏剧舞台。他的《汉宫秋》,是最早以昭君出塞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在剧中,呼韩邪单于变成了粗暴的强敌,以势压迫汉朝和亲;汉元帝是个多情而又屈服于强敌的懦弱君王,但还让他充当正面人物;昭君成了受害委屈、又忠于皇帝的烈女,甚至还让她自然的灵魂,飞回汉宫去慰藉元帝。这个剧本竟把一桩民族和好的喜事,演成了民族仇恨、民族屈辱的悲剧。后来的剧作家,也都沿着这条思路写了下去。戏剧的感染力是巨大的,原本无怨的昭君,在人们心目中却变成了:骑在马上的一个弱女子,满面泪痕,抱着琵琶,弹奏着哀怨之志,被迫来到塞外。似乎这就是“昭君出塞”的永恒形象。

“昭君自有千秋在”

当然,一反昭君哀怨形象的文学作品,历史上并不是没有,但被人们忽略了。像唐朝诗人张仲素的五言诗《王昭君》,就不同凡响:

仙娥今下嫁,骄子自同和。
剑戟归田尽,牛羊绕塞多。

诗中的仙娥是指昭君,骄子是指呼韩邪单于。他们和睦相处,给汉匈边塞的两族人民带来了和平与繁荣景象。还有,元朝诗人张翥的《昭君怨》,也是赞扬昭君出塞的:

队队毡车细马,簇拥瘀氏如画。却胜汉宫人,闭长门。

看取娥眉妒宠,身后谁家遗冢!千载草青青,有芳名。

在张翥的笔下,昭君出塞的行程,不是悲悲切切的,而是一幅行进中的美丽图画。他还将可以呼吸到自由空气的昭君,与常年关闭在汉宫、相互争宠的嫔妃相比,前者的生活自然强多了。何况。那些后宫女子死后无声无息,怎么可以像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昭君那样,芳名永继,青冢千载呢!

这两位诗人的名气虽然不大,但他们能在一千多年或六七百年前,摒弃儒家的世俗观念,赞扬以和亲方式解决民族纠纷、加强民族友好,换取百姓生活的安定、富裕,赞扬人性的自由和生存价值,写出和美的草原诗,当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历史推进到20世纪60年代,首先是翦伯赞写了为西汉和亲、昭君出塞正名的文章《从西汉的和亲政策说到昭君出塞》,而后是郭沫若等史学家的赞同,邓拓的《燕山夜话》里也说《昭君无怨》;到70年代末,剧作家曹禺又编出了话剧《王昭君》。这些新作开启了人们的视野。现代人歌咏昭君的文章、诗词越来越多,自然不会再是哀怨的了。我认为最富有新意的是董必武和翦伯赞的作品。董老的题诗《谒昭君墓》,镌刻在昭君墓第一层平台正中的巨大石碑上,用蒙文、汉文写着:

昭君自有千秋在,胡汉和亲识见高;
词客各摅胸臆懑,舞文弄墨总徒劳。

前两句对和亲的历史功绩给以高度的评价,后两句是指责历代文人哀叹昭君命运的偏狭议论。

翦伯赞的《题昭君墓》,共六首,在描述昭君出塞的情景时,写出了昭君的英气:“莫道蛾

眉无志气,不将颜色媚君王。”这同历代文人“千首哀词万首诗,同声歌哭说妍媸”完全相反。六首中最令我耳目一新的是:

汉武雄图载史篇,长城万里遍烽烟;

何如一曲琵琶好,鸣镝无声五十年。

翦老在诗中不仅指责武帝从帝王大业的一己私利,拓土开边,造成战火连绵;而且歌颂昭君出塞和亲,给百姓带来了50年和平。

内蒙古还流传着不少有关王昭君的神话传说,说她本是天上的仙女,受玉帝委派,下凡来平息汉匈干戈。匈奴单于从漠北来迎接她,他们骑马一同来到黑水边,只见朔风怒吼,漫天风雪。昭君立即下马弹起了琵琶,顿时风停雪止,彩霞满天,万物复苏,阴山变绿,黑水澄清,在阳光下,闪着金光,百鸟在他们头上翱翔。单于兴奋极了,马上决定在这儿居住下来。自此阴山改名为大青山,黑水改名为金河。后来他们走过的地方,那里的水草就变得丰美,人畜两旺。许多年过去了,一天夜里,天上闪过一片红光,接着一声巨响,第二天清晨,人们发现金河南岸多了一座土山,山上草色深青,山顶上飘着五色浮云。老人们说,昭君完成使命,回到天上去了。人们就把她的身体埋在了这座青山里。多少年来,昭君已成为美好的象征,青冢也愈来愈诱人,以致人们都希望这位远嫁的姑娘,埋葬在自己的家乡,给他们带来好运与安宁。这样,随着岁月的流逝,在大青山南麓,就有了十几座昭君青冢。

(责任编辑 刘 文)

代 购 代 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羡林、李锐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季羡林人生漫笔	季羡林	21.00	3.00
牛棚杂忆	季羡林	19.50	3.00
斯大林秘闻——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爱德华·拉津斯基	39.00	4.00
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	师 哲	32.00	4.00
九死一生:我的“右派”历程	戴 煌	21.00	3.00
李锐其人	宋晓梦	28.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辉	25.00	4.00
现代中国政治思想流派	陈哲夫 江荣海 谢庆奎 张日华	75.00	5.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第一个平反的右派——温济泽自述	温济泽	22.80	4.00
海丝	杜明明	28.00	4.00
红墙回忆	纪 学	48.00	5.00
知情者说 第二辑 (共八册) (邮购全套八册邮费 12.00 元)			
之一	肖思科	15.70	3.00
之二	张树德	13.90	3.00
之三	魏敬民 徐 林	15.10	3.00
之四	程 瑾 朱 仁	14.50	3.00
之五	万 须 木 心	13.90	3.00
之六	山 椿	15.10	3.00
之七	庄 园 郑宏颖	14.50	3.00
之八	范广群 霍 岩	13.90	3.00

《知情者说》是介于历史与纪实文学之间的作品。它的特点是少有文学作品的虚构成份而追求材料的真实可靠和鲜人为知、具有极强的可读性。第二辑收入了共和国历史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领域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实录,并配以珍贵的历史照片。

《直言——李锐六十年反思》这是当年毛泽东的兼职秘书,现今毛泽东研究专家李锐的扛鼎之作。书中记叙了他在延安抢救运动中的遭遇;大跃进期间三次上书的命运;亲历庐山会议与《庐山会议实录》的成书;“文革”秦城铁窗酝酿《龙胆紫集》,祭忆了在心中永生的挚友。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 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 100007
收款人: 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蹈海亦英雄的陈天华

● 骆驼刺

1905 年 12 月 8 日，湖南青年陈天华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蹈海自杀。他的死是在悲悼一个民族精神的衰亡。他的死是要他的同胞、要我们这个民族在人格上站起来。他死了，但他是用他的生命为民族的新生催生。他的死也给中华民族留下了一个永久的历史问号。

在 20 世纪初中国历史的转折点上，湖南曾产生了不少杰出的人物，他们的生命都非常短暂，却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几个人中，谭嗣同（33 岁）1898 年被慈禧太后砍头，宋教仁（32 岁）1913 年被袁世凯暗杀，黄兴（42 岁）、蔡锷（34 岁）则于 1916 年相继病死，唯有陈天华是自杀。

陈天华只活了 31 岁，重读他留下的《绝命辞》，我禁不住热泪交错，陈天华用生命所追求的一切真的实现了吗？我们这个民族真的在人格上站起来了吗？

陈天华，1875 年生于湖南新化，1903 年赴日留学。他每读中外历史，"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他痛感民族危亡，写下了《猛回头》、《警世钟》这两本激动人心的小册子，以激越的爱国热情赢得了广泛的同情和影响。1904 年，俄国瓜分东三省，朝野束手无策，陈天华咬破手指，写了几十幅血书，寄到国内各学堂，"闻者莫不悲愤"。同年，他与黄兴、蔡锷等成立了"军国民教育会"。年底回国和黄兴、宋教仁等创立"华兴会"，起义失败后，不得不返回日本，又与宋教仁等一起创办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1905 年春盛传各国要瓜分中国，他提议由留学生全体选派代表回国，向清政府请愿，立即颁布立宪，以救危亡。同时决定单身赴京，不惜一死，被同学极力劝阻。

1905 年 7 月下旬孙中山来到日本，约陈天华、宋教仁等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面商谈革命力量的联合问题。陈天华首先赞成与孙中山联合，黄兴则主张形式上联合、精神上保存华兴会。陈天华还写了一篇热情洋溢的《记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陈天华跳起来大叫："中山先生是吾四万万人之代表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也！"他的态度对推动华兴会与孙中山联合成立同盟会无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同盟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与宋教仁、马君武等一同起草章程、文告，其中《革命方略》就是他写的。

由黄兴提议将《二十世纪之支那》作为同盟会机关报，主要由陈天华编辑。在 11 月出版的第一期上他一人就发表了 5 篇文章，几乎占《民报》创刊号的一半内容，影响很大。

他的《论中国宜改创民主政体》，驳斥了中国不可以言民权、不可以言民主的论调，鲜明地

指出“欲救中国,惟有兴民权,改民主”。

在《中国革命史论》里,他认为革命已经不是“汤武革命”或朱元璋、刘邦式的革命,而是要在“革命之后,宣布自由,设立共和”。

他在《绝命辞》中也说自己“重政治而轻民族”。说革命“不可有丝毫取巧之心”,革命有出于责任心,也有出于功利心,出于功利心的“己力不足,或至借他力,非内用会党,则外恃外资”,他显然是出于责任心才主张革命。

从后来辛亥革命的结局我们惊讶地发现陈天华的先见之明。他强调启蒙的重要性,在民智未开、人民普遍只知道有皇帝、而不知民主共和为何物的情况下,仅仅利用人民普遍的反满情绪实行革命,即使把满清王朝推翻了,得到的也只能是一个更混乱的中国。

陈天华主张民主、民权救中国,他的《狮子吼》以小说的形式,通过一个梦描绘了他心中的民主共和国:

他走到一处,看见“共和国图书馆”的牌子,里面有几十万册的书,其中“有一巨册金字标题《共和国年鉴》,列举了全国有 30 多万所大小学堂、6000 多万男女学生;陆军、海军,军舰、潜艇、空中战艇等;铁路,邮局,轮船,等”。然后他虚构了当年抗清基地舟山群岛上的一个民权村,塑造了留学回来的老师文明种以及他的学生孙念祖等人物。借文明种之口,他说“国民教育”就是:“倘若做皇帝的,做官府的,实于国家不利,做百姓的即要行那国民的权利,把那皇帝官府杀了。另建一个好好的政府,这才算尽了国民的责任。”

他借孙念祖提倡自治阐述了自己对自由的看法:“‘自由’二字,是有界限的,没有界限,即是罪恶,如今的人醉心自由,说一有服从性质,即是奴隶了,不知势力是不可服从的,法律是一定要服从的,法律也不服从,社会上必定受他扰害,又何能救国家呢?”因此要立一个自治会和章程,“大家遵守自己所立的法律,他日方能担当国家的大事”。他说民智不开,有千百个华盛顿、拿破仑也办不出一点事,所以他要在内地办一种新报,开通风气。

1905 年 8 月同盟会在日本成立,11 月《民报》创刊。清政府为了扼杀海外革命活动,请求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日学生中的革命党人。日本政府 11 月颁布了有关取缔中国留学生的规则,8000 多中国留学生奋起抗议,罢课、罢学,准备回国。当时中国留学生总会的负责人却不想负起责任。他因此愤而蹈海。希望以他的死使同胞“有所警动,去绝非行,共讲爱国,更卧薪尝胆,刻苦求学”。希望留日学生总会的干事负起责任来。他在自杀前给他们的信中说:“闻诸君有欲辞职者,不解所谓。事实已如此,诸君不力为维持,徒引身而退,不重辱留学界耶?”

他在《绝命辞》里指出日本报纸污蔑中国留学生“放纵卑劣”,如果留学生真的都是“放纵卑劣,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20 世纪之后有放纵卑劣之人种,能存于世乎?”他为此提出作为这四个字反面的“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之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如果有人念及他,则勿忘他今日的话。他说自己不是为取缔规则问题而死的。要求他死后“取缔规则问题可了则了,切勿固执”。只是希望大家能振作起来,不要被日本报纸言中了。则他“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梁启超评论陈天华之死时说:“君既已一死欲易天下,则后死者益崇拜之而思竟其志,亦义所宜然。”陈天华终身未娶,有人曾劝他,他回答:“匈奴未灭,何以为家!”

陈天华蹈海后,留日学生公祭时,由黄兴宣读他的绝命书,“听者数千百人,皆泣下不能抑。”随后,不少人愤而回国(秋瑾等就是那一次回来组织武装起义的)。他的死在国内也引起巨大震动。香港举行追悼会,有千余人参加。1906 年 5 月 23 日,他的灵柩从日本归葬于故乡湖南长沙的岳麓山,送葬队伍万余人,绵延十里,“全城学生制服行丧礼,万人整队送之山陵”,岳麓山上缟素一片。

20 世纪终于走到了尽头,陈天华的墓和黄兴、蔡锷的墓一起,历尽一个世纪的风云沧桑之后,依然在岳麓山上静静地注视着湘江水,注视着中华大地和这片大地上的人民。魂兮归来,陈天华!

(责任编辑 刘 文)

民初著名报人邵飘萍为何被杀

● 傅国涌

30年代，毛泽东在陕北的窑洞里，回忆当年在北京大学时的情景，曾动情地谈起邵飘萍。他对斯诺说："特别是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的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秀品质的人。1926年，他被张作霖杀害了。"

张作霖为什么要杀邵飘萍？这得从邵一生作为独立报人说起

新闻救国

邵飘萍（1888——1926），原名振青，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在金华长大，14岁考中秀才，1903年进省立第七中学，1906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1909年邵飘萍大学毕业回到金华，在母校教历史、国文。他除教书外，还为上海的报纸写通讯。他酷爱新闻事业，对报业怀有特殊感情，有"新闻救国"之志。

1911年，辛亥革命后杭州光复，杭辛斋受命筹办《汉民日报》，聘邵为主笔。他从此进入新闻界，开始了15年的报业生涯。1912年春，杭被选为众议院议员，将《汉民日报》交邵飘萍主持。他对时局有惊人的洞察力，对袁世凯有入木三分的认识。他在1912年1月写的时评指出："帝王思想误尽袁贼一生。议和，停战，退位，迁廷，皆袁贼帝王思想之作用耳。清帝退位，袁贼乃以为达操莽之目的，故南北分立之说，今已隐有所闻矣！……袁贼不死，大乱不止。"

1913年8月10日，浙江当局以"扰害治安罪"及"二次革命"嫌疑罪，查封《汉民日报》馆，逮捕邵飘萍。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

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

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

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

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发表了社论 36 篇、时评 134 篇。

1916 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在短短两年间，他为《申报》写了 200 多篇 22 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

邵飘萍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 19 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极高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 5 年 7 月，邵振青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京报》：“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

1918 年 10 月 5 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京报》。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提出了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人手。权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邵飘萍从此走上一条自资独立办报的道路。其言论既不受外国通讯社左右，又不受军阀操纵，开创了 20 世纪中国独立的新闻事业。他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取自明朝因反对奸臣严嵩被残杀的杨椒山的诗句“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将“妙”字改成“辣”字）悬于报社墙上，勉励同人。到 1919 年 5 月，全国好多地方（山东、河北、河南、山西、浙江、东三省等）都设立了《京报》代派处，成为一张全国性的大报。

新闻研究会：一份令人吃惊的学员名单

1918 年 10 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会，蔡元培聘他为导师，这是中国新闻教育的开端。他工作繁忙，但坚持每周上二小时的课。他提出记者要“主持公道，不怕牺牲”，品性完全独立，有操守人格，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泰山崩于前，麋鹿兴于左而志不乱”。他强调记者要“探究事实不欺阅者”，还讲授了大量新闻学的基本知识，指导创办了《新闻周刊》。

1919 年 10 月，得到一年结业证书的有 23 人，得到半年结业证书的有 32 人。名单中有不少是中共最早的领袖人物，如毛泽东、高君宇、谭平山、陈公博、罗章龙、杨晦、谭植棠等。55 人中有些人终身从事新闻事业，是中国新闻界的

邵飘萍

中坚。

毛泽东当年曾多次拜访邵飘萍，并得到慷慨资助。在新闻研究会学习的半年,恐怕是毛泽东在北大期间获益最大的。所以北京一别虽再无见面的机缘，但毛泽东终生不忘邵飘萍。1949年后,他不承认是胡适的学生,说胡吹牛。又说自己是邵飘萍的学生。直到去世前二年，已过八旬的毛泽东还提到了邵飘萍。

“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1919年8月,因《京报》屡屡发表揭露、批评政府的文章,被查封,邵飘萍遭到全国通缉,被迫第二次亡命日本。

1920年曹锟、吴佩孚上台,他才回国。9月17日,《京报》复刊。他办报既重视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内容,关注国家命运、人民疾苦,也依靠社会力量,办了好多种副刊,形式多样,丰富多彩。在《京报》的周围既有鲁迅、钱玄同、孙伏园、黎锦熙等大学者,也有张友鸾、焦菊隐等当时还没有名气的青年人,可谓人才济济。他始终坚持新闻自由的理想,继续《京报》的办报宗旨，独立表达公正的舆论,“勉力造成全国人发表言论之机关”。

他支持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推倒曹、吴;力助郭松龄倒戈反张(作霖);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段祺瑞,拒绝“善后会议顾问”的聘请;他强烈谴责“三·一八”惨案屠杀学生、民众的滔天罪行,发表了一系列详细报道和出版《首都大流血写真》特刊;他极力欢迎孙中山北上,称他为“贫贱不移,威武不屈,失败不馁,成功不居之中山先生”。邵飘萍这些态度对社会舆论产生了巨大影响。难怪冯玉祥说:“飘萍一支笔,胜抵十万军”。

邵飘萍之死的直接起因,是他促成了郭松龄1925年11月24日东北军倒戈的滦州事变和郭、冯(玉祥)联合。他在《京报》发表了大量支持他们的新闻、评论。12月7日,他出了一大张二整版的《京报特刊》,全是最近时局重要人物的照片,每个人物后面都有邵飘萍的评语。如:“保护京畿治安京畿卫戍总司令兼京畿警察总监”鹿钟麟将军,“东北国民军之崛起倒戈击奉”之郭松龄,“忠孝两难”之张学良,“一世之枭亲离众叛”之张作霖,“甘心助逆”之张作相等。他不断发表报道、时评赞颂郭松龄,历数张作霖的罪状,甚至撰文鼓励张学良“父让子继”。只相信暴力的“马贼”慌了手脚,马上汇款30万元赠给邵飘萍,企图堵他的嘴。他收到后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上揭露张作霖。他曾和家人说:“张作霖出三十万元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12月24日，郭松龄在日本关东军和张作霖的联合夹攻下,兵败被杀。邵飘萍把事件的真相公诸于世,引起了北方民众反日、反张运动。张作霖对他恨之入骨，发誓打进北京城就要枪毙邵飘萍!

1926年4月,张作霖、吴佩孚(又拉了阎锡山)三面夹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冯部被迫撤出北京。4月18日,张作霖的先头部队入京。张作霖悬赏捕杀邵飘萍，吴佩孚也密令到京缉捕邵飘萍。邵飘萍避居俄国使馆,生命危在旦夕。4月22日，他在《京报》发表了最后一篇文章《飘萍启事》,仍然嬉笑怒骂,正气凛然。

4月24日,被军阀以造币厂厂长之职和二万块大洋的诱饵收买的邵飘萍旧交、《大陆报》社长张翰举,将邵飘萍从使馆骗出(谎称张作霖惧怕国际干涉,不敢杀他。并说自己已向张学良疏通,张允诺《京报》可以照出等),予以逮捕,《京报》被封。

4月25日,《北京晚报》发表《京报馆被封》的消息,北京各界立即组织营救。张学良出面接见13名代表时，竟毫无隐讳地说:“逮捕飘萍一事,老帅和子玉(吴佩孚)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定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

4月26日凌晨1时许,警厅把邵飘萍“提至督战执法处,严刑讯问,胫骨为断”,秘密判处死刑。4时30分,邵飘萍被押赴天桥东刑场,临刑前,他向监刑官拱手说:“诸位免送。”然后面向尚未露出曙光的天空，哈哈大笑，从容就义,年仅40岁。

(责任编辑　赵友慈)

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

· 刘德纯

《炎黄春秋》2000年第7期发表林里同志的文章《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文章开头说："陶铸罢宴的佳话，有口皆碑，举国称赞。据我所见，陶铸不光罢宴，而且要把设宴人训斥一番。"读过这篇文章，联想起一件往事——

1957年，当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兼广州军区政委的陶铸，得知军区司令部住房紧张的消息，率先提出让机要处派几名男同志住进他的宿舍。不久，景林副处长通知我说："陶政委的宿舍腾出三个房间，经领导上研究，让你们七名男同志搬进去。"从此，我们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搬进去住了。这样，陶铸和夫人曾志（广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一家人、秘书一家和勤务人员，再加七名机关工作人员，把那幢三层小楼住得满满的，当时人们笑语称赞："'陶公馆'变成集体宿舍了。"

我们七个人住进之后，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有的调动，有的结婚，有的去外地学习，我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那个房间住了两年多。1958年我去外地学习时，留下的东西仍放在那个房间。1959年返部队，我在那个房间摆放的东西没有任何搬动，尽管陶家的人增多了，却从未占用过那个房间，使我十分感动。

那两年，陶政委经常教育家人和工作人员，把我们当作邻居看待，他们从不以安全保卫为由，限制我们的行动，我们始终没有寄宿"公馆"的感觉。

当时，司令部每周有五个早晨出操，我们住的三层房间恰好正在陶铸夫妇住房的上面，清晨起床要急忙去操场集合，收操回来又要盥洗一阵。显然，这些活动对陶家干扰很大。况且那时我们穿的多是统一发的硬底皮鞋，平时上下楼走动的声响也大，陶铸夫妇从未为此提出限制性要求。

曾志虽不在军队任职，但大家都知道她是井冈山时期的老红军。刚入住"公馆"时，我们见到二位首长感到拘束，想方设法躲避，可是我们在早、午、晚要多次出入宿舍，在楼里也要活动，所以常在院里或楼道里遇见陶铸夫妇，二位首长总是笑呵呵地同我们打招呼。

我们进出走偏门要穿行陶家厨房，走正门能看见陶家会客室里的饭桌，每天我们都能目睹陶家的日常饮食情况，证实了陶铸深入基层对食宿接待标准的严格要求是表里如一的，不是像有的人在外面饿着肚子图名声而回家大吃大喝。陶铸这种家庭生活，在我们眼里比起他在军区礼堂作多次思想作风教育的报告，说服力还要大。若是养尊处优、追求享受的领导干部，是决不敢让七名过军事生活的年轻人住进去的。

1961年4月我离开陶家后，直到1979年6月25日才有机会出差去广州，顺便向我住的珠江宾馆负责人吴至尚打听陶家小楼的情况。至尚是当年入住陶家的7人之一。同时我还抽空去那幢小楼门前徘徊，望着小楼，想起当年的情景和陶家在"文革"中家破人亡的遭遇，不禁触景生情，潸然泪下。想起当年进住的7人如今都是七十岁左右的老人了，有的已经去世。我不能不借《炎黄春秋》的一角将我所知的陶铸这位老共产党人的一些高洁品格作一披露，以免我军"失传"。

（责任编辑　吴　思）

茗气氤氲说茶城

● 刘振贵　孟凡夏

历史文化名城——杭州，有一个既堂皇而又风光的别名——天堂。这个雅号与江苏古城——苏州并列。从宋代开始民间就流传着一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相传千多年，享誉海内外，吸引着众多的来江南探胜的游客。不过，杭州除具有独特的江南水乡秀丽风光之外，杭州还盛产名茶，若将杭州称作"茶城"，一点也不为过。而且杭州名茶更会给这座美誉的"天堂"之城，增添一分秀雅、芬芳的隽永风味。

从历史记载看，杭州产茶并不是最早的。但第一个提到杭州产茶的人，却是被古今中外茶人尊为"茶圣"的陆羽。1200多年前，陆羽倾毕生精力在距杭州不远的湖州一座寺庙中撰著《茶经》，提到"钱塘（即杭州）天竺、灵隐二寺产茶"。此后，史书、茶书和名人的诗文中，不断地提到杭州产的茶，其芳名有：宝云茶、香林茶、白云茶、石人坞茶、径山茶……北宋末年，杭州僧人辩才和尚，在西湖之西龙井寺，汲龙井泉水，烹寺中所产的茶叶，招徕香客，并与包括苏东坡在内的名士品饮唱和，自此，龙井茶声名日隆。到了明朝，龙井茶这个茶中的后起之秀，被誉为"茶中绝品"，取代了曾经名闻遐迩的紫笋茶、日铸茶的贡品地位，成为贡奉帝王的"贡茶"。清朝乾隆皇帝在位时六次南巡，其中四次到杭州，他在"重重叠叠山，曲曲环环路，叮叮咚咚泉，高高下下树"采摘过十八棵茶树，被杭州人称为"御茶树"，至今仍存活很好，成为杭州的一处名胜。乾隆帝在龙井观茶农采茶时，还乘兴作了好几首咏龙井茶的诗，其中有一首这样写道：龙井新茶龙井泉，一家风味称烹煎。寸芽出自烂石上，时节焙成谷雨前。何必龙团夸御茗，聊因雀舌润心莲。呼之欲出辩才在，笑我依然文字禅。这首诗虽然韵味淡薄，意境不深，难与其他诗人的品茶名篇媲美，但他的至高无上的帝王地位，却使龙井茶名声大振。在此以后，又经过杭州茶人200来年的精焙巧制，今天的龙井茶，仰天地之灵，揽山水之胜，收花草之芬，集工艺之精，以"色绿、香郁、味醇、形美"四绝，登上中国"绿茶之冠"、"茶中皇后"的宝座，多次在国内外荣获大奖。从50年代起，龙井茶被遴选为"国家礼品茶"，中央领导人用以赠送国宾，并在人民大会堂和中南海款待宾客，成为名副其实的"国茶"。正是因为有了茶，特别是龙井茶，有"天堂"和"风景文化名城"美誉的杭州，才更加光彩照人，名扬四海。

杭州不仅盛产茶叶，而且杭州人爱茶如命，饮茶成瘾，品茶成风，为发展中国的茶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近十多年来，外来饮料蜂拥市场，但对品茶情有独钟的杭州人，大多数人家还是保持着

泡一壶清茶，全家人从清早喝到晚和客来敬茶的风气。公职人员上班，甚至连杭州的出租车司机，身旁必备一杯浓茶，让茶香伴随终日，解除疲劳。每当春暖花开的明前雨后，满城茶气氤氲，杭州人家家户户便大包小包地往家里买茶叶，以备一年的饮用或寄赠在外地工作的亲友。

还有一些饮茶品位高的杭州人，他们把茶从解渴的生理需要升华为精神需求，闲来无事，聚三朋两友，慢饮细咽，品味茶的馨香与苦甜，以求清心、涤俗、驱除烦恼、振奋精神。为了适应这些人的需要，因而在“柳浪闻莺”的柳荫深处，苏堤白堤的桃花丛中，“曲院风荷”的红衣绿裳旁边，“平湖秋月”的水晶盘上，以及望湖楼、镜湖厅、涤心亭……随处可见一群群、一簇簇的清雅茶座，无不是杭州茶人品香茗、求脱俗的佳境。假期节日，人们飘然而至，尽兴而归。笔者移居杭州不过十数载，竟也渐渐被杭州的品茶之风所染。工余饭后，冲几杯龙井，全家老小围坐一起，乐陶陶、慢悠悠地啜着香茗，似乎也能领略些许“两腋习习清风生”的情趣。

杭州饮茶品茗的风俗，源远流长。单以茶馆为例，据《梦粱录》记述，南宋临安（即今杭州），城内茶肆密布，茶客如云。书中录名的茶馆有清乐茶坊、八仙茶坊、郭四郎茶坊、俞士郎茶坊、蒋检阅茶坊等等。当时的茶馆，除了供富人文士品茶的室内摆着花卉、挂着字画的高档次的茶楼外，还有卖笑的“花茶坊”，谈交易的行市茶坊，卖茶同时说书唱曲乃至蹴球的娱乐茶坊，介绍职业的市头茶坊等等。明清以来，杭州人饮茶品茗之风更盛。据《西湖游览志余》记述，明代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旬日之间”，杭州新增茶馆五十余家。还有记载说，清末，杭州仅仅是吴山一条街上，就有三十余家设炉卖茶的茶肆。建国前夕，杭州共有大小茶馆三百余家，其中著名的高档茶楼有喜雨台、雅园、西园。与当年相比，今天杭州茶馆茗楼还远不能算是盛况空前。

说杭州是“茶城”，还因为杭州上千年来沉淀的茶文化厚度，是别的城市所难以企及的。

古今杭州文人，受杭州茶香茗气的熏陶，在他们的笔下，生发出阵阵茶香。在杭州居留过的大诗人和杭州本地诗人白居易、苏轼、陆游、范大成、杨万里等，都写过很多茶诗，他们生动地描绘过杭州茶的生长优越环境、美妙形态、隽永滋味、清芬香气、奇特功效。他们还从茶的滋味中领悟人生哲理和真谛。有些诗人则抒发了他们对杭州茶农艰辛劳动的赞美和不幸遭遇的同情。苏东坡和陆游是写茶诗最多的两位大诗人。苏轼在杭州写的《次韵曹辅寄壑源试焙新茶》：

仙山灵草湿行云，洗遍香肌粉未匀。
明月来投玉川子，清风吹破武林春。
要知玉雪心肠好，不是膏油首面新。
戏作小诗君勿笑，从来佳茗似佳人。

这首诗中的最后一句：“从来佳茗似佳人”，是茶诗中的名句。后来有人将这一句与他写杭州风光的另一句“欲把西湖比西子”集在一起，成了一副佳联，也是杭州的一段佳话。

陆游的《临安春雨初霁》，则是表述他在临安（杭州）等待皇帝召见时，既怀报一腔报国之志，又对“世味”不满，百无聊赖，以茶破闷的一种心情：

世味年来薄如纱，谁令骑马客京华。
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
矮纸斜竹间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杭州人以茶人文、以茶人歌、以茶人曲、以茶入戏、以茶人书（法）、以茶人印之盛，也都是别处少有的。远的不说，当代作曲家周大风的曲作《采茶舞曲》，那优美的吴音越韵，轻松活泼的旋律，经歌唱家叶彩华美妙的歌喉，传遍了全中国。后来，这首歌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度评价，被选作亚太地区民族音乐教材。三年前，杭州女作家王旭烽的长篇小说《南方有嘉木》，因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茶人为茶奋斗终生的艺术形象，在全国获奖。在杭州的书法泰斗沙孟海和著名画家吴山明，都曾以他们的大笔书茶、绘茶。近年来，杭州书法家李茂荣的茶诗微楷、茶画和中国名茶篆刻录，

受到了国内外茶人的赞赏，杭州的一些茶馆里纷纷用以作为高雅的点缀物。据知，目前杭州茶人正在酝酿着研制适应各种需要的茶点、茶宴、茶菜。苏东坡当年品尝过的茶点蓑衣饼，也已经在茶馆重现。

杭州的西南，有座气势雄伟的山——径山，它是天目山的支脉。山中有座寺院，唐代名兴圣万寿寺，宋代名香林禅寺，后又名径山寺。这个寺院在宋代是禅林之冠。径山历来是著名的产茶区，径山寺在宋和宋以后常设“茶宴”待客。所谓茶宴，就是僧众山堂夜坐，以泉煮茶，边讲佛法，边点茶（冲泡茶），边斗茶（鉴评各种茶叶的优劣品位），边品饮。宋时日本南浦照明和尚到径山寺习经归国时，同时将径山寺的“茶宴”方式带回了日本。经他广为传播，后来发展成为独具日本民族特色的“茶道”。所以，日本的古籍《类聚名物考》上说：“茶道之起，在元中筑前崇福寺开山南浦照明由宋传人。”也就是说，日本茶道的源头，在杭州。

说杭州是“茶城”，还因杭州历来是茶人会集之所，茶贸易、茶科技兴盛和国际茶文化交流之地。

从南宋时起，杭州就有许多茶栈，成批量的运销茶叶。明清时，杭州茶叶生意兴隆，是中国茶叶的重要集散地，有的还将茶叶运销国外。现在杭州的著名风景点汪庄、刘庄，都是茶庄老板的别墅。这些别墅，还曾用来接待外地的茶商。

有“中国当代茶圣”之称的吴觉农先生和著名茶叶专家庄晚芳先生，终生为茶业的发展奔走呼号，著书立说，培育人才，作出了杰出贡献。庄晚芳先生中年以后，一直在杭州进行茶教学和茶科研，编著了《中国茶史散论》等重要著作，晚年提倡弘扬茶的“廉、美、和、静”四德，为茶文化增添了新的内容。

中国最早、最全面培养茶叶专业人才的教学单位——浙江农业学院茶学系，50年代创立于杭州。几十年来，它为中国茶业培养了数以千计的茶树育种栽培、茶叶焙制、茶叶深度加工等方面的科技人才，为杭州和全国的茶业发展作出了贡献。

专业的茶叶科研机构——农业部中国茶叶研究所，也设在杭州。改革开放十多年来，他们的科研成绩达120多项，其中的茶树新品种——“龙井43”和从茶叶中提取有用成分进行研究两项重大成果，已经达到国内和国际先进水平。

专门研究茶叶加工技术和进行茶叶品质检验、监测的全国供销总社茶叶研究所，也设在杭州。许多有关茶叶加工的新工艺技术和监测条例，就出自这个研究所。

在杭州龙井茶区，还有一处如诗如画的所在，这就是中国、也是世界唯一的展示和研究各类茶叶、茶具、茶事、茶史、茶风情的中国茶叶博物馆。它是80年代中期，由吴觉农、庄晚芳、于杰等二十多位中国茶界名士联名提议建在杭州的。

以推进国际茶文化交流为宗旨的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90年代初创建于杭州。会长王家扬先生提出了于国于民都大有裨益的“茶为国饮”的倡议。数年来，这个研究会已在杭州、长沙、昆明和韩国汉城举行过五次大型的茶文化交流活动，推动了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茶文化走向世界，又将国外的茶文化引进国内。这些活动，使杭州成为国内外茶人关注的茶城。

（责任编辑　方　徨）

平湖秋月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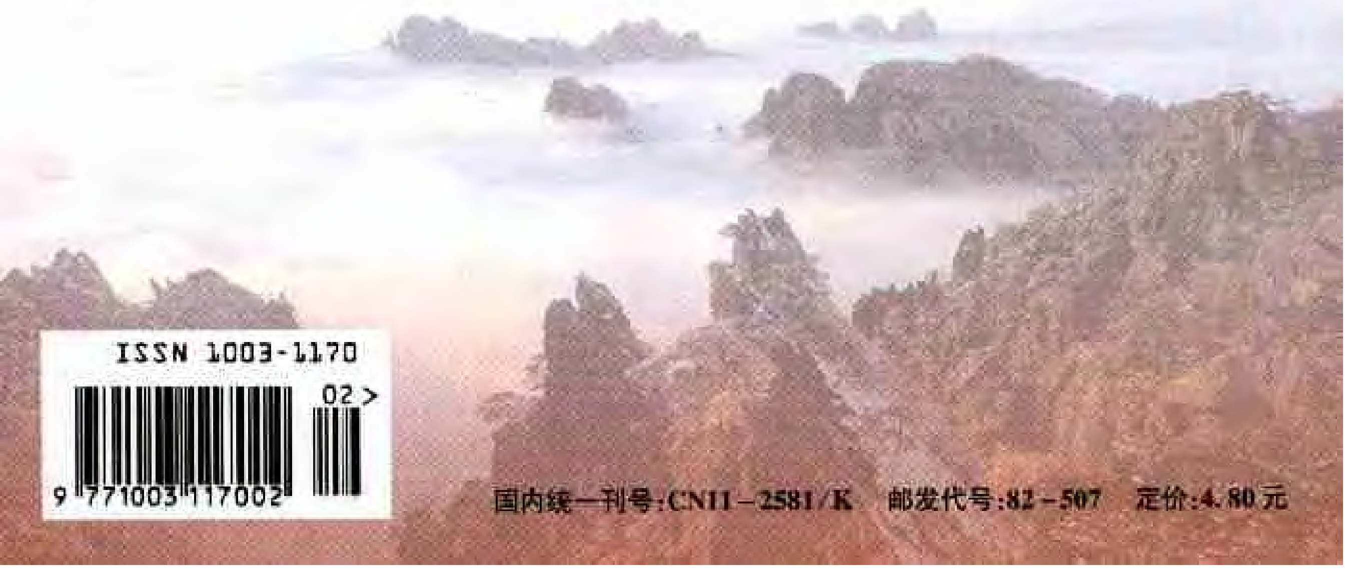
黄克诚率部进军黑土地

张爱萍初上国防科研路

中国核潜艇工程总设计师黄旭华

谈独立思考

沫沙十年祭



ISSN 1003-1170

02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